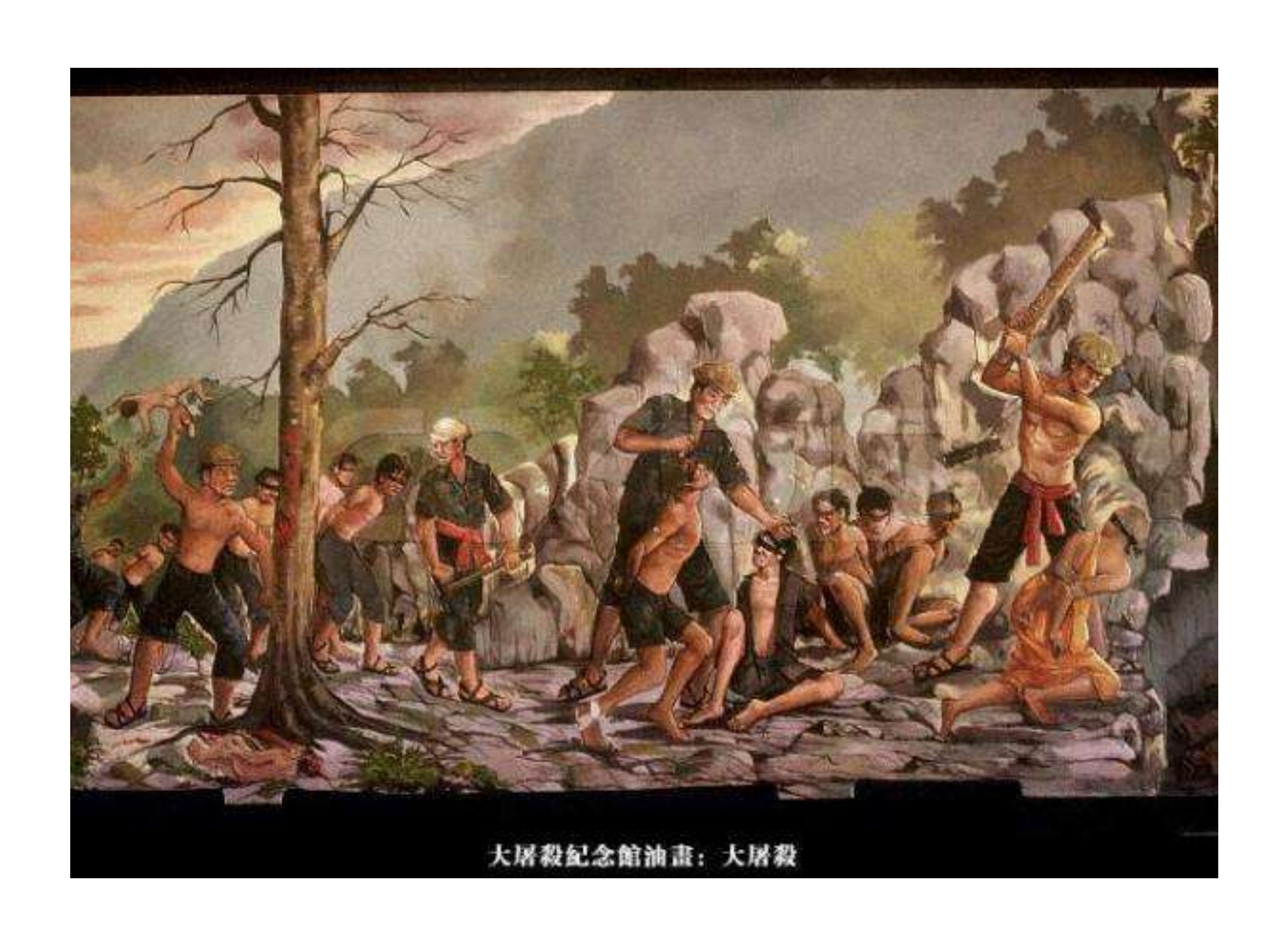
革命的僭妄



大屠殺紀念館油畫：大屠殺

目录

四十年兴亡路 1

●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成功实践 1

●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 2

●在十四年抗越战争中重整旗鼓 3

●战略失策和内部分裂导致衰亡 4

波尔布特以及红色高棉 6

⊙何方神圣 6

⊙乱世英雄 7

⊙杀戮时刻 8

⊙狂魔末路 9

⊙千夫所指 9

穿过历史的悲怆·吴哥、红色高棉及其他 11

红色高棉屠夫，莫克“大爷” 15

刽子手的忏悔 15

漫长的审判 17

美法力促诉讼 17

谜底将被揭开 19

谁是受审者？ 19

以革命的名义 20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23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24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25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27

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 29

一 29

二 29
三 31
四 32

血色记忆 33

（一）：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英勇善战的年轻军队打下了金边。 33
（二）在死亡大使的黑色巨翼下 34

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 36

失去身分与尊严 38
惨无人道的刑具 38
送往集中营处决 38
血渍斑斑的死亡集中营 39
无辜稚嫩骨头 39
无理性大屠杀 39
巴郸邦 庙宇改成的杀人场 40
亲睹种种暴行 40
波尔布特其人 41
领导史无前例的“革命” 43

红色高棉瓦解之原因 45

英萨利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 45
波尔布特之死 45
红色高棉瓦解的原因 46
一、红色高棉内部因对联合国主持的柬埔寨大选的态度不同而分成两派。 46
二、红色高棉强硬派继续实行极左政策不得人心。 46
三、专制使红色高棉从分裂走向灭亡。 46
四、洪森采用了和平手段。 47

波尔布特的“丰功伟绩” 48

（一） 48
（二） 49
（三） 49
（四） 50
（五） 51

波尔布特的罪恶:“活体取脑”【图文】 51
马鼎盛的博客 53
英雄的国家-----民主柬埔寨 53
以上都是一位老太太信步老从网上转帖保存的资料 54
又一评论 54

附录 55

金边的噩梦·红色高棉起诉书 55
柬埔寨 罪恶的红色高棉 56
华人经济的国家 56
红色高棉——恐怖的回忆 56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 58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一） 58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二) 60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三） 62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四） 65
回忆赤色炼狱《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 68
红色高棉：天堂如何变成噩梦 72
独裁暴政的罪恶罄竹难书 73
1.红色高棉推行的乌托邦。 73
2.令人发指的恐怖和屠杀。 73
3.人民对红色高棉的切齿大恨。 74
4.魔鬼波尔布特。 74
5.各种理想应当和谐共处，以暴力革命推行理想社会是荒谬的。 75
红色高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政 76
未偿的血债 78
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辩护 80
柬埔寨纪念红色高棉大屠杀34周年 82
黑色回忆————红色高棉 87
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 89
柬埔寨 1975年 89
维基百科·柬埔寨共产党 93
意识形态 94
红高棉的管治 95
红高棉的衰亡 95
复元及审判 96

四十年兴亡路

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走得如此之远

1998 年 12 月 25 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向柬埔寨政府投降。

1999 年 2 月 9 日，最后 1700 名红色高棉战士在安浓汶被编入柬政府军。

3 月 6 日，红色高棉最后一位领导人切春被政府军捕获。

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激进组织之一红色高棉，终于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红色高棉创造过辉煌，更有过失败；曾让人肃然起敬，也令人不寒而栗。四十年来，它对世人来说始终是个未解开的谜。

●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成功实践



按照红色高棉紧急疏散命令，每個家庭携带其全部財產離開金邊

1960 年 9 月 30 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里重建柬共组织的这批人竟改变了柬埔寨的历史。

柬埔寨战后就存在共产党组织。它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法斗争中成长起来，1953 年 11 月柬独立后大部分解散或转入地下。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支部，它的领导人不是越南人，就是亲越派，因而难免一切都服从越南革命斗争的需要。

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他们一般出生农村富裕家庭，获得奖学金出国留学，回国后有待遇优厚的工作，是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但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中学时期就参加反法斗争，在巴黎这个“激进思想摇篮”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加入法国共产党。他们自认为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太看得起“乡土派”。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柬独立开展反封建的革命。

1962 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

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还算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但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1963 年 5 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乔森潘、胡荣和符宁以左派代表人物的身份活跃在政坛，因正直敢言受到民众爱戴。1966 年再度当选议员，并出任政府部长。不久，他们也只得“失踪”进入丛林根据地。

1967 年 4 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

“红色高棉”原是西哈努克对柬左派势力的称呼，这时就成了柬共的代名词。在内部柬共被称作“安卡”，也就是柬语“组织”的意思。

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

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 年 3 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年底革命军就增至 2500 人。

1970 年 3 月 18 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1970 年 4 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5 月 5 日柬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担任副首相。

民族团结政府得到民众衷心拥护，抵抗力量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

1971 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 年 8 月美机停止轰炸。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 5 万人，解放了 90 %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金边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是因为抵抗部队还缺乏足够的进攻武器。

1975 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 月 1 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 月 17 日，金边挂起了白旗。

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让柬埔寨人民自豪的是，金边的解放比北越军队攻下西贡要早 13 天。

●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正在治疗病人的医院也不能例外。三天后，200 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因此，在这年年初，波尔布特等人就决定，全国胜利后要取消城市。到 9 月，全国城镇都完成了迁出人口的任务。柬共认为这在世界上是个“创举”。

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大修水利，平整土地。所有人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过时不候。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

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寺庙用作仓库。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又被称为“四一七分子”，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在柬越南人遭到驱逐和杀害。在许多地方华侨也成为肉体消灭的对象，他们被集体杀戳之前可以在食堂里美餐一顿。

1976 年 1 月柬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 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1976 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柬共党内人人自危。包括胡荣、符宁等在内的一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清洗。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 14000 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 1978 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

个奇异的国家派有外交人员。

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

红色高棉精心构筑理想的天堂，却给高棉民族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在其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 100 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 700 万人。



紅色高棉領導們進入金邊

● 在十四年抗越战争中重整旗鼓



1978 年12 月25 日,越南10 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1979 年1 月7 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

在长期的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柬越曾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但也有一些积怨。两国革命胜利后，越南企图通过越柬的“特殊关系”控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美梦。1975 年6 月就乘解放越南南方之机出兵占领柬的威岛。而红色高棉不屈服于越南的压力，利用民众根深蒂固的仇越反越情绪予以反击。1977 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年底因越军入侵鹦鹉嘴地区，柬宣布与越断交，而越南则公开号召推翻柬共政权。民柬自信能轻易击败越南的任何侵略，不料劫难正在降临。

仅仅两周时间，民柬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别说波尔布特没有想到，连越南人也深感意外。除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

四下逃散的红色高棉官兵渐渐聚集起来。他们整编军队，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丛林游击战是艰苦的，但他们对此比建设国家更有经验。1981 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越军旱季进攻，国民军雨季出击。越军在边境围剿，国民军则分散进入内地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民柬是抗越战争的主力。

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他们承认由于过于理想化，在政策上犯有错误，并申辩说已着手改进，是越南入侵打断了这一过程。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为了民族和人民的神圣事业"，1981 年 12 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 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不过，这时的西哈努克和另一位抵抗派别领导人宋双都有自己领导的小股抗越部队。

1982 年 6 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

柬抗越斗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979 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越南侵柬，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维护民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绝承认金边当局。

1986 年以后三方力量有了明显增强。越南 20 万军队陷入柬埔寨战场的泥潭之中，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因侵柬战争和国际制裁，越南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苏联逐渐改变支持越南侵柬政策。这些因素迫使越南和金边当局考虑政治解决方案。

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它拥有 25 个师，共 7 万人的军队，控制着近 20 %的国土。它组织严密，经验丰富，经济自立，是一支谁也不敢轻视的力量。

●战略失策和内部分裂导致衰亡

1989 年 9 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 年 10 月 23 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从 1992 年 2 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 2.2 万工作人员，花费近 28 亿美元来帮助柬实施和平协定。这是联合国战后最大一次维和行动。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它先是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而后拒绝裁减军队，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并多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人员的事件，最后是在大选前撤走驻各地的联络站。红色高棉提出的理由不无道理，如金边当局仍控制实权和柬存在大量越南移民问题，但它不参加大选的决策却违背了人民渴望和平的意愿，这一战略失策使它声誉扫地。

除红色高棉外，其他 19 个政党都参加了 1993 年 5 月举行的大选。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票 45.47 %，出人意料地战胜了金边当局的人民党。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1994 年 7 月 7 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的确，民柬军队能征惯战，政府军的围剿常常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

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 年 8 月他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

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 4000 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 1997 年 5 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 80 % 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 年 6 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 8 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保存组织力量，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无所适从。

1997 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7 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

波尔布特 1998 年 4 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毕姜、江裕朗等 5 位高级官员和马本、波尔布特遗孀梅松等人先后离开红色高棉。最后是 12 月 5 日肯农等 8 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的回归。1998 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史的重要篇章。外部（即外国）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似乎举足轻重。如果没有美国干涉导致的柬民族矛盾激化，红色高棉不可能在短短五年内由弱变强，崛起为柬的主导力量。如果没有越南军队的入侵，柬共也不会执政三年多就失去政权。但另一方面，红色高棉的衰败和消亡，不能不说主要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在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后，红色高棉狂热地推行一系列超越柬埔寨现实的极左政策，造成经济崩溃和人心散失，动摇了其政权基础。在长达十四年的抗越斗争中，红色高棉积极捍卫民族利益，并且促进了柬问题的政治解决。但在和平来临之际，它却迷信武力，一意孤行，拒绝参加联合国监督下的议会大选，置身于柬合法政治之外，而后不思变革，一误再误，在短短的五年中就落得个众叛亲离、曲终人散的悲惨结局。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却走得如此之远？

波尔布特以及红色高棉



自共产主义运动崛起于世，红色铁流就猛烈冲刷旧世界的墙基，其间诞生过几多才高绝顶、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共产思想对所有社会缺陷都具有尖锐而刚猛的批判力，任何改良派在大破大立的革命理想面前，都显得苍白而干瘪。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要建立的新世界之圣洁、公正、和谐、完美，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终极阶段。

等到共产政权在本世纪相继破土而出，香火至鼎盛时全世界已有三分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政体之下，神话随即褪色，油彩开始剥落。探讨红色帝国的兴亡，可有多个角度，但单单历数从它的政治胎盘所孕育出来的党国领袖，便可发现有惊人的同质性。专权、暴戾、多疑、仇外、腐败、玩阴谋、坑杀同僚、视人命如草芥……名著《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就是这类魔头的一个浓缩象征。

本世纪末，国际共运大退潮，红色政权次第溃灭，如今要按图索骥找一个独夫民贼的活标本，倒要费一阵脑筋了。按说北韩的金正日正是衣钵传人，集专制万恶之大成还要加上他本人的癖好——荒淫无度。不过，金正日并非"马上天子"，只能算为另类标本，真要数打下江山而又把江山坐塌了的混世魔王，那便非波尔布特莫属了。

⊙何方神圣

本来，柬埔寨的国土与民情并不适宜生长这种血腥故事。高棉是个佛教之邦，虽系小国寡民，但其古色古香的文明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足可自矜。高棉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国王西哈努克威望颇高。比起另一君主制邻居老挝，柬埔寨要富足许多。还有一个邻国越南原来也是君主制的，不过保大王朝在日本占领时期沦成敌伪傀儡，因而丧失了合法性，二战结束后，越南战乱不止，国土一分为二，再无宁日。不免追想，有个国王当镇国之宝，其实挺不错的，也省得手足同胞为政治理想的冲突而妄动干戈了。

柬埔寨正符合这个模式，她固然也有王室、贵族、平民的阶级差别，但总体而言社会矛盾不算尖锐。然而佛经所谓的"魔劫"，乃为一种宿命的轮回，数百年前它降临过一次，瘟疫的巨翼笼罩了整个国土，以至文化古都吴歌窟都消失在热带藤萝里，留待劫后余生的遗民去重新发现。而本世纪这轮浩劫的根须，却种植在一个朴实无华的农家子弟身上。波尔布特出生于远离金边的北部农村，家境还算殷实，笃诚信佛的父亲将儿子送进佛寺，剃度出家，只是少年波尔布特不守寺规，未几就被逐出门墙，他到底触犯了哪条戒律，已无考。不过参照他日后的作为，波氏能洗心向善、诵经说法，倒是怪事了。

波尔布特当然不是池中之物，他出落得高大健硕，见惯了五短身材的东南亚土著，在乡间猛地撞见这尊大汉，还以为是寺庙里的护法金刚跑出来了。从相学上论，此乃典型的"南人北相"，会有很多故事的。

波尔布特读书成绩不怎么好，后考进金边的一所职业中专，学的是木工，那却是"细木匠"的精巧绝活，王宫里的雕栏玉砌，寺院里的莲座金身，不是科班出身都揽不下来这活计。不知是什么缘分，他这农家子弟竟得到了王室的奖学金，于１９４９年前往巴黎留学深造，学电子工程。他在宗主国法国学业如何，已不重要，因为他和另一学友乔森潘都在巴黎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路向——参加了共产党活动。

１９５２年波尔布特归国，当然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在一家私立学校任职授课，至于革命那一摊子也没闲着，他居然能扔下学生不顾，奉组织的派遣秘密潜往中国南方参加了某期军政训练速成班。次年法国结束了在高棉的殖民统治，柬埔寨王国独立了，波尔布特随即不知所终，潜入地下了。

然而，这时的柬共仍属子虚乌有，因为法国人过去把自己治下的越、柬、寮三国统称印度支那，所以共产国际协助组建东南亚的革命政党时，就不去分得太过琐碎了，由胡志明草创的印度支那共

产党于１９３０年成立，自然是超越国界的。

胡志明伯伯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情操大概是很赤诚的，只是邻居未必这样去想。越南为地区霸主，古来如是，它历史上一再侵略、欺压过高棉邻国，这笔账从未了结。所以就算是最狂热的高棉籍共产斗士，也不愿在印支共产党的旗帜下面效死，法国人被逐走了，“乌合”的跨国政党随之分裂，理所当然。



１９５７年，波尔布特再次潜往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不难发现波氏的智商其实很高，他的中文说听能力与阅读能力都很强，就是写作不行，他勤奋通读了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从武装割据到农村包围城市，他认定毛泽东思想是柬埔寨革命的必由之路。波尔布特在华训练成绩优秀，但营地里都是东南亚地下共运的菁英，他并不显赫出众。何况，当时中共最器重的是来自越南的军政干部，他们堪称本门第一代嫡传弟子，至于高棉，首先是革命火种太过稀零，一小撮游击战士只龟缩于与越南接壤的山林之中；其次是中共与高棉王国关系良好，在东南亚一大片反共仇华的声浪之中，西哈努克亲王是个异数，中共对波尔布特并无特别的兴致。况且在秘密营地里来自各国亡命之徒又傲岸不驯，他们之间摩擦多多，其中最飞扬拔扈的当数来自反帝第一线的越共学员，波尔布特在营地受过越南同志的“胯下之辱”，这未始不是波氏日后寻仇的另一伏笔。那时营地里啸聚的群豪，每有龃龉，中共还须居中调停，感情上向越共倾斜是一定的。没想到若干年后，各房弟子中的马共、泰共、菲共先后式微，其他多叛出门墙甚至欺师灭祖，真正死忠到底的只有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与缅共的德钦巴登顶两家——此是后话。

⊙乱世英雄



１９６０年，独立的高棉共产党正式树旗，其实他们早已叛胡志明而去，亮出牌号只是个形式而已，此时波尔布特已是柬共的三常委之一。至１９６３年，波尔布特当选总书记，他的铁杆左右手是英萨利和宋成，至于巴黎同窗乔森潘则在金边搞白区工作，大抵是当年刘少奇的角色。不过波尔布特此公生性内向而沉鸷，喜怒不形于色，他总是规避抛头露面，以至金边政府都不晓得这人的存在，而他就象魅影一般，强有力地控制着这个由一群死士组成的铁血政党。

１９６７年，高棉西部萨德兰县因地方政府改变稻米征税的计算方法而触发农民暴动，在山中蛰伏多年的那一小队革命萤火虫终于得机出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事件本身虽被政府军弹压下去，但已抄家伙走上不归路的暴动农民成了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然而要夺取全国政权，只怕还是遥不可及。

殊想不到，历史机缘之多方巧合，扭曲了高棉民族的命运。西哈努克亲王奉行的国家“中立”政策，多年来其实象墙头草一般摇来摆去，这是东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所决定的。在两极化的冷战时代，对峙中的各个大国都在印度支那下注较劲，西哈努克只好逢人就合十如仪，奉上他那付招牌笑脸。他一度比较亲美，后又由于美国中情局的可疑活动而反美。不管如何，他没让自己的国家卷入战火，主权仍是独立的，这就是他的功德。然而在１９７０年3月西哈努克亲王出访苏联之际，国内右翼的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亲王的国事访问的下一站本应是北京，但风云突变，何去何去真是颇费踌躇。政变消息是苏联柯西金总理亲自告知他的，克里姆林宫视他如烫手的山芋，急急请他上路。

此时周恩来的案头上摆着中国驻柬、驻苏使馆先后拍来的急电，都是报告政变动态和亲王行踪的。周请示毛泽东，毛一言九鼎，照样以国家元首的礼仪迎接他，但前提是“要让他看到光明前景，看到抵抗斗争一定会胜利”。

周对这两句最高指示的诠释是，在首都机场以礼炮、鲜花、红地毯赚落了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的眼泪后，就在机场贵宾室向对方摊牌："昨天我和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西哈努克别无选择，答曰："我准备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这一来，中共就没白养这个过气君主一场了。怎么"战斗"，是轮不到西哈努克挑拣的，他首先必须认中共为最大靠山，其次要与红色高棉结盟，当然也要和越共联手抗美。

高棉民族的劫难就此启端，朗诺政权将美军这股祸水引进了国土，西哈努克亲王则把红色高棉这股脓血供上了庙堂神案。金边政变的次日，朗诺就批准美军出动庞大的Ｂ－５２机群，"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美国军事顾问开始派往金边政府军中，而美机的狂轰滥炸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３年美国国会表决宣布对柬空袭为非法行动为止。与此同时，红色高棉与越共也没闲着，后者顶着漫天弹雨不屈不挠地继续向南越渗透，从军事物资到伪装过的正规军战斗单位，当然也派出作战老手深入到红色高棉的班排一级，辅助他们尽早夺取全国政权。红色高棉既有北京的供输又有中越两国派来的军事顾问，便如虎添翼，各块根据地迅速扩大并连成一片，当初波尔布特等人亡命丛林的晦暗不明的梦想，忽然之间曙光乍现。

等到波尔布特们已认定朗诺倒台指日可待，他们的头号假想敌就悄悄转移了，准星上的缺口锁定为犹在并肩作战的越共，这内中的原冲动自然还是历史上的世仇情结，其次是红色高棉总是认为中共无偿提供的物资武器被越南侵吞盘剥，过了一手才把残羹剩饭打发盟友。再者，红色高棉唯恐越共设在柬国领土的战时基地会成为其日后赖着不走的理由。总而言之，羽翼渐丰的波尔布特在拿下金边之前就已开始层层清除——至少是钳制越共军事顾问的影响，甚至于对有越南受训背景的本党干部也予以排挤打击，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吾党所宗。

１９７５年，北越军队攻陷西贡之后十七天，红色高棉摧枯拉朽地拿下金边。

⊙杀戮时刻

波尔布特在夺取政权之前曾几度秘密访问北京，因周恩来病重，波氏最重要的那次朝觐是直接和毛泽东谈的。不消说，毛对他来说是一尊超神。波尔布特毕恭毕敬地汇报本国的革命形势，谓称：我们不象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性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柬共准备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工农、城乡差别，全国实行供给制，以物品券取代货币……他敬请中共协助未来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国"起草宪法。

波尔布特这套构想从何而来呢？按说他通读四卷雄文，晓得"新民主主义阶段"之重要，岂敢当面去捋毛的虎须？原来，真正领悟毛泽东思想精义的，还真非波氏莫属！其时，张春桥、姚文元于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奇文，深得毛的欣赏，并译成多种文字，毛泽东早先已向访华的英萨利推荐过。

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晓得，张春桥所以从较低级别的干部而平地青云、荣宠有加，就是他发表于五十年代的一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论文被毛的青眼看中。毛泽东很喜欢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供给制，讨厌二十四级工资制，所以人民公社与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毛式大同思想的产物，但即使以毛的威权仍不足以在庞大的中国彻底实行之，故此毛经常嘲弄道："资产阶级法权象块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意在抨击那些抱着现行体制不放的同僚。张春桥、姚文元的"全面专政"论，正是毛泽东思想辉煌的延伸。而波尔布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居然能咂品出其中真髓来，真是难为他了。

总之，毛闻言抚掌称善，慨叹：吾道不孤也！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至于以后的情节，奥斯卡金奖巨片《杀戮场》（又译《战火屠城》）已有形象的描述。高棉民族的命途从此进入了一条最黑暗的时光隧道。

电影拍出了"万人坑"、水田里漂浮着的骸骨、专杀懂外语和戴眼镜者、教孩子仇恨自己的父母。但该影片还是不便拍出红色高棉杀人示众时，竟用锄头活活将人砸死；用刺刀捅死婴儿；在水利工

地将染病者就地活埋……

从１９７５年暮春至１９７８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一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一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你听过这样句句沥血、字字见红的“国歌”吗？其大凶之象跃然其间——果然，就在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仍在进行之际，另一股血潮又漫过了高棉国土。

⊙狂魔末路

波尔布特执政后，已和邻国越南开启战端，在边界打打停停，大有“积小胜为大胜”的意思。殊难料到，越共早就厉兵秣马，以期“毕其功于一役”了。１９７８年底，越军海路空三路全面入侵，闪电般叩关金边。红色高棉仓皇弃城西去，掩护柬共中央和庞大的中国使馆、援柬专家团夺路狂奔，一直流蹿到泰柬边境才逃过一劫。

高棉人民已经破碎的心又被撕成了几爿，有的人憎恨越南人，却不反对他们开过来铲除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有的人辗转反侧，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先把异族侵略者逐出国门，再料理家事。无论站在哪一边，这仗打起来就有年头了。

因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在国际国内恶名昭彰，柬共于１９７９年在豆蔻山根据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解散共产党、废除社会主义宪法，前“民主柬埔寨”总理与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的头衔自然不复存在，他只保留了赤柬游击队总司令之职。

随着抗越同盟战线的扩大，西哈努克系游击队（由王子那拉烈率领）和前首相宋双领导的游击队都不可能接受波尔布特的名字，于是波氏连总司令的头衔都让给了乔森潘。然而只有红色高棉核心圈子的人才晓得波尔布特的控制欲是何等强大，无论是赤柬的盟友抑或是敌人，都不相信波尔布特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中共不惜工本的支持，以及西方暨东盟对越南的强力遏制，越军无法绥靖高棉全境，各系抗越游击队又无法在雨季之外有什么作为，总之来回拉锯，柬埔寨已是山河破碎，碧血斑斑。直熬到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先从在阿富汗抽身退步，继而停止为越南支付侵柬的军费。越共内部也经历一连串震荡，被压制的南方系开始抬头，终于在党代会上将黎笋挤掉，并就他那个时期对外政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这么一来，仗是打不下去了。越南开始撤军，高棉各方又扭打成一团。民族和解的症结在于红色高棉的未来定位很难摆平，乔森潘曾代表赤柬到金边谈判，会议未开，他们已被暴怒的老百姓打的鼻青脸肿，不得不抱头鼠窜。

等到那拉烈与洪森的“双头”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对豢养多年的红色高棉已生倦意，援助连年递减。而象柬共这样一个声名狼籍的团伙，它能生存下来，一是靠强大的外部压力维持自己内部的团结，二是凭借后台靠山取之不竭的援助。现在强敌已去，外援不来，他们之间就嫌隙骤生了。各部赤柬游击队分据山区不同地带，为生存而自祈多福，英萨利一部守住了肥缺，是出产宝石的矿脉，他们早就垄断了泰柬边界的宝石走私与木材贩卖生意。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原是过命的交情，两家又是姻亲，波尔布特指派他占据那块洞天福地，自是信得过他。然而英萨利绝非善良之悲，在当初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中，他起的作为极坏，故被金边政府列为第二号“人民公敌”。没想到英萨利突然拥兵反水，背叛波尔布特，宣布向政府投诚。势单力薄的第一总理那拉烈王子立刻接受，敦促父王西哈努克予以特赦，有意收为己用。波尔布特那边则通过电台揭露英萨利侵吞了属于全党全军的财产，这恐怕不会假到哪里去。但波尔布特已系人皆曰杀的恶魔，追随着他又有何盼头？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英萨利系甫去，其他各部军心浮动，波尔布特暴怒难已，经下令杀害铁杆战友宋成全家，灭门之后还要用卡车来回碾压尸体，观者为之发指。不旋踵，各营相继倒戈，并漫山遍野追缉波尔布特及其最后几个亲信喽罗，终于将其一网成擒。

⊙千夫所指



柬埔寨民众对波尔布特恨不得食肉寝皮，国际社会早就有公审之议。这回连双方关系势同冰炭的那拉烈和洪森都联名致函联合国，吁请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公审波尔布特。联合国首席法官当即表态，安理会或者联合国大会有权设立国际法庭，去审判波尔布特统治柬埔寨时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当时正在美国丹佛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也表态赞成此议。

这是有先例的，联合国曾先后设立国际法庭审理过卢旺达以及波斯尼亚的种族屠杀罪行。没想到，中共力排众议，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姿态，强硬反对国际公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崔天凯说：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国内政，中国反对将波尔布特及其他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

这时，人们便可发现，中共虽停止了对赤柬的大规模援助，但其影响力仍是不可磨灭，北京放了话，那些对波尔布特恨得牙痒痒的红色将士，忽而转了口风，无意将波氏交给政府了。他们在丛林里开了党内军内的公审会，波氏确实为恶太多，光是控诉他如何残害战友，就可枪毙他十回了。中共只是不愿在国际法庭上被牵扯出跟自己有关的头绪来，却对波尔布特的生死荣辱并不介怀，如果判他个斩立决，岂不更干净利索！

于是，外间都以为波尔布特在被控诉清算之后，其肉身已被挫骨扬灰，万劫不复。没想到，前不久又有一位深入山区腹地的记者见到波尔布特，他象一条被遗弃的丧家犬，衰颓苍老，形单影只地在泥尘中踯躅。

目睹此情此景，便可推知，曾有过中共秘密收容波尔布特传闻，是永无可能的了。中共是否肯收留他且莫论，只怕首先是波尔布特自己是断断不敢前去投靠的了，因为他不是愚人蠢伯，晓得最想要他闭嘴断气的是哪一家。

追想当年，中共停止了对缅甸共产党的支持，缅共游击队即沦为种毒贩毒的山寇，而且很快就开始出现内讧，你攻我伐，所走过的覆亡之路与今日的红色高棉极为相似。只不过，缅共的反水部队突袭党中央，活捉德钦巴登顶主席是在１９８９年，他们也开了斗争会，控诉一通之后，也没兴致取去他颈上的人头，而是用刺刀将他押过界河，将他扔给中国这边处理，恍如从缅甸的历史上抹去了一个冗长的梦魇。那个日子就在中国的首都发生“六四”之后的半个月。

德钦巴登顶最终仍得以流寓中国，为诞生于这块土地上的光辉理想而全忠全节，末了还能赔上这把骨头为昔日的革命导师殉葬。而真正把毛主义付诸实践的波尔布特，反而失落了终老于中国这个精神家园的荣幸。他已经沦落成为“人渣”，世人皆曰杀，却谁也不愿弄脏了自己的手。

于是，他只好永远在野村里如行尸走肉一般流浪，如同一个活标本，让人清晰逼真地看到那个逝去了的时代。

穿过历史的悲怆·吴哥、红色高棉及其他

柬埔寨暹粒省的五月，雨季即将来临，气候闷热潮湿，中午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至四十度，而每天清晨和黄昏却是乌云压顶，水塘和小吴哥周边的护城河近乎干涸，草色发黄，它们都在等待一年一度的雨季的滋润。熙熙攘攘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冒着酷暑和闷热，不远万里，来探望吴哥这座不朽的千年古城。

吴哥文化的亘古绵长，已经诱惑了我许多年。这座遗失了又找到的传奇的古城，在我心底里是那么神奇和优雅……从元朝元成宗元贞元年六月（1295 年）吴哥王朝鼎盛时期奉命随使赴真腊的温州商人周达观的著作《真腊风土记》，到小吴哥那些石雕回廊浮雕的神话故事，从垂垂僧人老尼守护的佛像雕塑，到巴戎寺石墙上长达几百公尺的高棉人在十二世纪与占婆人的战争浮雕，从矗立于丛林之间的巴戎神庙五十四座高矮不一、大小各异刻有加耶华尔曼七世的两百多个微笑面容的四面塔，到女皇宫那些红沙岩上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的石雕，九百年前的故事历历在目，呼之欲出。这些宏伟建筑和雕塑，因记载的文字极其有限而充满神秘，又因为发现吴哥窟的故事离奇而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使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为之驻足、凝视、深思和感叹！

本来我到柬埔寨的目的十分单纯，短短一个星期的流连，除了缅怀吴哥王朝的历史，拍照片，采撷吴哥文化的艺术瑰宝，就没有任何其他任务，但是，不论在金边、在暹粒，或是在吴哥，与灿烂的古文化之美相比反差极大的，是当地百姓的贫穷。无论在哪里停留，一群小孩、乞丐、残障者立刻涌过来，团团围住你，伸手向你要钱要东西。我拍过几个乞讨的孩子，他们小小年纪，眼睛里却有那么多凄苦和无奈。我不断解读那些凄美的眼睛背后的故事。二十多年的内战，使柬埔寨的百姓变得谦卑，甚至失去了自尊，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似乎这里的百姓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元气，加上外国游客的涌入，更加大了贫富之间的反差。就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柬埔寨还是中南半岛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现在，他们却如此贫困。我在旅途中遭遇到的出租车司机、导游，还有那些乞讨的小孩，他们不断向我讲述柬埔寨的历史，讲述他们的亲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被折磨致死的故事。我总是反复地被这个我本不想触及的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所困扰，与当地百姓的接触，使你无法规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红色高棉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红色高棉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犹如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即将离开柬埔寨的前一天，我终于要求导游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带我去暹粒战争纪念馆。虽然我知道，这不会是愉快的经历。我想弄清楚那些孩子眼睛里与年龄极其不相称的悲哀，我被那些眼睛深深触动。

战争纪念馆实际上是一座庙宇，其中的一座塔的四面装着透明的玻璃，陈列着在波尔布特统治时期惨遭杀害的人的骷髅。塔前有几个小孩，在兜售一本柬埔寨人 LoungUng 写的英文自传，书名叫《他们先杀死我父亲》，书的封面上依次排列着一张张一寸大小的男女老幼的照片。导游说，所有这些照片，都是在红色高棉保留的档案中发现的被红色高棉杀害的人。站在陈列着遇难者骷髅的纪念塔神龛前，心脏似乎被挤压得异常疼痛，感觉喘不过气来。也就是在这些骷髅的面前，人们把红色高棉（khmerRouge）时期的惊心动魄的杀戮故事仔细讲给我听。像这样的纪念塔，在柬埔寨有很多，而最大的一个是在金边南部，一个编号为 S-21 的大屠杀现场。S-21 杀戮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红色高棉在那里杀的人最多，而且多为“政治犯”。

细究柬埔寨的历史，实在是悲惨而又令人尴尬。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到西哈努克的拒绝。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从 1969 年 3 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并把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 1970 年 3 月出访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由朗诺出任总统。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埔寨国内的主要矛盾。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不能接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更不甘心屈服于傀儡政府，柬共趁机打着爱国的牌子扛起抗美救国的大旗。1970 年 4 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5 月 5 日柬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担任副首相。民族团结政府得到民众衷心拥护，抵抗力量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而朗诺本人庸碌无能，完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1971 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取得了战场上

的主动。1973 年 8 月美机停止轰炸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到五万人，一举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了金边外围地区。1975 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 月 1 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 月 17 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

在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旗帜。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和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YearZero)。而这一天，却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日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同年 9 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红色高棉认为这在世界上是个独一无二的“创举”。而大部分的金边人没有料到，此次的离开，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而波尔布特策划的这次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

波尔布特掌权之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并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强迫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民族服装和服饰，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革命装或者军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红色高棉成员的脖子上则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长布围巾。被放逐的“新人”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按军事编制分为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男女分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一周相聚一次。

吃饭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时一天三餐，到后来认为吃三餐多余，改为一天两餐，没过多久，粮食配给越来越少，干饭变成了稀饭。野菜、草根、树皮，蚱蜢、甲壳虫、蟋蟀、壁虎都成了果腹的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发展到最后，就像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大灾之年，人甚至吃死人的肉。

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居住的条件尤为简陋，用竹子搭成无法遮风雨的吊脚楼，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家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允许种蔬菜瓜果，但收成归公。偷吃瓜果被定为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1976 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 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S-21 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1976 年 1 月柬共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 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在大屠杀的同时，民柬对外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到 1978 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取消城市、强制人口迁移、取消货币、取消商品、取消家庭，用暴力达成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庙宇、没有学校或公共设施，文明被践踏，百姓遭涂炭，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1984 年获得第五十七届奥斯卡三项大奖的影片《THEKILLINGFIELDS》就是描写红色高棉时期的苦难。影片根据真实的故事，再现了红色高棉时期大屠杀的生还者 HaingNgor 经受饥饿和严刑拷打、饱受战争恐怖、亲人死亡的经历。

在长期的抗法和抗美斗争中，柬越曾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但也有一些积怨。两国革命胜利后，越南企图通过越柬的“特殊关系”控制柬埔寨，实现其“印支联邦”的美梦。早在 1975 年 6 月就趁解放越南南方之机，出兵占领柬埔寨的威岛。而红色高棉不屈服于越南的压力，利用民众根深蒂固的仇越反越情绪予以反击。1977 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不断。年底因越军入侵鹦鹉嘴地区，柬埔寨宣布与越南断交，而越南则公开号召推翻红色高棉政权。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自信能轻易击败越南的任何侵略，不料事与愿违，仅仅两周时间，红色高棉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1979 年 1 月 7 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红色高棉执政时代结束。此后，他们溃退到柬埔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红色高棉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现任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HunSen）起了重要作用。洪森少年时代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后来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因拒绝屠杀穆斯林，反被红色高棉追杀，使他遂起倒戈的念头。1977 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他联合越军杀回金边，一举推翻了红色高棉。但毋庸讳言，红色高棉的迅速倒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几年倒行逆施的残暴统治，使得老百姓人心思弃。

1979 年以后的历届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谴责越南侵柬，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拒绝承认金边当局。1981 年 12 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 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不过，此时的西哈努克和另一位抵抗派领导人宋双都有了自己领导的小股抗越部队。1982 年 6 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1989 年 9 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 年 10 月 23 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并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从 1992 年 2 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二万二千工作人员，花费近二十八亿美元来帮助柬埔寨实施和平协定。这是联合国战后最大一次维和行动。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它先是不让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后又拒绝裁减军队，不断采取军事进攻，并多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人员的事件，最后是在大选前撤走驻各地的联络站。除红色高棉外，其他十九个政党都参加了 1993 年 5 月举行的大选。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得票百分之四十五点七，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人民党。大选后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1994 年 7 月 7 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红色高棉军队能征善战，且在根据地周围埋下无数地雷，政府军的围剿常常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对内政策仍然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终于激起内变。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并当作“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 年 8 月，英萨利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四千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 1997 年 5 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百分之八十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1997 年 6 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八个子女。红色高棉的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保存组织力量，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无所适从。1997 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7 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埔寨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波尔布特 1998 年 4 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毕姜、江裕朗等五位高级官员和马本、波尔布特遗孀梅松等人先后离开红色高棉。最后，12 月 5 日，肯农等八位将军率数千余部投诚，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回归。1998 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红色高棉的兴盛和衰亡，构成了柬埔寨当代历史的重要篇章。

从纪念馆出来，久久挥不去心头的压抑，我似乎看清楚了那些乞讨的孩子凄美的眼睛背后的真相，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地狱中嘶吼和哀嚎。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今天，屠杀的现场还能见到蛛丝马迹，但不久的将来，凄凄荒草会长起来，那些痕迹将被掩盖。几年后的孩子将不会知道，在那荒草之下，埋藏着他们父辈对生命的全部寄托和希望。

红色高棉屠夫，莫克“大爷”

红色高棉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建立的血腥政权一九七九年被越南军队和起义的柬埔寨人民推翻。从那以后，其主要领导人逃到丛林里，或死于火并，或不得已向政府投诚以换取赦免。最后一个在逃的领导人一九九九年三月落网，即将面临世纪末的审判。



此人名莫克（MOK），曾位居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常委，西南大区书记和军事首长但他的官衔今天只有很少人记得，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绰号塔莫克，意为莫克大爷，外国人往往以为这就是他的正式名字。

莫克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全家老少，包括姻亲，都一股脑儿安排进了“革命队伍”，把主管的地区变成了莫家天下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莫克的家乡在塔寇省（TAKEO）的犬卡(TRAMKAK)，他自己也就成了老太爷。随着他地位的上升，这里成了红色高棉的一个样板区，在红色高棉上台前两年这里就开始建立公共食堂，废除家庭了，这个政策后来推广到柬埔寨全国，成了柬埔寨革命的特色。

塔莫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女婿是犬卡区的书记，后来此人提升为高一级的 109 区党的书记，其职位由他的妻子，也就是莫克的大女儿接任。这个女儿一年后病死，其职位就交给了塔莫的妻兄。此时那位女婿又已官据省委书记和红色高棉海军司令了。塔莫的另外三个女婿也很了不得，一个是犬卡区的工厂书记，一个是第 120 团队的司令，还有一个是纵队指挥官。最后一个小女儿本人是犬卡区医院的院长，他的丈夫被父亲通过和柬共中央的关系安排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当了司令。莫克的四个儿子也是官运亨通。其中两个在犬卡区任要职，三个外放到五十五区（PREYKRABAS）当书记，第四个也外放到坎波特省(KAMPOT)当领导。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塔莫的另一个妻兄，担任了柬东 109 区（相当于省一级）的书记。

塔莫的家庭权力网不过是红色高棉家庭政治的一个缩影。在柬东中央，权力核心是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政治联盟，他们是在红色高棉政府中身居要职，起码是各级妇联主任。再如后来倒戈的红色高棉将领韩桑林，他本人是师长，他的弟弟和妻兄也是相等级别的干部。

如果以为这仅仅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就错了。这种家庭政治的更深一层原因是红色高棉的统治过于残暴，每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有难以计数的血债，到处是敌人，以至在自己的队伍里也只有血缘才是唯一可靠的关系。就拿塔莫为例，不说别的，单单死在他手下的红色高棉自己人就不计其数。一九七八年，他奉波尔布特之命从西南区来到东部地区，主持这里的大清洗。他说这里的柬东都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在六个月内杀了十万人。在平时，他常常亲自枪毙手下那些他稍有看不惯的人。因此，他另外还得到一个“屠夫”的绰号。杀人这么多，甚至手下人都动辄成为牺牲品，当然只有自己的子女和亲戚才信得过了。

“大爷”和“屠夫”这两个绰号典型地反映了红色高棉的一个特征：家庭权力和残暴统治的结合和相互依存。当然，有些人也许不这么看，他们会说：你看，塔莫把自己全家都奉献给了革命，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家庭。现在红色高棉已经覆灭，他们更会说这是满门忠烈了。只要看看大陆一些传媒在报导塔莫落网的消息时，只字不提“屠夫”的绰号，而是说他是红色高棉最“英勇善战”，受到战士“敬畏”的领导人，并强调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的报导就可以知道了。或许他们还会以为“大爷”是柬埔寨人民对这个屠夫表示“热爱”的称呼呢？

刽子手的忏悔

好象冥冥之中柬埔寨的无数冤魂在索命，不让红色高棉的杀人犯太平地告别二十世纪。在屠夫莫克大爷落网之后没几天，今天四月度，又一个红色高棉罪孽深重的在逃犯露面了。

此人名叫杜克（DEUCH），是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他原来是个教师，参加红色高棉后主管一个叫圣特波（SANTEBAL）的特工部门。民主柬埔寨建立后，对特波大大地扩充，成了红色高棉的盖世太保和契卡，代号是Ｓ２１，地点设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人称托士楞（TUOLSLENG）。


以殺人爲樂的典獄長杜克

这里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在所有送进来的囚徒中只有七人生还。除了那些在党内斗争中被清洗的老革命，例如内政部长胡容，新闻和宣传部长胡宁，副总理温威，国家主席团副主席索平等等之外，还有很多普通柬埔寨人。他们的罪名从越南代理人、苏联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到前朗诺政府的内奸等等无奇不有。

杜克主管的Ｓ２１不但是一架审讯和处决机器，还是一个拿人体作试验的实验室。例如档案中记载了两个十七岁的女孩，她们分别被用刀砍死和用棍棒打死，然后被放入水中，记下不同的尸体浮上水面的时间。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种原始而残忍的实验究竟有什么用途，它们倒更有可能是红色高棉以杀人取乐。

一九七八年底越南大军进入金边。杜克在匆忙逃离之前来既没有来得及销毁全部材料，也没有来得及把刑讯室的铁床上捆绑着的死去的囚犯解下，于是给后人留下了红色高棉这个人类历史上嗜血怪物的罪恶的铁证。今天托士勒的原址成了柬埔寨大屠杀的纪念馆，东南亚的奥斯威辛。但杜克本人此后一直不知去向。

一九九五年，一个现在已加入美国藉的柬埔寨牧师，名叫克里斯托佛，在柬埔寨为一个自称罪孽深重的前红色高棉干部作了洗礼。这个牧师自己的父母和兄妹都死于红色高棉之手。他说此人定期来听他的布道，然后决定入教，为自己罪恶的灵魂找一个归宿。但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

今年四月，香港《远东经济评论》的尼克，一个热心追踪前红色高棉人员的记者，在柬埔寨采访了一个自称是杜克的人。他的长相和谈吐，使人们毫不怀疑，他真的就是那个双手沾满了柬埔寨人民鲜血的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柬埔寨政府立即命令他前往有关部门自首。而克利斯多佛看了注销的照片后才恍然大悟，这正是自己四年前洗礼的那个神秘的信徒。

然而，使人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当乔森潘、英萨利和农谢这些更应该为上百万同胞的惨死负责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由于交出武装，走出森林和政府合作而心安理得地换取赦免，高唱“民族和解”、“让过去的一切成为过去”时，杜克这个人们已以早已失踪的罪犯却要自投罗网呢？杜克说，自从皈依了基督教，他日益感到自己过去罪孽的深重。近年来他一直隐姓埋名为国际人道组织在柬埔寨工作，但现在他要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接收审判。他说：“我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让我承担后果的时候了。”

人性确实是复杂的。上帝或许也确实具有让人洗心革面的作用。无论如此，杜克可以说是红色高棉那些“大无畏”的革命家中唯一一个敢作敢当的人。他的自首已经引起了乔森潘之流的惊慌，因为杜克无疑会在法庭上和盘托出许多他们难以逃脱干系的罪恶，到那时国内国际舆论会不会继续容忍他们逍遥法外便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纪末，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罪恶会不会被清算，人们将拭目以待。

漫长的审判



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经过长达6年的艰难谈判,终于在6月6日签署了审判红色高棉的协定。审判谁?审判什么?是否会将红色高棉神秘的历史昭显于世?随着诉讼程序的启动,一系列争议不休的话题将浮出水面.

美法力促诉讼

一场迟到了近25年的审判终将拉开序幕。“柬埔寨国际法庭”将在2003年底或2004年初审判依然活着的红色高棉领导人。

在1975年至1979年间,红色高棉的刽子手们杀害了200万柬埔寨人,这是历史上最惨烈的屠杀事件之一。

而如今,他们的领导人中只有两人被关进监狱。除了在1998年神秘死亡的红色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外,其他很多人仍然逍遥法外。

今年底或明年初,垮台近20年的红色高棉将被起诉。绝大多数人对此还不相信,不过,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已于6月6日在金边签署了协定。

这是十分重大的事件,因为这将是首次对一个共产党政权提起诉讼,而且全体柬埔寨人民还希望看到波尔布特最后的助手们出庭受审。无论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叔叔舅舅、侄子外甥,还是儿子女儿,柬埔寨几乎每家都有亲人被红色高棉处死。

据历史学家估计,死亡人数大约在170万至200万之间。而法国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在和平年代让百万人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死于酷刑、处决、饥饿和衰竭的政府。

有人记得,法国1977年首次披露了这个特别的亚洲集中营。此番披露并非媒体所为,而是源于耶稣会弗朗索瓦·蓬绍神父1977年出版的著作《柬埔寨,零年代》。再后来,随着1984年罗兰·若费《破裂》一书的出版,红色高棉柬埔寨才为世人所知。那里被视为置人于死地的理想国度。

可以说,提起诉讼并不容易,因为这是联合国和柬埔寨现政府长达6年艰难商谈的结果。华盛顿和巴黎立场一致,将会全力促成诉讼案的进行。

神秘的波尔布特



1998年4月18日,已是夏季般炎热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尸体,散发出阵阵臭味。在新闻记者拍摄完照片,证明他确实死亡以后,波尔布特被草草收殓。几个破旧的汽车轮胎,生前的床垫、椅子……都成了加速他尸体燃烧的工具。

审判谁？审判什么？主要被告波尔布特已死于 1998 年 4 月 15 日。不管怎样，由于有关他个人的消息很少，因此他还是备受关注。波尔布特活着的时候就很神秘。例如，他在 1975 年 4 月战胜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进而当上了柬埔寨总理，而他的名字和长相在两年后才为世人所熟知。

波尔布特只是他的化名，他真名叫沙洛特-加龙省萨，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学生时代虽然成绩平平，却在 1949 年获得了前往法国留学的奖学金。

于是，波尔布特来到了巴黎沃日拉尔街的无线电学校。他学习不努力，没能拿到毕业证书，并且失去了奖学金。

有人看到他在 1950 年夏天与法国一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在一起，还和当时受到斯大林威胁的南斯拉夫铁托政府有来往。不过，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波尔布特最后选择了斯大林。

法国至今还有一些波尔布特的纪念品，如他 1951 年在巴黎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党证。那些一心想看档案材料的人多年来恳求法国共产党开放各种档案材料，但都无功而返，因为波尔布特的档案根本就找不到。

1953 年，波尔布特回到柬埔寨，他拿起武器反对受法国保护的、年轻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又反对从越南乘 B-52 机赶来救援的美国人。

红色高棉与“越南大象”



乔森潘

波尔布特当时是胡志明的人，后来却杀了许多越南人，这是他不合常理的地方。胡志明在执政时期以铁腕支持印度支那共产党暴动。在抗击美国的战争中，可以说波尔布特是胡志明的优秀学生，因为他在 1975 年 4 月 17 日就占领了金边，而大约半个月之后北越的装甲车才开进西贡。

然而，他后来对越南却恩将仇报。

很久以来，波尔布特抛弃了勃列日涅夫，改为追随毛泽东。执政时的波尔布特只出过两次国，即到北京和平壤访问。胡志明的接班人们一直都记得这个完全是个偏执狂的邻居，他借着他们的力量成为胜利者，在边境对越南村民进行血腥杀戮，手段十分残忍。不过，他当时还算是“同志”，因为越南人长期以来宁愿保持沉默，不肯透露谈判的内幕。可他们却白费心机，因为波尔布特对此毫不重视。

1977 年圣诞节，越南大象终于首次给了柬埔寨蚊子一巴掌，他们派出了装甲车，意在警告。但于事无补，因为波尔布特不仅变本加厉，而且还在军队中大搞清洗运动，导致很多人死亡。

接下来的那年圣诞节，越南装甲车真的开进了柬埔寨。1979 年 1 月 7 日，事情得到了断，越南军队进入金边。

红色高棉政权垮台了，它执政时间仅为 3 年 8 个月又 20 天。它的领导人也都纷纷逃走。

谜底将被揭开

波尔布特及其手下再次走进丛林。

他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和幸存的百姓，后者惊恐不安，饿得皮包骨，犹如从一个巨大的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越南人和很快赶到的首批外国人看到的金边是一座有名无实的城市，自 1975 年以来，已有 300 万居民从这里离开，他们都被红色高棉赶到农村去了，庞大的迁移人群中还包括躺在床上输液的病人，有几千名柬埔寨人因此而丧生。接下来的事情不太为人所知，却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柬埔寨突然悄无声息，对外部世界完全封闭。几十万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柬埔寨人在稻田和森林里倒地身亡，他们有的是被枪击中后脑而死，有的是被套上塑料袋窒息而死，也有的是遭受酷刑而死，而更多的人则死于饥饿、疾病或体力不支。全体国民都被粗暴地赶去实施一些荒废很久的水坝计划或可笑的没头没尾的农业计划。

在波尔布特和他的助手们看来，存在着“旧人”和“新人”之分，这就犹如其他人所说的“下等人”和“上等人”。包括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城市居民等在内的“新人”需要经过“彻底改造”才能获得重生。在大屠杀结束后，医生、教师、工程师、僧人和艺术家等屈指可数。对红色高棉的起诉有可能就在区分“种族屠杀”和“等级屠杀”时引起争议。不管怎样，从原则上来看，法学家认为，这是对典型的“违反人性罪”的指控。

除非可以“拒绝作证”，否则波尔布特的助手们可能要在法庭上解释他们如何决定有步骤地消灭某个等级的同胞。对历史学家和外交学家来说，即将到来的起诉是一次破解波尔布特之谜的机会。这个谜很厚重，因为除了波尔布特的残忍堪与希特勒相比之外，究竟是什么样的疯狂才能促使他让柬埔寨这个小国与庞大的邻国越南为敌呢？他的国家毫无生气，只有 600 万居民，而越南则有人口 7000 万，并且刚刚取得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即便在亚洲，这也完全是个谜。

谁是受审者？

本次将受审的是那些最忠于红色高棉的人，只有十来个，也是红色高棉的高层。目前，只有两名重要人物在监狱里等待诉讼。77 岁的切春是波尔布特的独腿将军，人称“刽子手”，他的名字在 1996 年时还能让人不寒而栗。另一个就是红色高棉的秘密警察头子杜克。

在诉讼期间，外交家们将会特别关注著名人物乔森潘的表现。此人是波尔布特永远的“公关先生”，在红色高棉垮台前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这名前巴黎大学学生已受到西哈努克亲王大赦，目前在金边和拜林（位于泰国边境的红色高棉属地）之间过着宁静的日子。另外一名受到指控的重要人物、73 岁的英萨利也已获得大赦，他曾任红色高棉外长。他现在神气活现地往来于纽约和柬埔寨。正是他，从 1975 年起就处心积虑地让巴黎或其他地区的柬埔寨青年学生回国参加“重建”，所有这些人在回来时或回来后不久都被处死了。

75 岁的农谢长期以来躲在幕后，他也将曝光于众人面前。作为红色高棉秘密警察的负责人，他与波尔布特接触最密切。他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的所为没有丝毫的内疚。去年 12 月，他还出庭为红色高棉的屠林将军辩护，后者在 1994 年指使人绑架并杀害了 3 名年轻的西方游客。

这是对红色高棉的起诉，是对冷战的起诉。诉讼的内容限定在 1975 年至 1979 年波尔布特执政期间。让西方各国司法部大松一口气的是，此次诉讼不涉及 1980 年至 1993 年期间的事情。而这个阶段，红色高棉正是在西方诸国的支持下开始与苏联--越南相对抗。

以革命的名义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于世，主要见之于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于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但是过程和细节的有待填补或充实，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后果作出基本的判断：这是一场以社会重构为目的的民族和种族的大屠杀。所谓民族屠杀，是以 1975-78 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总的死亡人口为依据的，虽然至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计，从保守的 40 万到有所夸大的 300 万。一般认为， 100 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然而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 700 万到 800 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 100 万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 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autogenocide ）。种族屠杀是指在柬埔寨的 2 万越南裔全部死亡， 43 万华裔死了 21.5 万， 1 万老挝裔死了 4,000 ， 2 万泰裔死了 8,000 ， 25 万伊斯兰教徒（ Cham ）死了 9 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必须强调的是，有关红色高棉大屠杀的调查最初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西方学者的工作所建立的，而现今有关这个题目的出版物也多来自于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国家还力主由国际法庭来审判红色高棉。如果有人认为这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例如冷战思维、后殖民心态或国际霸权）的偏见的话，那么笔者希望这种观点不至于发展到对大屠杀这个基本事实也表示怀疑的程度。



國內新聞 National

冷牆記載暴政罪惡

哭泣的學校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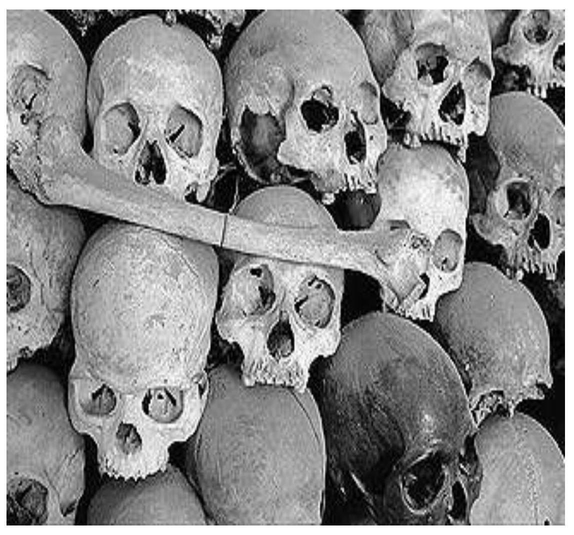
死亡攝影師
細述驚悸年代

報紙上報道的紅色高棉罪行



紅色高棉罪行見證人





事实上，对红色高棉的评价，在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声音，例如美国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早在 1976 年就出过一本由康乃尔大学两位学者撰写的《柬埔寨——饥饿与革命》(Cambodia : 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认为西方媒体故意把红色高棉的政策宣传得毫无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规模集体劳动，当时大屠杀还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柬埔寨独特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的编辑、左派理论家斯维奇（ Paul Sweezy ）在书介中说，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显示了人类能够克服最艰巨的困难，但首先必须忍受烈火般的煎熬，从中锤炼出所需要的人类原材料和领导力量”。此外，在大屠杀的材料逐步披露后，以反体制立场着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表示他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红色高棉的难民。





大屠殺紀念館油畫：割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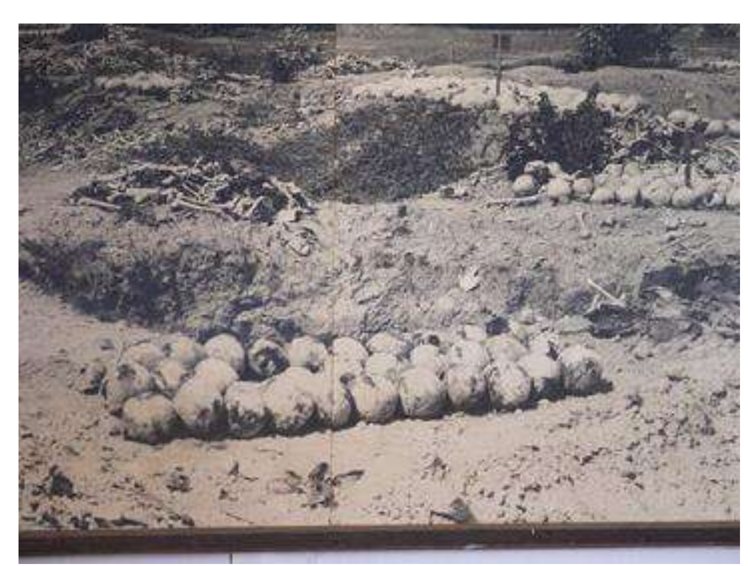


大屠殺紀念館油畫：鞭打犯人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随着国际上对红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过境迁，值得讨论的倒是美国 1973 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美国那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以后，转而把轰炸的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转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自己估计为 3 万到 25 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有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认为 1973 年死于美国轰炸的人口能和红色高棉四年统治时期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一、构成大屠杀的因素



柬埔寨在 1975-79 这四年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杀戮，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形成的：第一，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在三天至一周的时间里将全部城市人口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由于这项工作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此外就是对不服从强迫迁移的人和各类异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迁移过程中的有计划的屠杀。

第二，政治清算和镇压。这是针对前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务员，也包括朗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他们此时名义上还属于民族联合阵线）。处决的模式一般为用卡车将大量此类人员运至某个地点，然后或是用木棍殴打至死或是直接枪决。

第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存的从城市遣散的人员往往和农民一起被迫从事修筑水渠、农田和道路的工作，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粮食和生活物资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这种强制劳动下死亡。

第四，内部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 S21 ，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两万人。

二、超过列宁和毛泽东：红色高棉的目标

和二十世纪其他大屠杀不同的是，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而是在短短两年中匆忙形成的。从红色高棉领导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乔森潘（ Khieu Samphan ）和英萨利（ Ieng Sary ）在法国留学时的巴黎文献和波尔布特（ Pol Pot ） 50 年代最早发表的〈民主制还是君主制？〉的文章，直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前 1970 和 1971 年党内两次整风学习的材料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为夺权后系统而血腥的社会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只重复实践由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

但是自 1973 年开始，红色高棉的政策出现明显的转变，开始强调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首先是在党内开始作和越南决裂的准备。红色高棉原来是在以越共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领导人和主要干部都在越南住过或是由越共培养，但 1973 年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柬共领导集团有被出卖感，表示不受此协定的约束，加上历史上传统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间开始分裂，越南被称作“越南修正主义”，党内的亲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领导集团决心要走柬埔寨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抢在越南南部实现社会主义之前在柬埔寨实现社会主义。于是自 1973 年 5 月开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区开始了集体化运动，这是明显超越了当时所谓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规模上实行农村人口迁移，强制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区去加入合作化，为强制迁移甚至放火烧毁原来的村庄；关闭佛教寺庙，强迫僧人参加农村劳动；实行统一服装制度，一概穿黑色农民装；以及实行农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 1973 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转折点。柬共领导层抛弃了渐进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以在它控制下的农村开始实行的直接过渡为起点，制订了一个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然而和俄、中、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没有一个较长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更没有一个较充分的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理论分析、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在由于美国撤离印度支那而迅速到来的掌权时机面前，整个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远远没有达到那些大党在夺权时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柬埔寨的案例体现了一个极其粗糙的理论和一场国家规模的实验之间的鸿沟，红色高棉是一个匆促建立的体制，“匆促到了根本无暇去了解和关心柬埔寨社会的地步，一切先于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

然而历史的讽刺是，正是这样一个最缺乏掌权准备的党却提出了一个要一举超过所有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纲领，正如柬共第二号人物英萨利 1977 年所说：“高棉革命实验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我们正在做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适用于我们。”当 1975 年 9 月份一些在国外学习的柬埔寨知识份子回国时，看到的口号是“组织胜过了列宁，超过了毛泽东”。负责接待他们的高级干部对他们介绍说，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废除货币。他说：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但是后来停下来了，而我们每天在搞文革。他特别提到中国还在用钱，私人还可以养家禽，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国在柬埔寨的专家被认为是变“修”了，因为他们不但有工资，而且把钱省下来回国时在海关上买电器或缝纫机带回家。有一次中国专家问柬埔寨人一个新修的水坝花了多少钱，柬埔寨人半不满半骄傲地说：“这是人民修的，我国不用钱。”尤其是中国人（越南人也是如此）还各家分别吃饭，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实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据这些对比，柬埔寨干部认为：“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可以认为柬共是汲取了国际共运中所谓“右”的教训，企图把当时最左的中国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柬埔寨从一开始掌权就立即全面彻底地解决，不但“跳过过渡阶段立即进入社会主义”，而且是进入共产主义，以此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革命建立一个不同于中、越的模式（红色高棉当时认为东南亚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柬埔寨将成为新的中心）。这就是所谓“柬埔寨特色”。这是一个在革命胜利的第一天就彻底重构社会的模式，其开始付诸实行是 1975 年 4 月 17 日（即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在各个城市进行的大迁移。当时，红色高棉对城市居民和难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

这一直是红色高棉官方的解释。直到 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才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这种保密使得一项涉及到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几十万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 年 5 月 20 日（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金边召开了红色高棉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中央进城后的各方面政策。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件（至少至今为止没有发现），现在了解的内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后来和红色高棉决裂者如韩桑林（ Heng Samrin ，前红色高棉将领，后投奔越南并成为 1979 年建立的新政权领导人）等人的记忆拼凑起来的，其要点是：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等等。有的出席者还说废除学校和医院也在其中。韩桑林的回忆部分和这些内容相合，并且补充了废除货币是与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进行的；另外，他还说把人划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下详）也是在这次会上宣布的。值得重视的是农谢（ Nuon Chea ，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



三、以大屠杀为代价的社会重构

红色高棉社会重构的基础首先是从肉体上消灭一部分政治敌对份子，把他们清除出社会。根据波尔布特 1977 年 9 月 27 日广播的（当时他本人在中国访问）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总人口中有 2% 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 14 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象从 1975 年 4 月到 1978 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从总人口中清除出去，红色高棉独一无二的政策是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红色高棉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 4 月 17 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个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其具体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 存的“ 4 月 17 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

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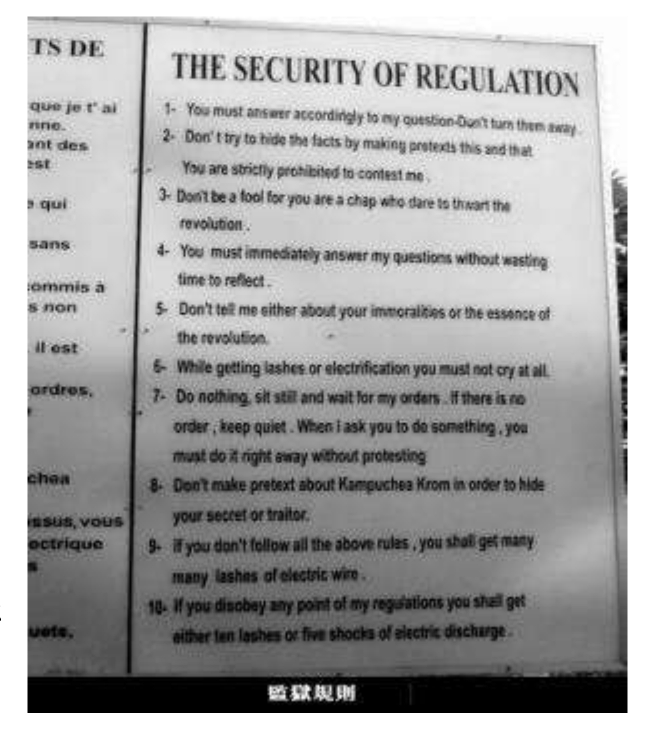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蹠众专政，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 1976 年 8 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 100 万被遣送到这里的“ 4 月 17 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捣乱，于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 4 月 17 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 4 月 17 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党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1976 年 12 月，当 S21 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 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



监狱规则

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着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 1978 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 10 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1/70-1/80 。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笔者认为，能否理解红色高棉四年多的执政史是对于人类理性的挑战。这并非说这里有甚么值得反复探讨的学术难点，而是从根本上说，人类理性有没有认识和解释这个空前荒谬和空前血腥现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自身历史的极限。我们有一个种族主义理论来对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基本解释，但我们有甚么理论能满意地解释一个政权在短短四年中关起国门，发明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灭绝自己民族几分之一的人口呢？

这里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供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思考，笔者自己同样深感困惑。或许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努力，而历史学只能起到一个收集材料，为这个体制的演变提供基本线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之后再回到形而下的范畴，从二十世纪革命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红色高棉的地位。或许这个角度能为上述问题再提供一点间接的线索。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于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主义压倒共产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 The Pol Pot Regime ）一书的作者柯能（ Ben Kiernan ）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 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 130 年》今年 4 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 4 月 5 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北韩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于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 1930 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 1970 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 1960 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 AK47 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 32 岁、女子 25 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着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 clan politics ）。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 Ta Mok ）。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

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 Tram Kak 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1999 年 4 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 1978 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 4 月 17 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 10-16 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

吴嘉

一

十月里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在金边南部一个编号为S－21的大屠杀现场，导游站在陈列遇难者骷髅的纪念塔神龛前，向我们讲述着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期的杀人故事。纪念塔共十七层，密密麻麻按性别、年龄排列的8000颗头盖骨，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白光。这样的杀戮场在柬埔寨不只一处，S－21杀戮场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杀的人最多，且多为“政治犯”。

这是一段悲惨而又令人尴尬的历史。中、美、法、俄等国因牵涉到各自的利益，都不太情愿翻这笔历史烂账。中国政府曾与波尔布特（Pol Pot，也译“波帕”）有一段特殊关系。波尔布特仿效毛泽东打游击战，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推翻美国扶持的朗诺（Lon Nol）政权以后，全国上下重演了一场比中国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期间，中国是红色高棉（也称“赤柬”）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当然中共支持柬共除了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当时的越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中国担心它独霸印度支那，对中国构成威胁。而在“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三方，西哈努克和曾任朗诺政府总理的宋双，无一有军事实力抵抗越军，唯有红色高棉具备相对的作战实力。若无中国的大力扶助，今天的柬埔寨恐怕就不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美国也有难言之隐。越战期间，美国要求柬埔寨助战，遭西哈努克的拒绝后，美国目标转向柬军方，开始扶持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法国时发动了军事政变。罢免西哈努克后，朗诺本人出任总统。忠于王室的柬埔寨子民哪里能接受国王被驱逐的现实，更不甘心屈服于傀儡政府，况朗诺本人庸碌无能，完全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时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柬共趁机坐大，这是美国料始不及的事，美国本指望通过朗诺打击红色高棉，实际结果却相反，朗诺政权恰恰给柬共打爱国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美国在越战中连连受挫，无力增援朗诺，眼睁睁地看着红色高棉势如破竹，于1975年推翻了朗诺政权。越战时，美国在轰炸北越的同时，为阻断红色高棉的增援，曾轰炸过柬埔寨领土，柬埔寨平民的伤亡更激起人们的反美情绪。因而柬共扛起的抗美救国的大旗，对于仇恨侵略者的柬埔寨人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自打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柬共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旗帜。而美国也不会坐视越共的扩张，尽管柬共的迅速崛起自然是美国没想到也不愿看到的，但是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

二

1975年4月17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Year Zero）。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新人”下乡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几昼夜间，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住所，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

波尔布特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的一号命令与林彪如出一辙，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柬埔寨人Loung Ung在她的英文自传《他们先杀死我父亲》里提到，1975年4月17日那天，柬共军队开进金边，对老百姓大喊：“不准携带行李，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取观望态度。后因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金边所有的居民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在内。顷刻间，200万人口的金边不见人烟，成了一座死城。

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灾难降临之际，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我在金边结识的Vattanac银行总裁、

柬籍华人江女士告诉我，她母亲不仅携带了金银首饰，还临时缝制了一条条细长米袋，让他们兄弟姐妹缠在身上，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她全家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做手纸用。

与江女士一样，Ｕｎｇ一家属于金边的富有阶层，离开金边时，全家九口还开了一辆马自达，免了最初几天的跋涉之劳。当第三天汽油耗尽时，他们意识到没处加油，只好将车子丢弃在路旁。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倒退到连石器时代也不如！

金边沦陷之后，波尔布特掌权，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他的铁腕统治首先从衣食住行开始，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服饰取舍，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长袍或毛式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运动头。红色高棉脖子上侧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毛巾，它比中国的红领巾更实用，因为它还能用来擦汗。

“吃”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一天两餐，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Ｕｎｇ说，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由干变稀。Ｕｎｇ在书中生动地描述她本人——一个当时只有六岁的小女孩——怎么盯着沉在碗底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慢慢数着咀嚼的情景，还有那刻骨铭心的饥饿。没想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幽灵十几年后竟然又在柬埔寨现身。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蚱蜢、甲壳虫、蟋蟀成了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常常是等到尸体散发恶臭，令人无法忍受时，才由当地村民就近挖坑，将爬满蛆的尸体堆进坑里。最后有人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很多人死于误食有毒蘑菇。

至于“住”，这些城市“新人”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天，即永远失去了他们在城里的房产。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他们安身在简陋、难遮风雨的吊脚楼里，家徒四壁。他们白天要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红色高棉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没人敢承认自己做过业主、老板，最多说做过小买卖，更不能与朗诺或越南有过任何瓜葛。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把式，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人被怀疑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整肃。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他们不能存下，被告之要拿去与中国换武器。自家允许在院子里种蔬菜瓜果，但是收成归公。江女士告诉我，每天都有人到她家数瓜果个数，少了便被定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因为劳累、饥饿，人人形销骨立，衰如槁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弄得人心惶惶，生灵涂炭。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据美国的柬埔寨问题专家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调查，这期间，有一百多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

“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概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焚书坑儒，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好莱坞大片《杀戮场》（Ｔｈ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就是以一个医生为原型，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连会说外国话也是死罪。红色高棉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

这些故事，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不同的是，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柬共杀人如麻，光是被处死的政治犯就超过了十万。国门被封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

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中的每一天都是在杀人中度过的，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我参观的Ｓ－２１杀戮场，就是在八十年代初被发掘的，挖出了近９０００具尸体。听导游说，沟渠对面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纪念塔实在堆不下那么多头骨。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向导顺手拿起几个头颅骨，指给我们看头盖骨上斧头砍出的裂痕，又指着有子弹眼的头骨说，“他们算幸运的，因为痛苦少一些”。最残忍的是幼儿妇女。对儿童，暴徒们倒拎着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

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我踩在万人坑旁的泥土上，无论怎么小心都无法绕过死人的衣服碎片、牙齿、和人骨，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头上黑云盖顶，没多久雨点打落到脸上，顷刻间细珠化为瓢泼，向导快速领我们来到一个草棚下，继续着他的控诉。暴雨带来了一阵风，我本能地深吸一口气，突然，我闻到一种别样的气味，仔细琢磨，天啦，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一座座万人坑里早已长出了肥沃的野草，但因为尸体太多，二十多年过去了，居然还隐隐散发着恶臭！

从杀戮场出来，久久挥不去心头的压抑，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冤魂在炼狱般地嘶吼和哀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

三

导游接着领我们去Ｓ－２１犯人集中营参观。这是当时由一所中学改造成的集中营，现在作为金边唯一的罪恶馆对外开放。这里关押的全是政治犯及其家属，包括躺在母亲怀里的婴儿，这座集中营先后处决过近两万人，进来的囚徒差不多全死在里面，生还者总共才七人。红色高棉搞政治清洗与文革如出一辙。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悲惨的是，这些冤假错案如今连平反都失去意义了，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每一位囚犯死去前必须拍两张半身照片，供红色高棉存档。馆里陈列着无数的人头照，有的显然是死后补拍的。照片上的妇女，包括小女孩一律齐耳短发，个个脸上显出疲惫、哀戚、痛苦、恐惧、和绝望的表情。可以肯定，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美丽的人生和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与这些曾经是活生生的人面对，站在他们饱经折磨告别人世的土地上，我的毛发根根竖起，我的心因痛苦而哭泣。在后来的几天里，闭上眼睛我就看到森森白骨，沉重的心情久久挥之不去。

对于这场革命，法国学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Ｂｉｚｏｔ曾亲身经历。当时他生活在柬埔寨，专门从事佛教研究和吴哥窟修复工作。１９７１年，他被红色高棉以美国间谍罪名逮捕，在俘虏集中营里渡过了一段九死一生的岁月。30年后，他打开封存的记忆，写了一本书《大门》（Ｔｈｅ　Ｇａｔｅ）。书中除了详细叙述他在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还对关押他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Ｋａｎｇ　Ｋｅｃｋ　Ｉｅｕ，又名杜克Ｄｏｕｃｈ）做了生动的勾画和研究。此书的可读性极强。这个杜克原是教师出身，加入柬共的特工部门后，亲手组建了柬埔寨的盖世太保。正是他把这座高中改造成代号为Ｓ－２１的监狱，并亲自任指挥官。难以相象，这个曾经为人师表的书生竟是红色恐怖的始作俑者之一！

当然，波尔布特才是大屠杀的元凶。早在柬共上台前，波尔布特就师从中共。１９６５年波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他恨不得立马回国付诸行动。与毛泽东的见面则在文革初期，毛对于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坚信不疑，正是豪情万丈的时候。毛的一番"谆谆教诲"，使波尔布特热血沸腾，像是被注了一针强心剂，巴望着早日在柬埔寨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他把毛的极左思想发扬光大到了极致。毛只是让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波则强行把所有城里人赶到农村搞合作化、接受再教育，极力镇压不愿服从的老百姓；毛利用群众斗群众，波索性把军队开来杀人。"大跃进"、"千里马"、"青年突击队"等名词也被波尔布特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柬埔寨。假如红色高棉不倒，波尔布特肯定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列名于马恩列斯毛之后的不二人选。

就是这么个倒行逆施的政权，还照样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扶持。虽然，在后期中共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文革一样的"极左"，但是，同红色高棉反目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何况中共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抖出去会影响中国的形象。所以中共明知这是一块烫手山芋，还不得不继续捧着它。邓小平东山再起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首倡"发展是硬道理"。先专后红的同时，邓不忘为柬埔寨的难弟拔刀相助，于１９７９年打了一场再荒唐不过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来以解赤柬之围，二来教训越南。那一年，我的许多同龄人不明真相，戎装上阵，捐躯流血在猫耳洞前。徐良的一首"血染的风采"，赚了多少不知情人的眼泪！邓小平一生功高于天，向来大彻大悟，发动了这场中越战争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邓为什么在百废待兴、财力不支的国情下武力进攻越南？有人分析邓想借军事行动扩建嫡系部队，并以此举在国际上"扬威"。究竟为什么，恐怕只有老人家

自己有数。

四

被称为“杀人魔王”、“暴君”的波尔布特至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谜。红色高棉垮台后，他逃到泰国隐居起来，直到１９９８年离开人世，１７年没露面。美国学者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先后采访了许多波尔布特身边的人，试图解剖波尔布特的内心世界，最终写成政治传记《第一兄弟》（Ｂｒｏｔｈ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ｎｅ）。中学教师出身的波尔布特，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留学法国接触马克思主义，直到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的超级领导人，给人的印象竟然是温文儒雅、有修养、待人热情，没有半点残暴性格的迹象和背景，这一点倒是和他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极为相象。就连波尔布特的那些党内变节者，至今仍把他比作“圣人”。作者写完书也没吃透波尔布特这个人，“莫非他的友善是伪装的？难道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政治动物，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或两者兼备？”据说波尔布特在临终前，对自己一生的行径毫无悔意。他言之凿凿地称他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念，而不是残杀人民，因此“我问心无愧”。看来，波尔布特在死不甘心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产主义风雨飘摇、沉疴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高，就在行将被缉拿归案之时，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死去。波留下的阴影一时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尸首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权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拉到海牙国际战犯法庭受审。树倒猢狲散，波尔布特死后半年时间，他的左右手乔森潘（Ｋｈｉｅｕ　Ｓａｍｐｈａｎ）及农谢（Ｎｕｏｎ　Ｃｈｅａ）便向当局正式投诚，算是给红色高棉划上了一个句号。而隐姓埋名多年的警察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接受审判。

红色高棉的残暴注定了这个政权是兔子尾巴，但是，柬共能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却得益于越南的入侵。对于促成１９７９年越南的入侵，现柬埔寨王国政府总理洪森（Ｈｕｎ　Ｓｅｎ，现译云升，又译韩森）起了关键作用。我在金边期间，因工作关系结识了洪森的高级特别顾问、加华银行董事长、总经理、华侨方侨生先生。方先生送我一本有洪森本人亲笔签名的中文传记《柬埔寨三朝总理》，由中国学者邢和平撰写，方侨生作的序。这本书为研究柬埔寨政治的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其中有大量笔墨描述了洪森对推翻柬共起到的作用。

文学才子洪森少年时代出于对西哈努克的热爱和对“美帝”的义愤，投笔从戎，参加了红色高棉，从排长一步步晋升到师长。后来发现波尔布特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人民，他的信心开始动摇。洪森因拒绝屠杀穆斯林，反被红色高棉追杀，遂起倒戈波尔布特的念头。１９７７年，洪森率部逃亡越南，不到两年联合越军杀回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对于这一段历史，洪森始终有一种“耻辱的隐痛”。由于历史的原因，柬越两国有世仇，洪森的政敌以民族尊严为由，揭洪森这块伤疤，奚落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还有人攻击洪森以红色高棉的悍将起家，也应为大屠杀承担部分责任。而洪森强调自己对国家的赤诚可昭日月，去越南是无奈的选择。他认为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之下，洪森冒死潜入越南，演出了一场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

所以日后人们一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无论“侵略”或是“解放”，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越南没有出兵，红色高棉不会在四年不到的时间里垮台，柬埔寨人民的灾难只会更深重，美国今天要对付的，恐怕就不只一个北朝鲜了。

发布日期：二〇〇五年五月十日

血色记忆

（一）：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英勇善战的年轻军队打下了金边。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军队进入金边

经过数年的磨练，红色高棉在战火中迅速成长，他们走的也是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力量逐渐壮大。金边被围城了，美国人扶持的那个傀儡朗诺灰溜溜的逃到了法国。金边兵不血刃的拿了下来，柬埔寨解放了，革命终于胜利了！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神秘的红色高棉最高领导层做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重大决定--将金边的 200 多万居民和其他城市的居民全部疏散出城到农村！！其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自豪的说："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壮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特，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从事中学教师的工作。他也许是世界上最神秘的领导人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养成了他不轻易露面的生活习惯。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为未来勾画出了一副美丽的蓝图---不再有剥削不再有贫富！实现集体化破除私有制！为了这个美丽的梦想，波尔布特和他的伙伴们雄心勃勃的提出了 "超大跃进" 的四年计划。

愿望是美丽的，但不能和现实脱节，不顾本国的实情一味的追求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其结果只能是失望。而红色高棉却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1975 年红色高棉的外交部长乔森潘来北京接西哈努克亲王回国时，病塌上的周恩来总理善意的向客人提出了最后的忠告。3 个月后总理逝世了，他的最后忠告并没有打动波尔布特。

超大跃进造成了一场灾难，几乎与此同时，红色高棉内部又发动了一次大清洗运动。大批高级官员和军队领导被关押，几乎所有的供词都承认犯有反党罪行并供认自己是外国情报机关的特务，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被处决，具体数字无从知晓，但红色高棉十三位最高领导人之中最终只有八位在大清洗中活了下来，其中，由康克尤任主任的 S-21 集中营原址现在被保留了下来，是越南工兵的杰作还是红色高棉清洗的地狱实景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审讯记录来看，相当让人吃惊其中的血腥和残酷。

大清洗造成的危害远远要大于超大跃进，随着大量的党和军队中坚骨干 "特务" 被揭露和处决，人人自危，越南人乘虚而入，1977 年 12 月，越南扶持了原红色高棉的一个师长韩桑林建立了傀儡政权，并在边界上发生重大武装冲突，美国《时代》杂志毫不掩饰幸灾乐祸 "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国家开战啦！" (COMMUNISTS AT WAR!)，1978 年 12 月 24 日，越南 12 万军队打进了柬埔寨，79 年 1 月 7 日攻克金边，把红色高棉重新赶进了丛林之中。历史在柬埔寨划了个圈。

迫于全世界的压力，十年后越南人终于撤军了，把柬埔寨留给了韩桑林的接任者洪森。此时的柬埔寨政治军事舞台上活跃着洪森、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之子拉那列三之主要力量。谁也不敢对丛林之中的红色高棉有一丝的小窥，毕竟那些久经沙场的高棉军队的战斗力是强大不可战胜的。正因为有这些资本，波尔布特敢对联合国的停战协议置若罔闻。期间，红色高棉外交负责人乔森潘曾经回到金边参加和平谈判，但被愤怒的群众冲入府邸打的头破血流。政府军的攻势并没有摧毁红色高棉的阵地，波尔布特仍然有一支无可匹敌的力量。问题依然出在内部，波尔布特此时仍然念念不忘要开展一次新的清洗，1995 年促成了军队内部叛逃的开始，97 年未经宣布审判便以暗杀方式处决了国防部长宋成夫妻和 9 个孩子全家更让忠心耿耿的部下心寒，很快宋成的部下哗变包围了波尔布特，走投无路众叛亲离的波尔布特做出了一生中最无奈的决定--投降。

多灾多难的柬埔寨终于得到了久违的统一和和平，波尔布特在法庭上面对昔日的部下苦苦求命，

被判处终生监禁，数年前郁郁而终，洪森掌握了政府实权，红色高棉辉煌一时却流星瞬灭，其兴也勃其亡亦忽也。

（二）在死亡大使的黑色巨翼下

2004 年 12 月 20 日，文/陶杰

柬埔寨金边赤柬罪恶馆的导游是一个中年华人，他今年四十九岁，但容貌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年。他述说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由柬共「解放」之后的悲惨经历，三天之后，所有的城市人都要疏散到农村的「新经济区」。为了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柬共领袖波尔布特废除了货币，杀尽全国的知识分子，金边人驱赶到农村，每天耕地劳动。导游说：他的妹妹在田里扭伤了脚，被赤柬带走，从此没有再回来。赤柬民兵诱哄四五岁的小孩：昨天你有没有东西吃？小孩如果说出父母昨天在田地偷了点农作物吃，赤柬马上把全家抓起来杀掉。

赤柬杀人有许多充满「创意」的方式：叫三个人挖一个土坑，迫他们跳进去，把泥土填上，剩下头颅露在地面，然后往人头淋上汽油，搁一锅水在上面，在一排活人头上点火，把人头当做火炉来烧开水。赤柬为了节约物资，杀人不用一颗子弹。导游说：每天到了吃饭的时间，赤柬喜欢杀人为乐，走进「人民食堂」，随便把几个人叫出来，就可以反绑双手，拖到食堂门外用利锄杀掉。天天吃饭之后，只要狱卒般的赤柬没有叫上自己的名字，就庆幸多活了一天。

赤柬杀人喜欢鼓动十四五岁的少年儿童。这是由毛泽东利用红兵统治中国时学来的。两个赤柬「红兵」，就可以押解二百个成人上杀戮战场。许多人问：「你们明明可以反抗，为甚么没有人做？」

导游叹一口气：「反抗是没有用的。」怎会没有用呢？据报道：「九一一」那天，拉登的恐怖分子骑劫飞机想撞向五角大楼，几个恐怖分子制服了机师，还在机舱与几百个乘客对峙。有人高叫一声：「拼了吧！」（Let′s roll！）几十人冲上前向恐怖分子反击，但飞机终于还是坠毁了。但在最后的生死关头，Let′s roll 这句话，成为拒绝向邪恶屈服的人性呼声，成为领导全人类反抗恐怖的美国精神。

赤柬统治柬埔寨三年，屠杀了二百万人口。全国有三百多处刑场和万人坑。两个赤柬的红兵提原始的步枪，就可以驱赶两百人去刑场。在漫长的死亡之旅上，没有人敢叫一声：Let′sroll——拼了吧——二百人如果一起反抗，可能会有几个人牺牲，但一定有人能逃出生天。

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军俘虏了两万多国军战俘，也只用了两百多人，在短短一两天内把两万多战俘全部枪决，许多历史专家也质疑过：面对两百个敌军，两万多名俘虏为甚么不反抗？

在极度的恐惧下，或许脆弱的人性会全面崩溃，最终连拚命求存的微弱冲动也会消失。或许人人其实在盘算：万一集体反抗时，牺牲的是自己，成全了别人活命，那又跟大家一起毁灭有甚么分别？为甚么我要付出代价，成就其他全不相识的大多数？如果人人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两个赤柬小红兵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干掉两百个成人。两百个日军，也可以在长江边架起机关枪，把两万名国军战俘顺利分批枪杀。

当有时世界成为一座屠场，一些人类选择沉默地受戮，是最接近羊群有秩序地走向屠房的时刻。如果世界是一座森林，有狮虎狼豹，有的民族注定成为生物链中的羊群。「为甚么你们当时不反抗？」我追问。「反抗是没有用的。」导游答。「那么当时杀人的赤柬，许多今天还活吗？」「有四万多人，他们都已缴械，现在都生活在柬埔寨西北部的一个特区。」

「你们见到二十多年前的这些凶手，有想过复仇吗？」我问。

「没有用的，」导游痛苦地摆摆手：「冤冤相报何时了，柬埔寨人没有想过要复仇，让过去的都过去吧。今天，我们有一口饭吃，每月领得到薪金，已经觉得很幸福，今天稳定的局面是来之不易的。」

「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这句话很耳熟，好像在别的甚么地方也听过。柬埔寨人用这句话麻醉了自己，就这样，杀人狂魔波尔布特，一直到一九九八年才得以善终，死于心脏病，死得很安详。他的副手、外交部长乔森潘还活着，最近出版了回忆录，说当年的灭族是波尔布特一人的主意，与自己无关。

柬埔寨总理洪森不想审判赤柬，因为他自己也曾是赤柬。洪森的政府贪污腐败，但洪森有一句名言:「贪污是不会杀人的。」历劫余生的柬埔寨人很信服这句话，他们认同「稳定的局面来之不易」，他们很拥护洪森两个小赤柬兵「搞掂」了两百人，其实是有原因的——许多年前，我在英国看过一部关于赤柬屠杀的纪录片，片中的记者问国王西哈努克同一个问题，西哈努克说：在柬埔寨流传了一个上千年的传说——有一天，柬埔寨终会遭到天谴，上天会派来一批黑色的天使，把柬埔寨人全部灭绝。当赤柬出现时，他们一律戴竹帽，围一条红色的格子领巾，而且他们全身都穿上黑衣。

一个民族的宿命就是如此决定了的：一半是神话，一半是现实。再向导游追问下去，他快要流下眼泪了。对一个地狱的过来人，这样的追问是不公平的。我没有再说甚么，与他一起沉默下来。我想起了电影《日瓦哥医生》最后的一句话：在那样的时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世上所有的屠房，何曾见过羊群会突然反抗？那些可怜的鬈毛动物，也许早已看破了宿命，它们或许只一心想早日还清前世的罪孽，一头头乖乖地排队走向高高举起的屠刀。

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



（左图）Lach Kolyan 今年 50 岁，是一名柬埔寨 Tuol Sleng 监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个博物馆专门展示红色高棉臭名昭彰的监狱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Lach Kolyan 向记者展示一幅 Huot Bophana 的肖像。Huot Bophana 与她男朋友 Ly Sitha 被红色高棉政府抓到 Tuol Sleng 监狱，严刑拷打了一个月，然后被乱棍打死在刑场上。他们之所被抓是因为两人的情书被红色高棉安全部门当成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泄密的证据。在 Lach Kolyan 背后的大幅照片就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图片摄于 2002 年 2 月 7 日。

柬埔寨：流泪的骷髅在嘶喊



这个占据着 S21 博物院整面墙壁的柬埔寨地图，是由无数的骷髅头颅砌成的。

红高棉血洗柬埔寨，是一段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历史。

在红高棉统治柬埔寨期间（1975 至 1978），究竟多少了死于疯狂的大屠杀，迄今没有正确的统计数字，历史研究者各根据一己的研究资料而作出不同的估计，由保守的 40 万而至使人侧目的 300 万，众说纷纭。一般上认为，一百万是一个可被接受的估计。对于当时人口只有八百万的柬埔寨来说，这可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去年十二月，来到了柬埔寨，分别到首都金边(Phnom Penh)和第二大城巴䣕邦(Battambang)恶名昭彰的“杀人场”去看，尽管过去读过许多有关红高棉的资料，然而，当我站在这些以具体证据无声地对波博政权发出血泪控诉的历史场景前，我依然止不住地战栗了。有好几天，在旅馆里，我连续地发着噩梦，梦醒时，汗湿衿被……



金边 活的见证 S21 博物院

从外表上来看，这所建筑，和普通一般学校并无两样，楼高三层，楼前有宽敞的草地。然而，在波博掌政时，它却是杀机重重而人人闻之丧胆的“地狱”。

1975 年，波博接管政权后，便把这所原名“Tuol Prey”的学校改名为“牢狱 21”（简称 S21），而这所牢狱，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扣留所，主要用以审讯、施刑与处决“党内敌人”。被拘捕的人，包括了前龙诺政权的军政人员、一般的士兵、警察、公务员、亲越分子、政治的异己分子、外国间谍，还有，龙诺政变前的王室成员，等等。根据资料显示，当时这儿曾扣留了大约两万人，然而，到了 1979 年 1 月越南入侵时，只剩七人，换言之，所有的扣留者都被杀害了。

现在，改为博物院的 S21，已成了历史“活的见证”。

有一位家人悉数死于红高棉时期的妇女告诉我，S21 恒远是柬埔寨人心中最大的梦魇，她第一次来这儿，便因触景生情而放声大哭；之后，每次带朋友前来，都悲伤难抑，她说：

“亲人全都死光而自己苟且偷生的感觉，孤独到了极点而又恐怖得难以复述，亲人被杀的伤痛，是一生一世的疮疤，不揭也痛；到 S21 去，等于亲自把自己身上永世难愈的疮痕大力抓至溃烂！”现在，她再也不敢、不肯、不愿涉足那儿了！



骷髅头空空的眼窝里，盛满了悲哀与痛苦、愤怒和不甘。

失去身分与尊严

任何人，一被扣留，便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身分和为人的尊严，仅仅剩下一个任人使唤和奴役的号码以及一副任人凌辱和凌迟的躯体。在 S21 博物院的陈列室里，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当年拘留者的照片。这些拘留者当中，有少数来自澳洲、法国和美国。其中两张照片，拍摄的是同一名西方人——初入 S21 时，他英姿焕发，精神奕奕；可是，拘留了一段时日后所拍摄的照片，却瘦骨嶙峋，元气尽散，充分显示了他饱受虐待的痕迹，另一张极具震撼性照片，拍摄的是一名拘留者站在一堆半死不活的人前面，脸上流露出一种恐慌到了极点的迷茫、惊悸到了极点的呆滞。


殘害犯人的各種刑具

惨无人道的刑具

另一间陈列室，以油画的方式绘出了波博政权多种施刑及杀人的方式，诸如：将拘留者的双手锁死在一个装满蜈蚣的箱子里，让蜈蚣胡乱噬咬、以强力电流击后脑、将十指的指甲剥落再倒上酒精、用大头短棒猛击头颅，等等。

S21 也保留了当年的行刑室和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处处浮动着令人汗毛直竖的阴影。实际上，任何人一进入 S21，便立刻嗅着了死亡的气息，然而，让许多拘留者不寒而栗的，倒不是死亡的本身，而是那种种叫人求死不得的酷刑。

S21 博物院内，有张以骷髅头砌成的柬埔寨地图，占据着整面墙壁，个个骷髅头空空的眼窝里，都流满了呼救无门的恐惧、盛满了饱受煎熬的痛苦，溢满了惨遭毒手的愤恨……

送往集中营处决

在 S21 的拘留者当中，有为数一万七千余名拘留者曾被送到一个唤作“Choeung Ek”的死亡集中营里处决。

Choeung Ek 距离金边约有 15 公里，原本是盛产龙眼的果园，但却为波博政权化作阴森恐怖的杀人场。波博军人将逮捕者编成五十人一组，由第二组杀第一组，再由第三组杀第二组，余此类推。由于子弹短缺，波博军人采取了快捷直接而又残酷已极的杀人方式——用短棒、锤子、锄头猛击头颅，之后，抛入预先挖好的大坑里，集体埋葬，一个大坑有时埋葬的尸体多达四五百具。极端极端恐怖的一种情形是：头颅被击的那一个人，被抛落大坑时，只是暂时昏厥而已，等他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被其他血流如注的尸体和自己无法遏制的恐惧硬硬地压着，在尸臭和鲜血里，慢慢地饿死、怕死、或血流尽而死。

柬埔寨人忆起往事，全都余悸犹存而又气恨难消地指出：波博政权最使人痛恨的一点是：它转变人的思想，扭曲人的个性，致使最纯良的青年，也敢于杀戮最无辜的人，甚至杀害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


一個兒童站在白骨塔前

外观庄严的灵骨塔，“囚禁”着八千余个流着泪在嘶喊的骷髅。

血渍斑斑的死亡集中营

Choeung Ek 杀人场原是一个风光优美的地方，绿草如茵，湖水湛蓝。去参观那一天，天气极好，回旋着的轻风，淡淡的绿色，缠在身上时，衣裙也闪出一层又一层变幻不定的绿光；然而，当我站在那一个又一个大坑前，看到迄今仍然未能清理干净的破碎衣物，仿佛看到了无数无数的阴魂化作了一道又一道闪闪烁烁的绿光，不甘地徘徊、幽幽地哭泣。

无辜稚嫩骨头

最惨绝人寰的是，有棵树，注明是孩童“魂归离恨天”的地方——残无人道的红高棉官兵，抓着幼童双腿，以头击树，将他们活活打死。现在，大树旁边，还放着一堆无辜的稚嫩骨头，纵是铁石心肠，看了亦泫然欲泣。据说八十年代初期，整个场地还弥漫着浓浊刺鼻的血腥气和叫人欲呕的腐尸味。

杀人场旁边，就是那驰名世界的“灵骨塔”。高达十五层，八千余个从 Choeung Ek 挖掘出来的骷髅头颅，按照年龄和性别，“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地排列着。许多骷髅头颅的后脑勺子惨惨地裂开，充分地说明了致死的主因。骷髅不语，周遭死般的安静，然而，只要稍稍竖起耳朵，便可以听到骷髅的嘶喊，凄厉、凄凉、凄苦、凄惨。

一名柬埔寨人以异常沉痛的语调告诉我：在红高棉时期，整个柬埔寨，没有任何一户寻常百姓的家庭能避开死神狰狞的魔掌；甚至，“诛连九族”的例子比比皆是。



S21 博物院的档案照片---苟活的人和一堆半死的人囚禁在一起，在那迷茫和呆滞的表情下，有极度的恐慌和惊悸。

无理性大屠杀

除了全无理性的大屠杀之外，红高棉掌权时许多激进的政治措施，也将许多人民推入死亡的深渊。

在杀人场里，有个告示，字字重若千斤而句句泪长淌：

“红高棉掌权之后，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和大小学校，捣毁历史性的建筑，把柬埔寨的土地和清水转化为血海和泪水，摧毁文化与文明建设，将整个国家化为一无所有的沙漠，回返荒凉的石器时代。

这的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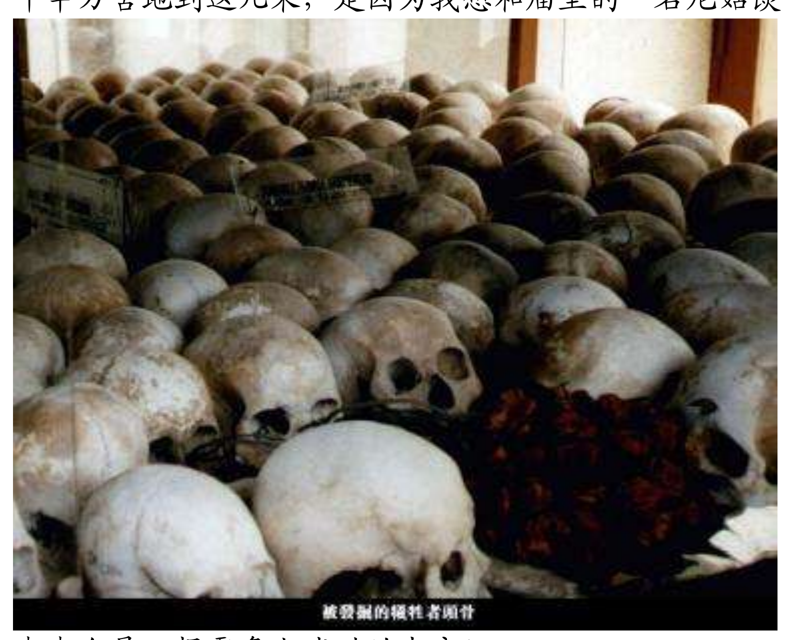
巴郸邦庙宇改成的杀人场

位于西北部的巴郸邦，是柬埔寨第二大城。

如果说金边的杀人场是令恶心反胃的，那么，巴郸邦的杀人场则阴森诡谲得叫人头皮发麻；那种极不人道的残酷，着实让人切齿痛恨。

这所庙宇，建在高达四百余米的高山上。行行重行行，攀爬又攀爬，气喘吁吁地爬了不知多少数也数不清的梯级，来到梯级尽头处，竟是一片乱石草丛、稍稍歇息，又再爬、爬、爬、啊，到了，终于到了。

千辛万苦地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想和庙里的一名尼姑谈谈。



森森白骨，揭露多少残酷的史实！

亲睹种种暴行

这位尼姑，在红高棉时期原是村里农妇，红高棉官兵下令她搬到山上这所由庙宇改成的杀人场，下厨主炊，她也因此亲眼目睹了红高棉官兵的种种暴行。红高棉政府败退后，看尽人生苦难的她，也同时看破红尘，削发为尼。由于她只会柬埔寨语，我们特地找了一名通译壁菜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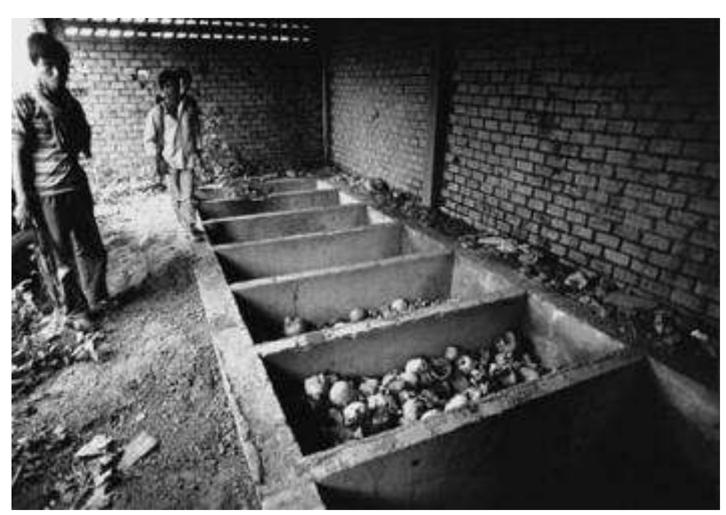
通译壁菜向她表明来意，她双手合什，脸上浮起平静恬和的微笑，表示欢迎。

首先，她带我们到庙宇里面去。这种神怪的殿堂，在红高棉时期，是鬼哭狼嚎的施刑处。在一个角落，有个石灰砌成的小圆池，当时，红高棉官兵在这儿审讯政治犯。倘若他们不肯吐露实情，官兵便以利刃割他们的喉咙，让他们的血在小池里一点一点地流干、流尽。杀人如麻，当军队在此撤退时，整座庙宇，这里那里，全是斑斑血迹。

接着，她带我们到庙宇外面的行刑处。山壁的铁钉上，还“挂着”锈渍斑斑的手铐。政治犯被铐在这儿，审问、拷打。　白森森的骨头

然而，巴郸邦杀人场最使人震惊的，是红高棉利用这儿的险恶的自然环境，神不知鬼不觉地杀害了两万余人。在这山上，有三个深达四十余米的山洞，男人、妇女、小孩，分别被带到山洞处，反绑双手，以短棒击打后脑，然后，推落下洞。

现在，有关当局在其中一个山洞铺设了石级，我们沿着石级走下去，和金边的 S21 一样，部分受害者的骷髅头被收集了，层层堆叠着，摆设在阴气与鬼气纠缠不清的山洞里。其他两个山洞，不设石级，站在高处向内俯视，依然可以看到白森森的骨头。



木栏围着的大坑，曾经集体埋葬了好几百人。

通译壁莱，现年 42 岁，忆起波博政权，依然有着刻骨的悲伤、难抑的愤怒，还有，无可名状的恐惧。他的父母亲和五个兄弟姐妹，全被红高棉杀死了。

他以事过境迁依然有火灼般痛的语调说道：

“红高棉进入城市后，在短短几天内，便将全部城市人口遣散出城，押到农村和偏远的地区去，从事农耕劳作。有些地方，尚未开发，草莽与人齐高，毒虫蛇蝎横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为了提高农作物的生产量，规定农民每天凌晨四点便得下田工作，晚上九点才可以收工。耕作时，不准聊天，不准歇息。体力消耗多，粮食却又严重缺乏。农民不准自己烧饭吃，搞了大食堂，集体吃饭。开始时，还能吃到米饭，后来，米粮匮乏，惨不堪言，一百个人吃的粥，只用三杯米来煮。喝呀喝的，喝下大量的水，可是，肚子一点也不饱。有时，看到瘦瘦小小的蜗牛，如获至宝，一抓上手，便生生地吞下去。许多人因高度营养不良致死，也有许多人瘪瘪地饿死了。我六岁的妹妹，饿得发昏，偷了一把生米放进嘴里咀嚼，被发现了，活活被打死了。”说到这儿，顿了顿，调整调整了情绪，才继续说道：“近年来，我曾读过好些有关红高棉的报道，但是，坦白说，真实的情况恐怕比许多外界的报道还要悲惨！”

下山去时，日已西斜。夕阳以金黄的灿烂罩住了这个生灵荼炭的地方，映照出一片虚假的瑰丽。

柬埔寨，这块曾经为泪水浸透、为血水覆盖的土地，在经历过让人难以置信的一连串苦难后，尽管还面对着许许多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可是，本性朴实的柬埔寨人却坚韧地说道：

“我们已经历过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呢？

波尔布特其人

波尔布特是柬埔寨历史罪人，但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就充满两面性，他出身富裕家庭，却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待人接物温和有礼，却手段残暴；他外表慈祥，性格却刚愎自用……。直到今天，国际社会要审讯他在民主柬埔寨时期的“灭绝种族”罪行，但对他后来领导柬埔寨民族主义三派联合抗越战争另有评价。

1925 年 3 月波尔布特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的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本名沙洛特-加龙省绍，直到 1975 年民主柬埔寨成立时，才改用波尔布特。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具体出生日期不详。曾有过两妻两女，他的第一任妻子叫乔藩娜莉，一个柬埔寨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崇拜者，为他生了两个女儿。

据他的哥哥沙洛苏昂说，波博“小时候胆小而温顺，看到家里杀鸡也会躲得远远的”。六岁那年，波博像其他柬埔寨男孩一样，走进一家寺院做起了小沙弥。在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12 岁时还俗。直到 15 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 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同时以良好的学习成绩获得到法国留学的奖学金。

波尔布特到巴黎之后，就读于巴黎的一所无线电学院，第一年的学习成绩良好。次年，他在巴黎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和另一学友乔森潘都在巴黎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路向——参加了共产党并与十几位进步的留法柬埔寨学生在 1950 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当年 8 月，波尔布特到南斯拉夫边劳动边休假，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他还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在 1978 年他执政时，南斯拉夫外长访问金边时还开玩笑说：“你那时修的公路现在嫌窄了，汽车越来越多，看来你还需要再重修一次。”

波尔布特在 1952 年 7 月为争取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回国加入了森林里的抗法武装斗争，波尔布特是当时留学生中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但在那时，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只有越盟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所以他在 1953 年 1 月加入该组织。他曾回忆说：“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政权、军队、通信联络、财政与伙食等等，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但是越南为地区霸主，古来如是，它历史上一再侵略、欺压过高棉邻国，这笔账从未了结。所以就算是最狂热的高棉籍共产斗士，也不愿受制于越盟。因此法国人被逐走后，跨国政党高棉解放运动随之分裂，

1954 年越南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全部撤出柬埔寨，“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几乎解体。日内瓦协议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1955 年起，他们就开始积极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1957 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 年 3 月，在金边火车站一个荒废的火车厢里正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成立，与会代表 21 人，其中 9 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 1000 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是杜萨木，农谢是副书记，此时波尔布特已是柬共的三常委之一。

1962 年因总书记杜萨木被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他的铁杆左右手是英萨利和宋成，乔森潘则在金边搞白区工作，1966 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60 年代初，为掩护地下活动。波尔布特曾在金边一所私人中学当过几年教师。但当西哈努克 1963 年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公布了要追捕的红高棉分子名单后，他就撤出城市，和乔森潘等战友一直在全国各地的森林里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农民斗争。

在越南战争期间，虽然柬共与越共进行密切的合作，但他一直到1965年才从柬埔寨，穿过寮国，步行到达河内。当时他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分访越，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三个月，学习有关党与国家的建设与理论。越南党与国家主席胡志明会见他三次，宴请两次，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举行了15次会谈，但是会谈很不顺利。

波尔布特说，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地位，他在学习共产党理论时，看到从1930年印支共产党时起的文件中，越南的就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旨在实现它们的“印支联邦”计划。

接着，波尔布特冲破越南阻拦，在1965年11月到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次年2月回国。后来波尔布特多次到中国与越南。1970年3月18日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哈努克时，波尔布特正好也在北京。1967年，高棉西部萨德兰县因地方政府改变稻米征税的计算方法而触发农民暴动，波尔布特等人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事件本身虽被政府军弹压下去，但却因此建立了高棉游击队的有生力量。然而要夺取全国政权，却还是遥不可及。

然而在1970年3月西哈努克亲王出访苏联之际，国内右翼的朗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成立柬埔寨共和国。朗诺政权将美军这股祸水引进了国土，金边政变的次日，朗诺就批准美军出动庞大的B-52机群，“地毯式”轰炸柬埔寨东部的“胡志明小道”，美国军事顾问开始派往金边政府军中，而美机的狂轰滥炸一直延续到1973年美国国会表决宣布对柬空袭为非法行动为止。与此同时，为了抗美救国，西哈努克亲王也同红色高棉尽弃前嫌搭成合作，红色高棉与越共也没闲着，后者顶着漫天弹雨不屈不挠地继续向南越渗透，从军事物资到伪装过的正规军战斗单位，当然也派出作战老手深入到红色高棉的班排一级，辅助他们尽早夺取全国政权。此时红色高棉便如虎添翼，各块根据地迅速扩大并连成一片，深入丛林里展开游击战。对保护越南战争中生命线胡志明小道起倒了重大作用，1975年，在他的精心指挥下一举击败由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

领导史无前例的“革命”

柬共在1975年胜利后，成立民主柬埔寨。波尔布特根据他极左的意识，企图在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都非常落后的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完全超前的“社会主义实践”。

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

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领导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结果柬埔寨没有象波尔布特追求那样成为“人类社会的天堂”，而是把柬埔寨的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有“东方巴黎”之称的金边，成了无居民的“鬼城”。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机器也是奢侈品、丢掉不用，而用汗水洗心革面。关闭学校、庙宇，强制推行农业主义，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人驱赶到乡下种地；

知识越多，头脑就越复杂，坏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灭，简单到消灭肉体。举凡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柬埔寨遂成为“战火屠城”。4年时间，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二百多万)被处死。而当时的柬埔寨只有500万人，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

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

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一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当月老，指定配对就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由于波尔布特的这种思想与理论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扼杀了人的积极性，经济的竞争活力，所以它严重地破坏了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造成国家经济崩溃，生产力直线下降，结果一向以鱼米之乡着称的柬埔寨，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饿死了无数人。所以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仅仅在执政的三年间，就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常言道：“水至清则无鱼”。直到去年还把宋成杀害，最后落到楚霸王的下场。

波尔布特不仅在国内搞极左，外交上也非常失败，结果当越南于 1978 年底，越军海路空三路全面入侵，却得不到国际广泛支持，国内不得人心，兵败如山倒，仓皇逃到西部边境。1981 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1981 年 12 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 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波尔布特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虽后越南撤军，但此时的红色高棉已失去了民心，而日渐江河日下，最终众叛亲离逐渐瓦解了。

1998 年 4 月 16 日深夜 11 点 15 分在柬埔寨北部边境，红色高棉从林战士最后基地安隆汶，已被叛变部下软禁了的 73 岁的波尔布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乔森潘承认红色高棉曾杀人

红色高棉瓦解之原因

英萨利与红色高棉分道扬镳



1996 年 8 月 8 日，红色高棉的一位名称索佩的师级指挥员和其他一些军官，在柬西部拜林、梅莱山地区的一基地，以红色高棉 450 师、415 师和 250 师（约 3000 名游 1 击队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拥立英萨利为他们的领导人，同红色高棉的“强硬派”分道扬镳。另有 519 师和 705 师已与柬王国政府取得联系准备投诚。这是自红色高棉于 1979 年失去政权以后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

8 月 15 日，索佩率领 1000 名官兵和两辆坦克攻打主张镇压脱离红色高棉的宋成的指挥部和尼空的 320 师所在地，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宋成和尼空一的经过。涅本蔡说：“我们代表王国政府方面同以乔森潘为首的红色高棉之间的对话是从 1997 年 5 月 16 日开始的。那天，我们派遣柬驻泰外交官龙萨伦前往红色高棉的最后据点安隆文，与乔森潘的代表毕文烈和狄昆纳尔等就结束战争实现国家统一进行对话，双方达成了一致。5 月 25 日，我带领三名助手亲自去安隆文，与乔森潘的上述代佛表就同一问题举行磋商并取得良好结果。6 月 1 日，我们 4 人再次前往宋隆文，与乔森潘本人举行会晤，也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6 月 11 日涅本蔡再次前往安隆文商量有关红色高棉馀部加入王国政府的事宜时，情况发生极为诡秘的红色高棉强硬派取得了联系。尼昆曾是游击队指挥官，于 1996 年向政府投诚，与洪森的党结盟。涅本蔡说，杀死宋成夫妇是波尔布特的命令。因为他发现宋成兄弟俩同洪森的特工有联系。

不论宋成为何被杀害，外交官和分析家坚持认为，这起杀害事件起码同柬埔寨明争暗斗的两首相拉那烈和洪森这间争夺地盘的持续战斗有一定关系。为了赶在 1998 年举行的选举之前获得支持，这两位首相一直积极争取红色高棉的支持，并争夺结束该国旷日持久的内战的宣布权。

波尔布特之死



1997 年 6 月 11 日凌晨，波尔布特下令部下将宋成一家满门抄斩后，他带着 200 名游击队胁持乔森潘等人逃跑，但被民柬国民军总参谋长切（亦称达莫）率领精兵 1000 名追赶并在 19 日逮捕了波尔布特。波尔布特被“人民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不久波尔布特于 1998 年 4 月 15 日病死在柬泰边境上的丛林中。波尔布特死后，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乔森潘、农谢等逃离总部安隆文，不知去向。1998 年 6 月 11 日，以乔森潘为总理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江裕朗等 5 名成员向政府投诚。

乔森潘、农谢走出丛林回归社会原柬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副总理 兼外长江裕朗去年底向外国记者透露“争取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理想没能在我们手中实现。现在红色高棉已经完结，我们的使命也该结束了。这就是促使包括乔森潘、农谢在内的红色高棉成员先后走出丛林回归社会的原因所在”。在波尔布特在柬泰边境丛林里病死之后，江裕朗曾向乔森潘提出一起向王国政府投诚事宜，可是，当时乔森潘说切春军权在握，万一出现纰漏就必死无疑，出于这一考虑，一直未敢采取行动，但也没有放弃投诚的打算。1998 年 6 月 11 日，江裕朗、马本等 5 名红色高棉高级分子向政府投诚。洪森对他们表示欢迎。11 月 30 日以洪森为首的王国政府成立。12 月 3 日，红色高棉最后一批由 8 名高级军官率领的 500 名官后向政府投诚。在江裕朗等五名高级分子向政府投诚后，他们一直和英萨利一起安排乔投诚之事。尤其是英萨利一直与洪森保持联系，从中穿针引线。据说，洪森对乔森潘一直比较尊重，希望他能回来。

1998 年 12 月 25 日下午，民柬时期曾 任政府总理的乔森潘和曾任人大委员长的农谢在拜林与洪森直接通了电话后又分别致函洪森首相表示，他们尊重西哈努克国王的崇高地位，尊重柬王宪法，尊重以洪森首相为首的王国政府，只希望以一个平均身份回归社会。洪森当天复函乔、农二人表示，热烈欢迎并通报了还在北京养病的西哈努克国王，得到国王的支持。

红色高棉瓦解的原因

红色高棉的彻底瓦解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内因，也有外因，而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一、红色高棉内部因对联合国主持的柬埔寨大选的态度不同而分成两派。

红色高棉分歧由来已久。在联合国安理会 5 个常任理事国及有关国家在 1991 年 10 月签署的柬埔寨问题巴黎协定后，联合国于 1993 年主持了柬埔寨大选。当时，英萨利等人主张民族和解，结束内战，叁加大选。他们派警察部队接受联合国训练，以便与联合国组织的大选相配合。然而，他们的主张与做法遭到波尔布特、农谢、切春等红色高棉“强硬派”领导人的反对。英萨利披露，波尔布特、农谢、宋成和云亚等为了对付大选，把红色高棉控制区划分成两个军区：一是柬埔寨北部军区，由波尔布特、切春领导；二是柬埔寨西部军区，由农谢、宋成领导。至于他本人从 1993 年起就被波尔布特等剥夺了军权。英萨利被剥夺军权后，他动了心脏手术和腰瘠手术。他一边养病，一边管理梅莱山区的行政。英萨利的儿子英武说，尽管波尔布特剥夺他父亲的权力，但他父亲手下的 450 师、415 师坚定不移地跟随他父亲。这样，红色高棉就造成“一分为二”的局面。投向柬王国政府的红色高棉官员江裕朗认为，红色高棉的致命错误是抵制由联合国主持的 1993 年 5 月大选，否则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

二、红色高棉强硬派继续实行极左政策不得人心。

据柬埔寨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分裂的直接原因在于 1996 年 7 月中旬，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柬西部柬泰边境附近召开的重新研究政策的会议。最高实力人物波尔布特与掌握军事部门的宋成和切春主张实行军事优先的强硬路线。英萨利等人认为，在保持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应该有重点地开展政治斗争，以便为参加 1998 年的大选做准备，然而，英萨利等人在会议上受到孤立。

另据《曼谷邮报》援引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红色高棉领导层近年仍然推行过于严厉的政策，引起了红色高棉内部一些人不满，尤其是师团级干部的不满，导致了红色高棉第一次大规模分裂公开化。

1995 年 5 月，红色高棉领导机构曾向梅莱山至戈公一带发出一道指示，禁止各种贸易活动，禁止信佛和修建寺庙，禁止同外界联系，汽车、摩托车、便携式收音机等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被没收，农业成为唯一允许的谋生手段。一个由中央控制的商店成了红色高棉人购买日用品的唯一去处。这一指示导致了相当数量一批人投向金边政府方面。1996 年 5 月，红色高棉中央又发布了一道新的指示，要求没收村民用来运送种子和柴木的手推车和小货车，并宣布违者将受逮捕，送去受训。支持英萨利的红色高棉的 450 师师长索佩站在村民一边，反对执行这项命令。1996 年 8 月 5 日，波尔布特命令索佩到第 250 师指挥部向北方地区指挥官切春将军报到。

索佩知道这个命令意味着甚么。大约在同一时间，驻在拜林的第 415 师师长伊钱也接到类似命令。但两人都没有服从命令。三天后，切春派了三卡车官兵去抓索佩。

就在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索佩宣布，他要么保持自由，要么就死。他还说：“我们都准备死。如果你们进来抓我，我手下的人就会向所有的人开火。”最后，索佩得以率领 500 名武装军人撤走。8 月 8 日下午，红色高棉的秘密电台谴责索佩和他的部队是叛徒。同时还谴责英萨利为叛徒。该电台还报道说，波尔布特已发出紧急命令，说驻拜林的一个坦克部队和一个步兵师去消灭索佩一伙。但红色高棉总部却从拜林收到否定的回答和公开挑战：拜林驻军愿意支持索佩。450 师、415 师和 250 师宣布忠于英萨利本人，并支持他的民族和解政策。

三、专制使红色高棉从分裂走向灭亡。

1993 年，英萨利因主张叁加由联合国主持的大选，被波尔布特削去军权，而驻扎在拜林、梅莱山和三洛根据地的数千名红色高棉部队及几万名家属支持英萨利的民族和解政策，宣布与波尔布特

和切春决裂，投向柬王国政府。这一事态的发展使红色高棉失去了它控制的一半江山和主要经济来源。

1997 年 6 月，波尔布特的部下在宋成家里发现宋成有与洪森联络的通信设备，没有调查也没有审问，就下令将宋氏一家杀绝。随后，波尔布特胁持怀疑准备向王国政府投诚的乔森潘等人逃跑。由于波尔布特的独断专行，引起了众叛亲离，跟他逃走的人只有 200 多名亲信。但被原来国民军叁谋长切春派兵追赶，并逮捕了波尔布特。从此，红色高棉内部出现了空前分裂。不久，又有 3500 名红色官兵向王国政府投诚。安隆文被政府军接管。

四、洪森采用了和平手段。

据柬埔寨问题专家最近透露，洪森首相早在 1996 年 3 月的柬驻外使节会议之后，确定了三项重要政策，其中之一就是用不流血代替流血、用和平手段代替战争手段来解决红色高棉的问题。

1996 年 4 月，柬王国政府军向英萨利部下驻地的拜林和梅莱山发动了猛烈攻势，但没有取胜。洪森改变手段，派得力助手、副总叁谋长波尔沙伦和在 1996 年 3 月投诚的红色高棉第七师师长盖鹏做英萨利的工作。8 月 8 日英萨利在拜林宣布向王国政府投诚。

接着，洪森又通过原来与红色高棉长期合作的团结阵线党 的将领说服了红色高棉国民军总司令宋成。乔、农 1998 年 12 月 25 日在拜林分别致函洪森首相，请求王国政府接受他们投诚。洪森在去年 12 月 27 日谈到乔、农二人投诚时说："此事是我一手策划和安排的。"

近些日来，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投向王国政府一事在柬国内外引起不同反响。泰国等国和广大柬人民对柬将因此实现真正全面的和平与民族和解感到欣慰和高兴；美、英、法等国却坚决要求将乔、农交给国际法庭审判，否则将危及柬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柬国内也有一批人对乔、农如此"轻而易举"地回归社会，并且受到"贵宾般"的欢迎表示不满。在此情况下，西哈努克国王公开表示拒绝赦免乔、农二人，支持成立有关法庭审判红色高棉罪行，如有必要，他愿意"对簿公堂"，一旦被判有罪，他"愿坐牢"。这时，洪林也发表声明，"我从来没有改变要求审判红色高棉罪行的立场"。

在西哈努克、拉那烈和洪森对乔森潘、农谢的态度发生变化后，乔、农于 1999 年 1 月 3 日返回了拜林。1 名 1 个月前和政府讲和的红色高棉将军肯温 6 日说，如果企图逮捕乔森潘有可能重新发生内战。

关于围绕是否审判红色高棉问题展开的争论将如何发展，国际社会正拭目以待。

波尔布特的“丰功伟绩”

（一）



柬埔寨共产党领袖波尔布特

想做“革命伟人”的柬埔寨“同志”波尔布特多次到中国取回“革命真经”。

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

1975 年的 4 月，他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

他要在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当时的柬埔寨有 500 万人，从 1975 年暮春至 1978 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

波尔布特还热衷于搞内部清洗，仅仅在执政的三年间，就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不仅把越南培养的共产党清除，而且把与自己意见不同法国留学生出身的干部也清除掉。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

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 1997 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 11 口成员全部杀光。

1975 年 6 月 8 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抚掌称善，慨叹：吾道不孤也！

据悉，柬埔寨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就是张春桥组织班子协助起草的。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善良的人们，倘若不是粉碎“四人帮”，这真真切切就是独裁者要我们过的苦日子。

真是庆幸啊！

（二）

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波尔布特就提出：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彻底摧毁旧的政府机构，由柬埔寨的“无产阶级”执掌各级政权的大印。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废除货币和市场，推行配给制、按需求分配；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集体化，开办公共食堂，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改造方面，鼓励普及教育；挑战作为国教的佛教传统，视宗教为精神鸦片，动员僧侣下田参加劳动；暂时终止邮政通信联系，以防反革命的串联活动；废除主仆关系；提倡纯洁朴素，禁止佩戴首饰、穿华丽服装。在保卫新生政权方面，集中力量镇压反革命，坚决将“那些挡住革命道路的人统统踩到脚下”；甄别全社会人员的阶级属性，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友；同时高度警惕外国帝国主义和敌视柬埔寨革命的反动势力的进攻，8 万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加强备战，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按照波尔布特的设想，实行了“全国军事化”，开始了柬全国范围的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的运动，城市一片死寂。按照波尔布特“人类社会的天堂”的思想，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统治。顷刻间，富人消灭了，统统都变成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拿起锄头种田。居民的家具、冰箱、电视、汽车等生活用品，被当作“革命”的对象，烧掉，砸掉；黄金白银、美金钞票，成了粪土，失去价值。

后来发展为从消灭资产到消灭肉体。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僧侣、少数民族，统统在杀戮之列。把战后的柬埔寨变为“屠城”。波尔布特执政仅执政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即从 1975 年到 1978 年，全国有 200 多万人被处死，是全国人数的三分之一。更为惨无人道的是，为了了节约子弹，就用锄头铲断人脑袋。



在红色高棉倒台后，对当时波尔布特恐怖下的死亡人数做了估计，普遍估计的数字在 100 万人口左右。其中死亡的人包括越南裔 2 万人全部死亡，华裔２１．５万人（全部华裔的 50%），老挝裔 4 千人（全部老挝裔的 40%），还有在柬 2 万泰裔死了 8 千人，２５万伊斯兰教徒死了 9 万

（三）

1965 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 2 月。

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

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

尤其是 1965 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



1970 年毛泽东与红色高棉三号领导人英萨利握手，后面微笑的就是波尔布特。



1977（1978）年，波尔布特率领民主柬埔寨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华国锋乘坐敞蓬车陪同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四）

当代史里，波尔布特再一次使我们知道，暴虐往往在最崇高的理念和口号下实施。以屠戮人民生命为代价实现的“革命”永远值得我们警惕。

波尔布特让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一度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么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寺庙被关闭了，僧侣被强制还俗了，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 年 6 月——8 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倒是盛赞了波尔布特：“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极权政治的重要特征就是产生残暴而恬不知耻的独裁者。

.“波尔布特大叔”年轻时的理想，是建设一个纯而又纯的、“公平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像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真是太慢了，他要的是坐火箭一蹦就蹿入共产主义。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他自己也处处“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柬埔寨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人们的生活都被规定好了，何时可以吃饭，何时必须劳动，何时允许*，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三十至四十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其实是“大锅粥”）；已婚的夫妇则被分开编组，一两个星期才允许“团聚”一次；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就曾刊登过一个柬埔寨姑娘因为恐惧已经不会再微笑的脸……如此让人叹为观止的“革命化”，发生在人类的当代史里，不能不令今人惊愕得合不上嘴巴。现在回首那样极端荒谬的情形，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理想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最容易走向理想目标的反面。

波尔布特其貌不扬，绝无留着小胡子的希特勒那样相貌鲜明，如果混在人群中，就是一个难以辨别的普通农民。但一切独裁者的特点，就在这个貌不惊人的波尔布特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虽有书记的职务，在党内却呼为“一号大哥”；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那帮人仍病态似地疑神疑鬼，强调“秘密工作是一切的关键”；到处是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一切消息都要封锁，在金边的外国记者全部被驱赶……而在极左思想泛滥的七十年代的中国，波尔布特的名字国人并不陌生；波尔布特来访到北京时，在住所还同种树养花的工人一同干活，更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处处体现“劳动人民本色”，你还真想不明白，这么一个“政治妄想狂”，是一个如何奇

怪的高等动物。在他死时，身上穿着件皱巴巴的短袖衬衫，身边只有一把蒲扇。

这些年来，在柬埔寨陆续挖掘出大量的骷髅头骨，他们都是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统治时的杰作。除了原来旧政府的官员、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和憎侣等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毒害的人，就灭了算了；旧知识分子也通通被清洗，全国只剩 3 个旧知识分子、1 个旧技术人员得到正式录用。在 1976 年年底，波尔布特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他大约是从党的内部嗅到了让他不安的气息，于是一大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清洗，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在金边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亦称“S-21 监狱”），就有近 2 万“有问题”的人被关押，结果仅有六七人生还。或许可以说，这种“灭绝的功夫”，连纳粹集中营的刽子手们看了也自叹弗如。如今，杀人机器 S-21 监狱成了博物馆，其中有一张用骷髅头砌成的柬埔寨地图占据了整面墙壁，个个骷髅头空空眼窝里都在流泪嘶喊。

波尔布特在不到 4 年的执政时间里，就组织领导了 4 次大肃反，其肃反机构也够厉害的，比如在革命军总参谋部中，除了总参谋长宋成一人外，所有人员统统被捕杀。其时宋成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只因他在前线指挥而一时幸免于难，直到 1997 年 6 月才被波尔布特派卫兵给杀了，不仅宋成夫妻两命归天，连他们的 9 个子女也一同被杀光光。斯大林如果在地下知道这样的业绩，恐怕也禁不住赞叹：哈哈，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然而，当美国记者纳特-赛耶采访临死前被红色高棉软禁的波尔布特时，波尔布特还毫无感觉和知觉地说：“我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这真应验了雪莱的话：“人类引以为自豪的是：他们善于创造出庄严的名字来掩盖自己的无知。”“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庄严的名字”，只是这里不仅仅是无知，还有无耻；波尔布特大约压根儿就不认为他和他的组织把一个国家的 1/4 人口给干掉有什么不对不好不妥。

（五）

.。。。。等到波尔布特们已认定朗诺倒台指日可待，他们的头号假想敌就悄悄转移了，准星上的缺口锁定为犹在并肩作战的越共，这内中的原冲动自然还是历史上的世仇情结，其次是红色高棉总是认为中国无偿提供的物资武器被越南侵吞盘剥，过了一手才把残羹剩饭打发盟友。再者，红色高棉唯恐越共设在柬国领土的战时基地会成为其日后赖着不走的理由。总而言之，羽翼渐丰的波尔布特在拿下金边之前就已开始层层清除--至少是钳制越共军事顾问的影响，甚至于对有越南受训背景的本党干部也予以排挤打击，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吾党所宗。

1975 年，北越军队攻陷西贡之后十七天，红色高棉摧枯拉朽地拿下金边。

波尔布特的罪恶:“活体取脑”【图文】

大屠杀博物馆原先是是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所集中营，于 1975 年至 1979 年间曾被红色高棉政权用作囚禁、屠杀政治犯的集中营。

这里原来是由西哈努克亲王命名的 Tuol Svay Prey 高中，1975 年，柬埔寨共产党将此地重新命名为"第 21 号安全监狱"(Security Prison 21，简称为 S-21)．柬埔寨共产党也改造了此建筑以适应囚禁犯人：建筑物周围绕起了带高压电的带刺铁丝网，原先的教室变成了一个个狭窄的拷问所，所有的窗户都被用铁条覆盖并绕上电线以防止犯人逃脱。 从 1975 年至 1979 年，估计有 14000 至 15000 人被囚禁在 S-21 集中营(一些人相信人数超过 20000 人)．

该集中营的犯人被从柬埔寨全国选送来，其中包括受到怀疑的红色高棉政权的党员或士兵，这些人的罪名通常是叛国或通敌．大部分牺牲者是柬埔寨人（其中有大量华裔柬埔寨人），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在此地被杀害，已知的包括越南人，泰国人，和欧洲、澳洲人士。 犯人的全家(包括妇女，儿童和婴儿)经常是被一起审问然后被带往 Choeung Ek 杀害。

1979 年，该集中营的恐怖在越南军人的进攻中被揭露．1980 年，集中营被作为历史鉴证重新开放 - 赤柬大屠杀博物馆．用于对被红色高棉政权有计划杀害的人的怀念。

看着展室内几千张死难者被处决前强行拍摄的照片，使人不能不思考人类历史和一切政治行为的意义。

她是当地学校的校长（知识分子是红色高棉深恶痛绝的敌人，一经抓获，凶多吉少）她与她的婴儿被同时处死。在她死前，实施了“活体取脑”——从头顶和脑后钻孔，在她未死前取出脑浆，供医药

使用。据说活人的脑浆属于“大补”。

在即将钻取她的脑浆时，这位知识女性神情平静，但脸颊上滴流的的泪珠清晰可见。



下图是遇难者的头骨



马鼎盛的博客

审判赤柬大屠杀罪行的法庭开始工作，十七名柬埔寨法官和十二名国际法官将正式调查取证，在押的「红色高棉」政要塔莫和杜克，以及国内的农谢、乔森潘和英萨利也将受审，赤柬二号头目农谢表示，会在法庭供出真相。

柬共政权倒台十八年后，新政权才开始请联合国协助设立战争法庭，又拖了九年，国际方面凑够捐款足以开庭，被赤柬屠杀及虐杀至少一百七十万平民的滔天罪行，才有希望沉冤得雪。

奇怪的是，柬埔寨人好像喜欢忘却过去。从一九九二年到二〇〇○年，当地教科书一字不提「红色高棉」。二〇〇一年，在九年级的教科书中插了七行字，十二年级的教科书则插了一页纸，罪责问题还是欠奉。到二〇〇二年，关于「红色高棉」的教科书章节又被删得一干二净。

青少年学生无从知道赤柬犯下灭绝民族的疯狂大屠杀罪行，连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的女儿，还认为她家老爹是最受尊敬的人。

赤柬政权被人民推翻四年后，波尔布特借口妻子没有生育，命令女子运输营送少女供他挑选，身材高大的美女密松被看中，一九八六年生下女儿。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前，向秘书狄昆纳尔托孤。后者不但抚养十二岁的孤女，为她改名叫萨巴乍达，还休掉发妻，娶了密松做老婆。

萨巴乍达去年入读潘纳萨斯特拉大学，这是金边最昂贵的私立大学，用英语授课。狄昆纳尔现任梅莱山地区首长。杀害一百七十万人不会没有帮凶，看来，赤柬余党不但人还在，也活得悠然自得。

英雄的国家-----民主柬埔寨

【那时候的人民日报经常发表社论的，这是 1977 年 7 月 14 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五版的社论】

民主柬埔寨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西南部，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面积十八万一千零三十五平方公里。人口近八百万。全国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高棉族占百分之八十，余为占族、普侬族、老族、傣族等。首都金边。

英雄的柬埔寨人民为了捍卫祖国独立和民族尊严，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七〇年，美帝国主义策动朗诺叛国集团发动反动政变后，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进行了五年多的武装斗争，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成立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政权，使柬埔寨革命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全国解放后，柬埔寨共产党领导柬埔寨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波澜

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为完成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这样两项根本任务而努力奋斗。

柬埔寨是农业国，主要农林产品为稻谷、橡胶、玉米、胡椒、木材、棉花等。柬埔寨农民在民族解放战争年代就开始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解放后，全国农村迅速实现了合作化。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柬埔寨共产党在全国解放后立即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重点发展水稻的方针，全国上下掀起了大办农业的群众运动。柬埔寨人民克服战争造成的重重困难，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战天斗地，使农业生产面貌迅速改观。一九七六年粮食获得丰收，做到粮食自给。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柬埔寨人民提出“做水的主人”和“改造柬埔寨山河”的战斗口号，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

柬埔寨广大工人在全国解放后，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取得了显着成绩。工人们不仅迅速修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的工厂，并扩建和新建一批厂房。工人们还进行技术革新，促进生产迅速发展。

民主柬埔寨政府奉行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根据真正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努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民主柬埔寨政府坚持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柬埔寨政府近年来曾多次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莫桑比克、津巴布韦、*、阿扎尼亚、东帝汶人民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正义斗争。民主柬埔寨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到目前为止，柬埔寨政府已同八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柬埔寨解放后，乔森潘同志率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英萨利副总理也曾多次访问中国。**这次波尔布特同志率领柬埔寨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必将促进中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以上都是一位老太太信步老从网上转帖保存的资料

我佩服老太太，将少为人知的资讯那么快的收集集中，提供给关心此事的朋友，节约了大家很多时间。我相信，多多了解情况会使大家兼听则明。多多思考维护“文革”人士的罪恶用心。不再上当。

信步老此时推出此文，真是太及时了！让大家看清当年的中国和毛在做什么！如果毛还健在，我们将面临着什么！谢谢信步老！

记得 60 年代，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其实“自然灾害”是个幌子，因为自然灾害年年有。

而“人民公社好”：把小家砸烂，都一律吃“大锅饭”，不准种自留地，弄得大家吃不饱，生产荒芜，大量死人。多亏中央及时纠正，救了中国。若这是他老人家继续试验下去，我们的存在都有问题。看看柬埔寨就知道结果！他是害中国，还是救中国？善良的人们，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吗?

又一评论

想想都后怕！要不是叶剑英拍案而起，和华国锋等老革命家一起粉碎“四人帮”，让张春桥他们得手的话，我们就只有进集中营的份了。

（以上材料来自搜狐网）

附录

金边的噩梦·红色高棉起诉书

（1975 年，金边。波尔布特和他的红色高棉游击队企图把柬埔寨变成无人区。年仅 14 岁的育昌及其家人和几乎全国的人口一道都被赶到了乡下。）

红色高棉的人用枪把我们从家里赶了出来并把我们驱赶到一大群正被他们赶往乡下的人群里。他们把我们划为“不可靠”的城里人，并且要把我们全家赶到地处马德望省的“新村”去。士兵们马上把我送到地里干活，并对我母亲说，我过 3 个星期就能回来。然而我一去就是 3 年，在这 3 年里，我多半饿着肚子在地里插秧，收割，以及挖水沟。夜里我们只能睡在田地旁边，我常常靠凝视星空背诵着妈妈给我讲过的柬埔寨神话故事打发苦日。其中一个描述的是一只老母鸡的故事：当它得知农家主人第二天要杀掉它时，把真情告诉了小鸡，并让小鸡要坚强地活下去。老母鸡说它死后会变成一颗星星，这样小鸡每天晚上都可以眺望星空。第二天，当农家主人杀了母鸡后正准备把它放到锅里煮时，小鸡勇敢地跳到锅里和妈妈一同走了。后来老母鸡和小鸡变成了两颗星星。因此，每当想妈妈的时候，我就久久地凝视着夜空。

3 年后我终于回到了村子里。当时我走的时候还住着约莫千把户人家。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回来时村子几乎空了。我亲眼看着人们不断地死去，亲耳听着凄惨的痛哭声。简陋的房子倒塌了，数以百计的人们不是惨遭伤害，就是被活活饿死，或者由于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而死去。我快要到家门的时候，一个邻居拦着我说，红色高棉把我从村里抓走后，妈妈在地里偷偷地藏了一个西瓜好等着我回来吃。但西瓜烂掉了，因为妈妈拒绝在我回来前就把它从藤上摘下来。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但接着他又告诉我，当地的红色高棉分子把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女儿杀害了。他们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我姐夫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技术员，我姐姐是学校的教师，这是他们惟一的罪状。

现在我正在仔细地搜集材料、照片以及证人的证词。我要控告红色高棉的罪行，我姐姐以及 170 万无辜的柬埔寨人的所作所为是有罪还是无罪。法庭不开审，柬埔寨就不能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家。此外，我也在收集并珍藏方方面面的历史事实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并且决不让这一历史悲剧在任何地方重演。也许只有亲自置身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之下，你才能理解那种恐惧。我们都说我们害怕噩梦，然而，波尔布特就是已经成了现实的最恐怖的噩梦。

3 年后我终于回到了村子里。当时我走的时候还住着约莫千把户人家。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回来时村子几乎空了。我亲眼看着人们不断地死去，亲耳听着凄惨的痛哭声。简陋的房子倒塌了，数以百计的人们不是惨遭伤害，就是被活活饿死，或者由于得不到最基本的治疗而死去。我快要到家门的时候，一个邻居拦着我说，红色高棉把我从村里抓走后，妈妈在地里偷偷地藏了一个西瓜好等着我回来吃。但西瓜烂掉了，因为妈妈拒绝在我回来前就把它从藤上摘下来。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但接着他又告诉我，当地的红色高棉分子把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女儿杀害了。他们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我姐夫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技术员，我姐姐是学校的教师，这是他们惟一的罪状。

现在我正在仔细地搜集材料、照片以及证人的证词。我要控告红色高棉的罪行，我姐姐以及 170 万无辜的柬埔寨人的所作所为是有罪还是无罪。法庭不开审，柬埔寨就不能成为一个法制的国家。此外，我也在收集并珍藏方方面面的历史事实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并且决不让这一历史悲剧在任何地方重演。也许只有亲自置身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之下，你才能理解那种恐惧。我们都说我们害怕噩梦，然而，波尔布特就是已经成了现实的最恐怖的噩梦。

柬埔寨、罪恶的红色高棉

提起柬埔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有个西哈努克亲王。1970 年 3 月 18 日，柬埔寨国内右翼朗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访之际，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因为怕得罪美国，一直支持他的法国和苏联都拒绝接纳他。在西哈努克走投无路时，毛泽东收留了他，帮他在北京组织了流亡政府，并收养了这个政府，西哈努克本人也一直继续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那时正值中国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这位信佛的流亡国王不知是出于无奈才出卖佛祖，还是真心同意毛泽东文革毁灭寺庙的做法，当世界多数国家在指责中国时，惟独他歌颂赞扬中国文化大革命，并阿谀奉承讲了许多肉麻吹捧庇护主人毛泽东的话。但他做梦都想不到，佛主日后会惩罚他这种行为。几年后，在他的王国上演了一场比文革更惨烈的“革命”。他的盟友——柬埔寨共产党政权“红色高棉”推翻了朗诺集团后，实行极端左倾的共产主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清洗，其残忍度和规模比中国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哈努克自己的十八个亲人（一个儿子、二个女儿、二个女婿、十三个孙子）被杀害，亲王夫妇遭软禁，不准外出、不准见客、不准通话通邮，如果不是中方关注，他也早已遭殃。在红色高棉统治的短短四年时间，柬埔寨有约 250 万人口被害（当时柬只有 800 万人口）。在柬埔寨的中国华侨也未能幸免，70 万人中将近一半遭到残酷杀害。

红色高棉垮台后，柬埔寨人建立了红色高棉的“罪恶馆”，将挖掘出来的尸体、骷髅和当时杀人的真实照片陈列出来，供人民参观。相比较中国而言，百岁作家巴金老人早已去世，而他所倡导的文革博物馆至今都还没有建起来，甚至连影子都没有，我从内心更佩服柬埔寨人敢于正视历史的勇气，这也更增加了我对这个和中国有过同样经历的国家的好奇。

华人经济的国家

2006 年我去柬埔寨，这是个贫富悬殊的国度，富裕者多为外商。经济支柱不只靠农业，还有旅游业、制衣业和建筑业。2008 年国民生产总值约 102 亿美金，人均产值为 600 美元，旅游人数突破 400 万人次。我们第一站是金边，导游首先带我们去了“中央市场”。它是“金边的地标”、“生活艺术博物馆”，是法国殖民者在 1935 年建造的。十字形圆顶建筑，从空中俯视，就像一个巨型电风扇。建筑内部无梁无柱，四通八达，是金边最繁忙的市场之一。市场内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工艺品、珠宝、旅游纪念品、佛像、盗版书、明信片、服装、各种电器、日用品、水果、蔬菜、花卉等等。而中央市场里面的商人基本上都是华侨和中国大陆商人，导游向我们介绍说，虽然柬埔寨 90%是高棉民族，华侨只占人口的 5%（30 多万），但华人控制着国家 80%的经济。华人在柬埔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绝大多数华人从事商业活动，国家税收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华人公司、工厂、银行。去年中国企业对柬埔寨的投资额比 2004 年增长 460%，成为最大外来投资国，北京向柬埔寨发放了数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远远超过美国提供的 6200 万美元援助。在柬的华人中，以潮州人最多，其次是广东人、客家人、海南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现任柬内阁中，超过半数以上的部长包括总理洪森的妻子，都有华裔血统。

西哈努克大道上的独立广场中央屹立着“独立纪念碑”，四根巨柱上镌有七层莲花蓓蕾形宝塔，每一层四周的“花瓣”都是精美的“那伽”雕饰。这座独立碑，是纪念 1953 年西哈努克亲王带领人民赢得民族独立、结束法国长达 90 年的殖民统治而修建的，后又改为胜利纪念碑，用来纪念那些死于内战的高棉人。

在银阁南面的广场上，我们还看到“柬越友谊纪念碑”。这是一座用白色石头垒起来的纪念碑，它被艺术家用刀斧劈出伶俐的线条。纪念碑上三个人紧紧地矗立在一起，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我端详石头上的脸，想起罗大佑的歌《亚细亚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柬埔寨曾是亚洲的孤儿，被抛弃很长时间，尤其在四年的国内大屠杀中，国际社会竟没有人出来阻止红色高棉的暴行，最后还是原红色高棉的洪森倒戈，带着越南人打进来，才让大屠杀住了手，所以柬人提到战争，总会触到心灵的伤痛。

红色高棉——恐怖的回忆

一谈起红色高棉，我们的司机小陈和导游蔡先生就表现出对红高棉及前领袖波尔布特的仇恨，他俩都是当地华侨，司机小陈一家有四人被害，导游蔡先生家中也有三人被害。团中的知识分子与我都极力想听华侨蔡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旅途车中，在我们不断的提问下，三十六岁的蔡先生尽

管不愿回忆辛酸往事，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述说当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

1975 年 4 月 17 日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红色高棉荷枪实弹的军人们，勒令全市老百姓三天之内必须离开金边，说："你们用不着带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回家，谁也不准留下！美国人要轰炸金边！美国人马上要轰炸城市了！"开始，一些居民不肯离开家园，采取观望态度。后来敌不过士兵的逼迫，四天之内，200 万人口都被强制离开，包括老弱病残。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金边顷刻间成了一座有路无人走、有车无人开、有房无人住的"鬼城"。大部分金边人没有料到此行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丢下产业，匆匆离去；也有人预感到前景不妙，将金银首饰等细软随身携带。蔡先生父母给兄妹四人随身带了些干粮，没想到这点米日后成了他们的救命粮，使他们与死神擦身而过。为了消灭富人、把所有柬埔寨人统统变成穷人，红色高棉把家具、冰箱、电视、汽车、书籍等生活用品，当作"革命"的对象，通通烧掉，砸掉；货币被取消，黄金、白银、美金成了粪土。那些只带了货币的人没多久就发现，一夜之间这些钞票变成了废纸，在赶往乡下的长途跋涉中只能作手纸用。许多华侨几代人都在金边开店铺做生意，仅仅几昼夜间，他们与金边人一起被迫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地方，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人，一落脚便开始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的日子。红色高棉为了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要求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几乎所有人都虚报出身。

红色高棉夺取全国胜利后，全国民用通讯设施全部瘫痪，也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几乎没有商业活动，没有饭店，简而言之，离开红色高棉组织，任何人都寸步难行。

那时，男女老少一律只能穿黑色长袍或中国文革式的中山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革命头。不许自由恋爱，婚姻由组织指定配对。家庭也被解体了，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吃"在公社大食堂。刚开始还允许每家领取一天的定量，后来有人私存余粮以备不测，柬共干脆改为每餐配给，搞彻底的公有化改造。没过多久，粮食的配给越来越少，饭也由干变稀。人们开始以野菜、草根、树皮果腹，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而活着的人连挖坑掩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最后，因饥不择食，有人开始吃蚯蚓、甚至吃死人肉，全国饿殍遍野。活着的人除了白天种地修渠，晚上还要开会学习。精神脆弱的人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还没等到饿死就自行了断，蔡导的那对年幼体弱的弟弟妹妹就是这样死去的。

蔡导的父母一再叮嘱兄弟俩咬牙挺着，说："我们是华侨，祖国会出面来救我们的。"当时有几十万华侨都咬紧牙关，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毛主席来救他们，因为当时红高棉政权的报纸都刊登了中国派出不少专家团来柬援助的消息。华侨不理解："中国是红色高棉的最大支持者，这些忘恩负义的豺狼为什么要屠杀华侨？难道中国政府会坐视不救？"有一次，蔡导父亲和一群人在山上劳动，看到了中国标志的飞机，许多人拼命挥手、放烟火发求救信号，结果竟被红高棉枪毙了几个人。还有一次，村里一个红色高棉的翻译告诉华侨，离他们不远处有中国派出的建设专家小组驻扎地。村里几个胆大的华侨年轻人冒险去报信求救，结果反而被这些中国人出卖，给红色高棉抓起来。公判大会上，一个自称中国派来的干部带头喊口号："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革命斗争！支持打击阶级敌人、打击特务反动派！"那几个去求救报信的青年华侨都被枪毙了，这对华侨们来说是一次致命打击，大家彻底失望了，知道毛泽东是支持红高棉的，柬埔寨的华侨成了被祖国抛弃的孤儿。

蔡导一家和华侨们度过了三年八个月地狱般的生活，终于盼到救星洪森领着越南人打进了金边。骨瘦如柴的母亲在解放前的二个月，终于支持不住而活活饿死，临终前一手拉着兄弟俩，一手拉着丈夫，说中国广东老家有她的亲人，一定要逃脱红色高棉的魔爪。父亲总算坚持带着他兄弟俩从地狱爬了出来，可终因积劳成疾，回到金边第一年就得重病去世了。临死前他一直跟蔡导兄弟俩说："我不要死，我要活下去，要看到红高棉会有什么下场？"政府后来的调查统计显示，红色高棉在 1975 年到 1979 年的政权统治中，导致柬埔寨 200 多万人死于其统治期间，死亡人口超过总人口的 20%。听了蔡导的故事，团里有许多人流下眼泪，好几位老师鼓励他把这种刻骨铭心的经历写下来，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记过去。蔡导说，欣慰的是政府要公审红高棉的决定今年又提出来了，我们兄弟俩每年祭祀时，都会把这好消息告诉父母的在天之灵。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

来源：凯迪网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一）

当前，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将面临着国际法庭的审判，被指控的罪行：一是反人类罪；二是大屠杀罪。红色高棉在执政期间，人为的使柬埔寨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导致了 200 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对柬埔寨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历史的审判是无可非议的。但值得让人深思的是：红色高棉为什么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而结果不仅给社会带来了灾难，自己还走上了大屠杀的道路。这里的原因所在，从根本上说是波尔布特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指导实践的能力，而他却坚决按马克思所指的道路走，在掌权后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使红色高棉走到了这一步。为说清这个问题，以下先从分析它的一些奇怪现象开始，再结合柬共的历史对形成灾难和出现大屠杀的必然性进行一下剖析。

柬埔寨共产党自 1960 年建立，一直到夺取政权后，既没公布党组织的名称，也没公开对社会的主张。这种现象一直被人们感到奇怪。因为这种做法既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对他们不利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绝不会是出自柬共的主观愿望，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柬共自身的性质与柬埔寨社会的发展阶段不相符而决定出来的。因为红色高棉与各国共产党性质相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主张是消灭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被压迫阶级的政权。在封建社会的柬埔寨自然是号召农民打倒地主，建立农民政权，实际也就是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但要使这种主张能行通，在当时的柬埔寨社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农民阶级的文化知识水平使自身的能力达到登上政治舞台的程度，（具体表现形式是在农民中能产生建立基层政权所需的干部队伍）；二、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但事实上当时一个条件也不具备。为说清这点，下面先介绍一下红色高棉的最高领袖波尔布特。

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创始人，为了柬共的事业，他曾多次来中国取经，接受游击战争的专门训练，并努力钻研毛泽东著作。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把农村包围城市作为他们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些事实说明波尔布特对中共创业过程中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以及建立农民政权的具体做法不只是清楚，还会尽一切努力去这样做。因为在初始阶段，柬共是白手起家，要想得到发展，只有发动和依靠农民阶级，而要想从根本上得到农民阶级的长期支持，又只有把农民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关于这点别说有中国的例子，就没有先例波尔布特也能慢慢想到，就想不到，客观条件逼迫他也得逐渐走上这条道路。退一步说，即使波尔布特根本就想不到或不想这样，在革命军到达的地方或对地主阶级能起威慑的地区，农民阶级自发的也会这样做。但在柬共革命期间并没出现这种局面。这只能证明他为此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失败，证明在当时的柬埔寨，农民阶级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根本就产生不出组建政权的干部队伍，实质也就是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能力，建立不起政权组织。到此再说第二个条件。如果当时柬埔寨要是存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对于柬共，即使建不起政权，完全可以采取打击地主号召农民的办法去发展军事力量，在这点上，历代造反者都是这样做的，也都能达到无师自通的程度，波尔布特这个有师之徒更应如此。但事实上柬共发展起来是在 1969 年树起了反美大旗后，也可说他是在反美救国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在打击地主号召农民的主张下发展起来的。而在 1969 年前 8 年的时间里，柬共只能勉强生存，根本没什么发展。这充分说明柬埔寨当时并没有阶级矛盾激化的条件。

正因为柬埔寨社会当时不存在上述两个条件，从客观上等于没有实行土地革命的基础，也使柬共的这种主张公布不出去。如硬公布不仅没法实现，还会在社会中更加孤立，更加失去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余地，这样迫使柬共在多次失败后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另一方面，由于红色高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它的性质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这决定只要柬共公开，就必须公布与自己性质一致的主张以求得到社会响应。而在土地革命的主张公布不出去的情况下，要单纯公开共产党组织，等于这个组织没有宗旨，更没法得到社会的认可。迫使柬共又只能处于保密的状态。所以说柬共长期不公开，是由自身的性质与柬埔寨的发展阶段不相符决定出来的。在弄清这点的前提下，再去回顾柬共的历史，就会逐渐看出红色高棉最后给社会造成灾难和走向大屠杀的轮廓。以下便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正直青年的波尔布特等人，自从在法国留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

决心要以革命的手段在柬埔寨开创一个完全属于被压迫阶级的新天下。当时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他们的革命对象自然也包括法国的这些殖民主义者，所以这些留法青年回国后，大部分成员，尤其后来成为柬共高级领导的一些人：波尔布特、英萨利、农谢、乔森潘、宋成等，都投入了当时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抗法斗争。1955 年抗法战争取得了胜利，柬埔寨宣布独立。但这种结果却不是这批留法青年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也不能被他们所接受。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消灭一切统治阶级，在法国殖民者被赶走后，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国内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整个统治阶级。于是他们继续酝酿革命运动。到 1960 年，21 个青年聚集在金边火车站的一节旧车箱内开会正式组建了柬埔寨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选举的中央总书记是杜萨木，波尔布特是中央三常委之一。两年后杜萨木失踪（实际是被警察逮捕后捆上石头推入了湄公河处死），波尔布特被推举为总书记，从此他成了柬共的实际领袖，革命的千斤重担也就落在了他的肩上。正是这种使命迫使他必须为柬共的生存与发展去尽一切努力。尤其到 1963 年他的身份暴露被迫进入丛林后，生存与发展更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一者是他本人悟性很强；再者是他此前来中国受训，并对中国发展史及毛泽东思想有很深的研究。这样在联系本国实际中他完全清楚应该走土地革命的道路。一些资料显示这个时期他在丛林中进行革命宣传，而宣传的内容肯定就是土地革命的主张。然而因为在当时的柬埔寨不存在进行土地革命的两个先决条件，他的宣传没有任何号召力，波尔布特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的主张。又因为这种主张行不通，共产党组织的名称也没法公开。但作为一个政党要实施领导革命运动，又必须让社会知道自己的存在，也必须有一个公开的名称。于是在共产党组织没法公开的情况下，最后被迫采用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名称——“革命组织”来公布于社会。

这种局面无疑会使柬共处于最艰难的环境之中，但站在波尔布特的角度，作为最高领袖又必须为党的发展继续寻找出路，在没法公布政治主张得不到整个农民阶级支持的情况下，他只有利用个别地区农民对政府不满的条件去发动运动，以求尽量扩大一些势力和影响力。1967 年马德望地区萨德兰县的农民，因反对扩大税收与政府发生冲突，最后酿成了暴动，这些暴动者自然成为了柬共的发展对象。当暴动被镇压，幸存者加入了柬共游击队，柬共的力量得到了一些壮大，趁此机会波尔布特决定正式建立武装，尽全力发展游击队。而后他们又发动了几次起义，到 1968 年底，柬共的武装发展到了几百人。这些尽管是柬共长期斗争的结果，也算是有了发展，但就凭这点力量，对于波尔布特，不管他雄心有多大，别说取得全国胜利，就连生存仍无法保障。正是这个原因，波尔布特以及他领导下游击队，很长时间都活动在柬越边境的丛林，以便在政府进剿时，顶不住就退往越南境内。要改变这种处境，起码得使自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自立的程度。而要做到这样，只有公布一种切合实际的主张，以求得到社会的支持，要不然，单凭得到个别地区少数农民的支持，永远也发展不起来。但在当时社会中，客观上不存在这种条件，波尔布特没办法做到这点，只能在苦斗中去等待时机。

1969 年美军在越南战场上处处被动，引起了美国政府对西哈努克亲王中立偏左政策的不满。正是他这种偏左政策，中国的大量援越物资和越南北方大量军队，通过柬埔寨到达了越南南方，对美军在越南战场的被动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越南军队在战场被动时，有时还撤到柬埔寨休整。所以从这年开始，美军不仅出动大量的飞机轰炸柬埔寨，还直接出兵进攻柬埔寨，造成了当地无数人死亡，使柬埔寨与美国的矛盾骤然上升。正是这种民族矛盾的上升，给了在困境中的柬共发展的机会，所以波尔布特不失时机地在原来只反西哈努克亲王的基础上，又公然竖起了抗美救国大旗。正是这面旗帜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柬共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到年底就达到了 2500 人。1970 年美国乘西哈努克亲王访苏之机，支持首相朗诺发动了政变，西哈努克亲王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当时的苏联政府因种种原因没表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于是他抱着寻求支持的希望和试试看的心情从莫斯科飞往了北京。到北京后，经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以最隆重的仪式欢迎了他，之后立即表明的态度是：如果你要坚持战斗，中国将予以全力的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当即表示了战斗到底的诀心。接着周恩来又表明支持他的交换条件是他必须与柬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西哈努克亲王出于无奈，为了消灭叛徒朗诺达到回国主政的目的，只好接受了周恩来的条件，与自己昨天的敌人“柬共”走上了合作的道路。

而后在中国的安排下，西哈努克亲王以民族联合统一战线主席的名誉在北京组建了流亡政府，但不回国主持实际工作，柬共单方成了统一战线在国内的实际执行者。这种局面明显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结果，对于波尔布特当然是求之不得。这不仅使柬共在国内有了合法的地位，也使他在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下，能够名正言顺地去收获一切成果，以及收纳西哈努克亲王的部下和一切支持者。至此波尔布特如鱼得水，柬共的力量得到了飞速发展。而后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不断对国内发出呼

吁，号召人民走进丛林参加游击队，站在抗击美国侵略和反对朗诺集团的行列。因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内尤其是在农民中威信极高，在他呼吁下首先是整个农民阶级站在了柬共的支持立场，大批的城市青年也响应号召走进丛林参加了柬共的武装组织。人员问题解决后，武器装备在中国无偿支持下更没问题，柬共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迅速由游击队上升到了正规军，并在近 3 年的时间发展到了四、五万人。朗诺的军队根本不是柬共的对手，节节败退，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国土很快成了柬共的控制区。随着柬共势力的发展如旭日东升，取得全国胜利已为时不远，一个严峻并无法回避的问题却摆在了柬共的面前，这个问题就是在军势力量发展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没有产生与共产党性质一致的各级政权组织。之所以这样，如前所说是因为柬埔寨社会不存在土地革命的客观条件，使他根本就建不起与自己性质一致的政权组织。它在军事上的崛起：一是依靠竖起的抗美大旗；二是西哈努克的号召。在这两点儿中，随着美军的撤出和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这杆抗美大旗会逐渐失去作用。第二点，虽然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西哈努克亲王完全失去了权力，但他仍是旧制度的总代表。由于柬共没有自己对社会的主张，没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等于完全承认和维护着旧制度。像这样，朗诺被打倒后他们要是走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道路能行通，也能掌握住全国政权。但这样动摇不了旧制度，与波尔布特当初建立共产党的宗旨相反，这决定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不了。如果要不走这条道，而是到时利用原有的政权结构去消灭旧制度，不只会遭到整个政权体系的反对，如果西哈努克亲王发出号召，恐怕连当初很多走进丛林参加柬共武装组织，乃至参加柬共的党员都会倒向西哈努克亲王。这很可能会给柬共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要想既掌握住全国政权，又要达到消灭阶级的政治目的，在军事力量发展的同时，必须在控制区内普遍建立起与自己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组织。在土地革命的主张行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另找出路。当时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走的集体化的道路。使他们有借鉴的地方，所以从 1973 年 5 月，柬共就开始在控制区内的个别地区把农民组织起来搞集体化的试验，以求使这些集体化组织的领导干部，成为柬共中央政权的基础。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二)

这种集体化，应当就是在土地国有基础上，以多少户为一个生产单位进行集体耕种的方式。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个体耕种被称为小生产，社会由小生产转变为集体化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其实只要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解释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正好相反，这种集体化正好是一种倒退。之所这样说，是因为这种耕种方式正是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方式。为说清这点我们先解释一下“井田制”。所谓的“井田制”并不是像一些书上解释的那样：是因为人们在耕种过程中把田地分成方块形似“井”字而被定名为“井田制”。《周礼》中记载的“九夫为井”，这里的“井”实际是一个组织名称，九夫为井，是指当时以九家为一个生产单位，而这个生产单位的名称被命名为“井”，所以“井田制”实际是以“井”为生产单位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与所谓的集体化从本质上并没区别。

如果这种形式存在于封建社会以前，说明人类是在集体耕种的基础上进步到了个体耕种，从而进入到了封建社会。而这种集体化分明是又把个体耕种压回到了集体耕种，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呢？

尽管集体化是倒退的，但在当时的柬埔寨一时能行通，之所以这样，原因是：一、这种人为安排的组织与自然形成的组织不一样，自然形成组织的领导干部都会注重工作效益，并做到对全体负责，他领导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给整体带来最大的效益，如做不到则会被抛弃。这种人为安排的组织只是对上级负责，能做到听领导话就行，在工作中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对工作效益怎样可以不负责任。由此决定了对领导干部本身的素质要求低，这个条件使柬共在当时的农民中，有足够的余地去挑选所需干部人才，组建起集体化组织以及整个的基层政权组织。

二、对于农民阶级来说，虽说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大，但这种集体化土地国有化的改制，意味着对地主阶级土地的没收，使农民与地主在经济上处于了平等地位，这种做法他们能够接受，甚至很多人会达到支持的程度。

三、对于地主阶级来说，它们的总代表是西哈努克亲王，而柬共正是打着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号推行这项工作，这使他们就是想拼死抵抗在短期内也推不出另一个总代表，形不成统一的力量去阻止这种主张的推行。再就因当时是战争期间，一些地区的地主成员会因支持朗诺而遭到严重的打击，一部分会随着朗诺败军逃往金边，剩下的地主成员在大军的威慑之下短期内至少会失去抵抗的信心。柬共搞试点也定会挑选这样的地区。

正因为以上几个条件，在试点搞成功后，便开始推广，到金边解放前，柬共控制区内大部分地方推行了集体化，从而也建立起了与柬共性质完全一致的基层政权组织。（当然，这种集体化也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是一种倒退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压制社会的积极性，使社会不断走向贫穷，最后也会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制度的弊病是慢慢体现出来的，在不掌握规律的情况下既认识不到，也看不出来，所以柬共推行开集体化后，增长了不断改制的信心，致使在取得全国胜利后，为彻底消灭阶级和根除产生阶级的根源而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由于这是关系到红色高棉最后成败的根本大事，不只柬共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对于毛泽东来说，柬共是他亲手扶植起来的，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对于这条政治路线，他总感不妥，根据自己的经验，总认为当时柬共应推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所以在 1974 年 11 月份，他接见英萨利和西哈努克亲王谈论打倒朗诺后的建国方针时，先强调柬共以后不要怠慢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人，又着重对英萨利说：“要减租减息，要分土地给农民，不仅要和富农搞在一起，还要团结一些小地主。对买办资本家可以没收财产，不要动民族资本家的财产”。毛泽东的这些话，分明是建议柬共在农村走土地革命的道路，在城市走工商改造的道路。但因这是根本道路问题，事儿太大，英萨利虽是柬共的重要人物，也做不了主，只好回国如实向波尔布特汇报。

对于波尔布特，虽然他非常感谢毛泽东的支持，但毛泽东给柬共指出的道路又使他非常为难。因为他清楚，在这两条道中，土地革命的道路在柬埔寨行不通，而对城市工商改造的道路，不管能否行通，也不管这条道对与错，客观原因迫使他不能走这条道路（不走工商改造道路的原因后面分析）。但这些又不能说明，因为说了也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党领袖，就再感谢毛泽东，在关键的政治路线问题上也不能去完全听从，但对毛的建议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决定他一方面在国内必须按自己的主张办，另一方面又不能使毛泽东产生反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1975 年 1 月份他来到北京，对毛泽东解释说：我们不像老挝，高棉民族单一，阶级结构也不复杂，很有希望超越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等过渡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对于当时的毛泽东，一者提这些建议，本身就完全为了他们好。再者柬共毕竟不是他领导下的支部，又根据本人与苏联闹翻的经验，他不能对柬共下命令怎么办，也不能采取高压手段，所以在波尔布特的坚持下，只好顺其自然。

当时金边已完全被包围，夺取全国胜利已是时间问题，所以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于夺取金边前两个月，柬共召开高层会议，对建国后的政治路线做出决定，不仅决定要在全国农村全部推行集体化，还做出了一种被人们认为离奇的决定——把金边所有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参加集体化组织。

关于这个决定，始终令人不解。按柬共官方的解释是：一、当时是为了解决金边的粮食问题；二、为了防止美国和苏联的特务在城市发动暴动。另一种按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柬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决定，他们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必须加以消灭。其实这三种解释都漏洞百出，也都没说服力。首先是第一种，如果要真的是为金边缺粮而疏散人口，那当时疏散的地方是农村，这证明农村有粮食能供应城市，而这些农村都在柬埔寨境内。像这样，在全国统一后，政府可以从农村调粮入城解决问题，并且这点应当完全能做到。再就是第二种，在一般情况下，不管哪个政府，对一些特务所进行的破坏和发动的一些暴动都会进行防范，但不会有一个政权惧怕这些，因为单凭这些根本就没有颠覆一个政权的能力，这点任何一个执政者都明白，波尔布特也不应例外。再者是，即使以后美国、苏联的特务真的搞暴动，并且规模大些，又能大到哪去呢？难道还能大过美国支持的朗诺吗？而柬共连朗诺都能打败，又有什么理由说因惧怕一些特务发动暴动而撤空整个城市呢？所以柬共官方这两种解释纯属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还有第三种，即人们的解释照样不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消灭阶级，而不是消灭城市，如果要消灭阶级，完全可以就地推行，根本没有必要把人们全撤出去再消灭阶级。波尔布特对这些道理应该是明白，而不应糊涂到把城市作为资产阶级，作为消灭的对象，把农村作为无产阶级，作为依靠对象的地步。退一步说，就算波尔布特真的糊涂到了这个地步，既然把城市作为消灭的对象，那么，在做出疏散整个城市居民决定的同时，也应当做出对整个城市居民怎样进行专政的决定。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资料显示他当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417 人和新人，旧人之说，是产生在 1976 年以后，这分明是因撤空城市，给 200 万城市的居民造成了灾难，由此也会遭到这些人的反抗，波尔布特为镇压这些人的反抗，才创造出了 417 人和新人、旧人的名词。这说明对城市居民进行专政的决定不是在金边解放前作出的，也证

明第三种解释不是当时撤空城市的根本原因。

撤空金边城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波尔布特乘西哈努克亲王回国之前，抓紧时间破坏掉金边的旧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1973 年 5 月柬共推行集体化，大部分农村中打破了旧制度，并建立起与自身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但对柬共来说，要想真正取得全国政权，就必须在全国都达到这种程度，自然也包括金边在内。如果条件允许，在取得金边后，他们可仿效中国当初，在推行工商改造的主张中去逐渐打破旧制度和旧的社会结构，从而建立起与自身性质一致的基层政权。但这项工作从动员到搞试点看效果，再全面推行最后完成，恐怕至少要两年时间，而当时有一种情况使柬共没有这么长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在金边解放后，很快将要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国主政。虽然自 1970 起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西哈努克亲王一直在北京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任何权力。但根据亲身经验，波尔布特清楚他在国内的影响力，更清楚他影响力最大的地方是在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中。所以只要金边的旧制度和社会结构存在，客观上就等于有他的活动范围，他就不会甘心把全部政权让给共产党。到回国后为了与柬共争权，只要一呼吁号召，金边就会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与柬共抗衡，这至少会对柬共政权形成一种掣肘，也不能排除柬共武装力量出现分裂一部分倒向西哈努克的可能。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结局，在西哈努克亲王回国之前，他们必须破坏掉金边的旧制度与旧结构，使其回国后失去活动的基础。因为从 1974 年开始在北京商谈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国的时间距金边解放时间不太长，又没有其它理由再把西哈努克亲王长期拒之于国门之外。所以，在没时间对金边进行工商改造的情况下，对于柬共，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金边所有居民疏散到全国各地。正是上述原因，波尔布特当初才同时拒绝了毛泽东土地革命和工商改造的两项建议。也是这些原因，为了赶时间在占领金边后第三天，就编造了美军轰炸的谎言欺骗金边居民，以此为借口，用武力强行驱赶所有居民转移到各地农村去参加集体化组织。这种措施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后，在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它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又被彻底打破，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半年就被迫宣布退休。他的首相宾努亲王率首相府全体成员集体辞职，全国政权无论实际还是名誉上都落在了柬共手中。但这种措施却使金边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先是 3 万人死于大转移的途中，后是把 200 万人送入了深渊。这些又成了促使整个社会矛盾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三）

对于柬共，1975 年 4 月 17 号是一个伟大的日子，金边的解放，标志着由它领导的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对西哈努克亲王采取了防范措施后，在国内他们已感到无任何后顾之忧，于是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计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他们决心把柬埔寨建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使柬埔寨人民过上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不存在贫富差别，首先取消了私有制和一切私有财产，完全实行配给制，禁止私人买卖，取消货币。设计每 30——40 户为一个集体，设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在工作之后不用回家做饭，直接进大食堂享受同等水平的饭菜。衣服完全一致，由国家统一发放，不允许穿任何高档华丽衣服和佩戴首饰。通过这些真正实现消灭阶级人人平等。为根除人们的私有观念，进而又解散了家庭，把所有人包括孩子在内，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段编入不同的集体组织，住进各自的集体宿舍。这些分明是为了让人们树立孩子不属父母私有的思想。为了在婚姻方面根除私有观念，废除了以前的婚姻法，规定婚姻不能由男女双方私自做主，而是由组织指定，婚后夫妻不能长期居住在一起，每个星期可以团聚一次，其余时间双方都得生活在各自的集体宿舍。

在波尔布特及柬共中央看来，通过这一系列的共产主义改制，能够使人们在各个方面根除私有观念。这样不只现在能够消灭阶级，还能永远不出现贫富差别，子孙后代都可以生活在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中。然而不管波尔布特处于多么良好的用心，事实的结果定会与他的主观愿望相反，不仅给社会带不来幸福，还会给社会造成灾难。因为从现实说，这种制度已完全破坏了人们正常生活中所依赖的各种条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它比 1975 年以前的集体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程度要严重得多，已基本返回到了原始社会。从各方面分析也只有原始社会才会产生共产主义制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人类产生之初，各种能力小，为了生存只能以集体的形式集体的力量去捕捉、采摘，凭个人的能力根本就干不了这些事，而对收获成果也只能是各取所需。柬共的共产主义制度与原始社会不同的是存在了统一分配，但这种分配因数量一致，对食量大体力工作量大的人更是一种悲惨。试想一下，让现代人回去过原始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推行共产主义制度不给人们带来灾难才是一种怪事。

这种制度的严重性对于波尔布特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中国大跃进的结果他也清楚，并且在他们推行之初，即 1975 年的 6、7 月份波尔布特在北京访问，病中的周恩来以中国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例，不只一次劝导波尔布特不要这样做。10 月份英萨利与乔森潘来北京接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到医院向周恩来辞行时，周恩来又以告诫、提醒，甚至为了避免严重后果不惜以怨恨的口气对二人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将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对于周恩来的劝导和告诫，波尔布特听不进去，因为在他看来大跃进的方向没错。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当时的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实际也就是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破坏的不彻底。并坚信柬埔寨只要比中国的大跃进进行的彻底，定会达到胜利的彼岸。所以他当时提出的政治口号就是“超大跃进”。事实的确超过了大跃进，如打破家庭、指定婚姻、夫妻分居，整个人民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统一编队住进各个营房，这些中国都没做到，而柬共都做到了。正因为柬共比当时的中国做的有过而无不及，使柬埔寨遭受的灾难也就更严重。以下分析一下这种制度给社会带来灾难得必然性。

由于这种制度本身就是严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倒退。与社会发展阶段完全不相符，在推行中会严重压制社会的积极性，限制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在思想上盼望着幸福的到来，另一方面在工作中成为盲从的群体。而整个政权机构在推动工作中，因为这种制度根本就没法符合实际，也必会导致不管实际。各级只对上级负责，按上级的指示办，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指示去做表面活，来显示形势一片大好。这样在工作中很多情况下就变成了瞎指挥，各项工作进程中都造成一定的人为损失。像上述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根本就无法避免灾难的发生。以中国为例，凡过来人都知道，在大跃进的头一年（1958 年）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维持人们一年的正常生活本应没问题。但在收割过程中一者是干部的瞎指挥，再者是只管收割数量不管收割质量，很多粮食都丢在了地里。由于当时取消了私有财产，不允许个人有一粒粮食。对于丢在地里的粮食扔掉可以，如果个人拾回家，会受到惩罚。致使很多粮食烂在了地里。粮食收回后，很多粮食放在一起，到处都是粮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很多粮堆也根本没人管，在这种到处堆放中又损失了很多，最后剩余的粮食，本来就很难再维持人们一年的正常生活，但是为了体现共产主义制度是最美好的社会，能使人们过最美好的生活，开始阶段集体大食堂每天都给人们做丰盛的饭菜，无形中又浪费了很多，剩余的粮食越来越少，已经达到了没法维持到第二年新粮食成熟的地步。尽管如此，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却都没有后顾之忧，普遍认为粮食不够了没关系，到时候上级就会给调拨，并会派汽车给送来，继续让人们过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而真正到了粮食紧缺时，因全国到处的情况一样，哪都没粮食可调。到这时才迫使干部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结束了人们丰盛饭菜的幸福生活。但为时已晚，就怎么节约也挽救不回来，致使 1959 就出现了粮慌。大食堂开始以最低的标准给每个人定量分配食物，并逐渐减少，人们实在饿得没办法，很多人又把去年扔在地里的粮食、薯类，只要能吃的都偷着捡回家，再采一些野菜，当然，也有人在 1958 年粮食归公时偷偷埋藏了一些。这时便有计划的拿出一点与野菜合在一起，到半夜时在保证外人看不见的情况下偷偷做熟全家食用，以补充一些体力维持生存（之所以半夜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外人看见后报告政府受到惩罚）。

中国这种实际，完全可以反照出柬埔寨当时的情况，并且柬共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更彻底，不仅对私有财产破坏的滴水不漏，还破坏了家庭。当时的人们在每天收工之后，既不能与家人团聚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欣慰，也没条件私自在半夜偷着做点儿勉强能吃的食物来补充一家人的体力。这不难想象出它们的情况会更加悲惨。事实也正是这样，柬共自 1975 年推行“超大跃进运动”，到 1976 年在全国范围内就出现了粮慌，并逐渐走向严重，在这个基础上，其它方面的灾难更是不可避免。因粮食短缺，大食堂配给每个人的定量食品逐步减少，不仅使人们越来越食不果腹体力逐渐下降，又得在“跑步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下，每天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去修堤筑坝。体力差的逐渐顶不住，生病的人越来越多，而生病后一是得不到营养方面的补充，更重要的是没有西医西药的治疗（因当时柬埔寨普遍不相信西医，普遍没有西医西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因饥饿、劳累而病死。像这种局面要是在短期内能扭转也许问题不至于太严重，但在这种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灾难不仅没法扭转还会日趋走向严重。相应整个柬埔寨的局面也不可能避免地会朝着逐渐恶化的方向发展。因为饥饿劳累会使每个人都会难受痛苦，死亡更会使每个人惧怕，这种情况时间一长，必然在社会中产生抵抗情绪。抵抗情绪最大的，自然是从金边疏散出来得 200 万居民。这些居民一者是其中一部分人在疏散途中无故死去的亲人；再者是这种制度对他们正常生活的破坏比原生长在农村人更严重，使它们失去的幸福更多。而对于波尔布特来说，当时为防范西哈努克亲王疏散金边居民，完全是为了本党之私，并没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这种情况使他既没法把真相放到桌面对金

边人民解释以求得谅解，也没其它办法与金边人沟通。对他们的反抗情绪只有压制。于是公开宣布他们为 417 人或新人，并规定新人必须接受旧人的思想和劳动改造，实际也就把他们交给农民进行管制劳动，以求在这种压制中平息或减轻他们的反抗情绪。但从各方面分析，波尔布特这样做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其原因是：首先对金边居民，这种做法不仅平息不了他们的抵抗情绪，还会加剧。其次对于原来的农民阶级，他们在饥饿劳累的问题上并不比金边居民轻多少，由此使他们本身也会有抵抗情绪。他们需要解决的是饥饿和劳累，而不是需要管制对象。当然随着新人旧人的分类，也许对他们的待遇会略高于金边居民，但这些并不能改变他们受灾受难的处境。所以这种做法最多使他们在短期内能产生一种心理平衡，而时间一长，这种心理平衡不仅会打破，抵抗情绪仍旧回升，还会因执行波尔布特的命令与金边居民产生大的矛盾。而这种结果，等于在大局不断恶化中加放催化剂。社会的整体局面反映到党内，同样会促使矛盾上升并很快出现反对派，使波尔布特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原因如下：

一、凡是走革命道路成功的组织，本身就人才济济，就这些人才的素质而言，一般都具有很高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同时很多人也都具有很大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在创业过程中，他们都能做到为全局利益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同时在内部也不会放过任何争夺权力和地位的机会。正是这个因素，不管谁占领了领袖地位，在路线问题上都不能犯重大错误，如果一旦犯了重大错误，给整体造成重大损失，这些人决不会答应。既为了整体利益又为了个人的权力欲和领袖欲，会尽一切努力去把其拉下马。像这样，在波尔布特推行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已严重违背规律，并给整个柬埔寨带来灾难的情况下，不知会有多少股势力争取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出现政变或拥兵自重闹独立的事件也都在情理之中。

二、任何组织中都存在着派系之争，一般情况下，不管哪派都是一面为整体努力奋斗，同时在内部又都是争取压倒对方争取主动，柬共内部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尽管以波尔布特为代表的留法派一直占据着主动地位，而当初属于越共支部的所谓“亲越派”从 1953 年就存在。这个派系论资历比留法派老，论贡献比留法派也小不到哪去，因此它一直使波尔布特感到吃劲。正是这个原因，从柬共发展到自立程度的 1973 年，他一方面背靠中国与越共抗衡，以求结束在越共面前一直处于小弟弟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内部以各种手段排斥压制“亲越派”。对此，“亲越派”当然不会甘心。但因波尔布特联合西哈努克共同抗美的路线已收到了很大效益，柬共的事业蒸蒸日上，“亲越派”没法，只能忍耐。波尔布特因主张错误给柬埔寨带来灾难的局面，使“亲越派”找到了反攻的机会。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集聚力量争取以各种手段推翻波尔布特也是一种自然。

三、由于柬共在发展过程中打的是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号，自己一直没公开身份，也没有公布对社会的主张。很多人参加柬共、及其武装组织并不是奔的共产主义，而是奔的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旧制度。由于这个思想决定他们对波尔布特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本来就会反对。西哈努克亲王回国后半年，在 1976 年 4 月就被迫退休，更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所以即使波尔布特的政治路线不出大问题，这些人迟早也会与他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会站在反对立场，积极支持推倒波尔布特。

四、有些既属于波尔布特的派系，并在创业过程中，对柬共事业以及波尔布特本人有功之臣，为挽救灾难局面，到这时也会站在反对面。尽管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把波尔布特拉下马，并且在别的派系这样做时他们还会尽最大努力去维护。但在全国已形成灾难的局面下，从全局出发为了全国人民及整个柬共的利益，他们会利用党内的合法权力或者以反映情况的形式提书面意见，或者在开会时直接提意见，争取阻止或终止这条共产主义的政治路线，使灾难降到最低程度。

党内形成的种种暗流，矛头明显都会指向波尔布特，使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感到担忧害怕，所以在 1976 年 9 月他就忧心忡忡地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但对于波尔布特本人，一者他的权力欲与领袖欲不小于任何人；再者，他取得最高统治地位是自己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使他对自己的地位更珍惜；三者像波尔布特这样的创业之主，本身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只波尔布特就任何人都不会甘心认输，把权力交给党内政敌。又由于自身给社会造成的灾难，使他失去了采取和平手段化解矛盾的条件。迫使他只有采取非正常手段对反对派进行严厉地镇压，从而也就决定了柬共党内必然出现的大清洗。因为清洗的对象是党内的政敌，这些人一般都对柬共有较大的贡献，这决定在对其清洗的同时，必须要有一个能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的理由，并且这个理由也必须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波尔布特把金边图士楞监狱（代号 S-21）专门用作找理由的指定点，凡是被捕后投入这里的人在被处死之前，不管用什么严酷的刑

罚，都必须按监狱长的意图，做出能被其接受的交待。这样就不再难解释，为什么在（S-21）被处决犯人的口供，几乎千篇一律都是美国、苏联、越南的特务。因为在外国的指使下，对柬埔寨进行破坏，属于民族矛盾的性质，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

在这种清洗中，不只前三种反对派中被锁定者都在劫难逃，即使第四种，在党内正常生活会议或工作会议上提意见者，以及提书面意见者中，只要是被锁定，也一样会难逃厄运。这些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他们这种行动难免会直接涉及党的政治路线，而这点正是波尔布特的命根。对于一个最高统治者，在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即使想改正错误，也只允许自己说自己改，因为这样可以以其它理由掩盖实质，慢慢的一项一项地改，能够做到不动摇他的统治地位。反之要在别人不断批评中，一旦证明出严重后果是由政治路线错误造成，在客观上就使他失去了继续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条件。所以后果越严重，就越是不允许别人批评或提意见，一旦有人这样做，不仅会促使其更加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政治路线，还会对这样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击。中国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本是制止左倾的初衷，由于彭德怀指责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他个人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还使会议落成了更左的结果就是这个道理。而柬埔寨 1976 年的情况与中国 1959 年的情况在性质上完全一致，所以处在当时的波尔布，照样会不允许任何人去随意涉及指责“超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为了把这种风气压下去，只好找几个典型来杀一儆百。在这个问题上，他明知道这些人冤枉也得这么办。正是这个原因，一些与波尔布特本来是生死弟兄，并对他一直忠诚和有贡献的人，在被抓进 S-21 后，直到被处死，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什么原因导致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四）

尽管清洗是为了把党内的反对派镇压下去，以消除对自己的不利因素。而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则取决于社会的灾难能否扭转过来。但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灾难正是由它造成，只要这条政治路线不改，灾难只能加深，没有一点扭转的可能。这使清洗不仅压不倒反对派，还会如火上浇油，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大。迫使波尔布特为了自保不得不加大清洗的力度，扩大清洗的范围，以致在这种不断重复递增中四面树敌。逐渐走向完全孤立，最后导致自己的彻底失败，事实也正是如此。

到 1977 年粮荒进一步升级，大食堂配给的食物，在原来就不断减少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人们更加饥饿难忍，体力进一步下降，更加经不住病魔的侵袭。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断增加人们的体力劳动，不断延长劳动时间，以致饿死、累死、病死的人不断增长成了全国的普遍现象。由于人们已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反抗情绪定会增长，各种矛盾自然会上升，反应到党内反对派的势力也会很快扩大。为了摆脱威胁，波尔布特只有加大清洗力度，而在这种加大中，单靠金边的图士楞（S-21）监狱已不能完成任务，不得不在各地不断增设清洗机构，把越来越多的人就地处决。

到这种程度，波尔布特至少应该感觉到了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从内心说，他既不愿社会出现灾难，到这时更想扭转局面。但在内部反对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他又不敢公然改变政治路线，只有寄希望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有所改变。采取增加人们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结果一点作用不起，还使问题进一步严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更多，这种碰壁，自会使波尔布特感到非常苦恼。而在这种情况下又极容易走向极端，所以在这种苦恼中，使他由希望转为了怀疑、仇视，认为灾难的不断深重，是社会一些不满者在故意与共产主义作对，要使局面有所改变，只有清除这些人。这样就决定了清洗范围必然会由党内扩大到社会，首当其冲的也自然是他得罪最深重的 417 人，。于是他便以重新登记，重新审查个人历史，清理阶级队伍等手段，对 417 人进行了大清洗，以致大量的商人、知识分子，原来有产者、大量的华人、越南人等外国籍人，或公开或暗地被无故处决，整个 417 人都处在了人人自危的环境当中。而结果，社会的灾难仍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波尔布特一方面感到走投无路，一方面由原来的苦恼变成了恼火，又把目光投向了他一直依赖的农民阶级，怨恨基层的领导干部没能力，不能联系群众，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于是又下决心在这些人中清除无能之辈，这样很多的基层领导干部也稀里糊涂的被杀掉。然而，一则波尔布特清洗这批人纯属发无名之火，这明显是太过分了。再者农民阶级在柬埔寨是绝大多数，并且一直是柬共的支持者，对波尔布特也没构成过任何威胁。所以杀掉这批人，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波尔布特感到后悔，但是已无法挽回，只有继续走下去。为了防止在农民中引起反应，在一些地区出现有组织的反抗，清洗掉这批人后，又采取措施，规定村与村之间的人不许接触，如一个人有事非要到另一个村不可，也得经过组织的核实批准等等，来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防范和控制。到这种程度，柬埔寨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监狱。尽管这种结果绝不是波尔布特的初衷，也会使他感到害

怕，但也没法回头，为了自保，只有硬着头皮一方面继续加大镇压力度，另一方面尽量找一些理由来推脱自己的责任，以求尽量减少一些反对派的情绪。又是出于这两种需要，从 1977 年 9 月份开始，他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柬埔寨共产党正式公开身份；二是号召全党要睁大眼睛抓细菌。

当然，对于柬共的公开问题，自上一年 4 月西哈努克亲王宣布退休后，柬共已成了公开的执政者，到这种程度再继续保密已没必要。从这个角度说，柬共的公开是一种顺利成章的事。但对波尔布特，在这件事上还有深一层的意思。因为柬共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柬共的公开，也标志着它的指导思想的公开，这样波尔布特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他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是在按马克思指引的道路走，是完全正确的。退一步说，即使错了，责任也在马克思，而不在自己。所以波尔布特公开柬共的深一层意思，就是在向全党以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做这种暗示，争取用这种办法减轻一些反抗情绪。当然他也清楚，靠这种暗示起不了根本的作用。要使自己的统治地位能够维持下去，只有对一切反对派继续进行镇压。所以在公开柬共的大会上，他就把一切反对派划为阶级敌人，又把阶级敌人比喻成细菌。后又在多次重要会议中指出：阶级敌人虽然像细菌一样无处不在，但我们不怕，因为党有着像菠萝一样多的眼睛，同时号召全党要睁大眼睛抓细菌。并以此作为推动全党一切工作的动力和标准。多次强调：如果我们的工作上不去，就证明我们抓细菌工作不够彻底。（这些可以证明出波尔布特当时已达到了看谁都是敌人的程度。虽然他在多次会议上说：阶级敌人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只是百分之一、二，实际在他心目中当时能信得过并能依靠的人，也许只有这个比例或已接近这个比例）。

正是在抓细菌的思想指导之下，清洗规模进一步升级，到 1978 年，改变了以往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中，分期、分批的找重点镇压的办法，而是以大区为单位，对区内各级党、政、军机关内的一切反对势力和稍有不满情绪的农民，甚至被认为已失去生存价值的成员一律进行清洗。这种办法在一些大区，清洗范围能涉及到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成员和农民阶级的多数家庭，个别的重点地区能达到每家每户。东部大区是这次清洗的重点，据一些资料显示，不只党政军机关成员大部被清洗，就在农民中，很多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人被杀掉。总人数达到或接近了 10 万人。

像这种趋势，对于波尔布特，在他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迟早非走到这步不可。但对社会来说，他这样实际是在逼着人们铤而走险。所以在这次清洗中，到 1978 年 4 月份，便激成了兵变。韩桑林、洪森两个师长率部起义，公开站在了波尔布特的反面。尽管因力量太小，在波尔布特的镇压下，到 8 月份他们被迫退往了越南。但却能反应出在柬埔寨国内反抗因素已经达到了高峰，并且这点韩桑林与洪森都清楚。所以在退到越南后，他们一方面高举反抗大旗，号召国内人民起来推翻波尔布特的统治，一方面要求越南出兵，帮助他们杀回柬埔寨。而对于当时的越南政府，一者是与波尔布特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高峰，结束波尔布特的统治正是他们的希望。再者是波尔布特在国内已失去了整个社会支持的情况他们也清楚。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他们估计打败波尔布特的希望很大，所以对韩桑林与洪森的要求很快答应。并于当年 12 月 25 日予以兑现，这天越南 10 万军队分数路对柬埔寨开始进攻。而这时的柬埔寨，首先在社会中无论是 417 人还是整个农民阶级，在当时的制度下，不仅完全失去了正常生活条件，随时都面临饿死、累死、病死的威胁。而且即使勉强生存下去，在日常中稍有一点反抗情绪还会被处死，这使他们在思想上已完全站在了反对立场，就不公开起来反抗，也绝不会再去主动积极支持波尔布特。再就武装力量而言，社会的灾难使每一个战士没法不越来越牵挂家人的命运，并会逐渐产生不满情绪，这本身会使战斗力下降。一次次的清洗波及到军队，很多人被处死。这个情况使各将领之间为了自保，都会一方面尽力不被别人抓住把柄，避免自己被清洗掉；一方面又尽量抓住别人把柄而互相提防、互相牵制，整个军队在这种持续中没法不丧失战斗力。正是这些原因，波尔布特的军队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在越军的进攻中一触即溃。越军并没有遇到什么实质的抵抗就进入了柬埔寨。这种情况下的柬埔寨人民不仅不与柬共军队并肩作战，很多人还自发的以各种方式配合越军和韩桑林军队的进攻，越军的进攻非常顺利，只半个月就占领了金边，结束了波尔布特的统治。但在波尔布特掌权的 3 年零 8 个月中，在其推行的共产主义制度下饿死、累死、病死以及被清洗死亡的人数达 200 万之多。

到此概括一下柬共的历史就能看出，红色高棉之所以从良好的愿望出发，最后不仅给社会带来灾难，自己还走上了大屠杀的道路，是因为其推行了共产主义制度。而波尔布特之所以认准这条道路，是因为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总的方面，他们的这条政治路线最后的失败，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指导实践的能力。尽管这个道理比较明显，但作为当事人却不从这个根本点考虑，也不承认这些。比如柬共的二号人物农谢，在被国际法庭逮捕前不久接受记者访问时，还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并声称将继续为之而奋斗。另一个重要人物乔森潘在同一时期接受采访，当

记者问他在柬共掌权时为什么会出现灾难和大屠杀（大清洗），他的回答：一是各大区的掌权者权力过重；二是下面的领导者们不懂得也不会领导人民。像这种回答明显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如乔森潘所说，首先是第一种原因，这种结果要真是由于地方政权权力过重自己胡闹造成的，则说明中央对地方已达到了失控的程度，而柬埔寨在当时并不是这种情况。还有第二种，不知乔森潘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自己是基层的领导干部，在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本身就无法行通的条件下，自己能够做到既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又不脱离群众支持吗？可以肯定地说照样做不到。从这两人的答记者问可以看出，对于社会制度错误的问题，农谢直接不承认，乔森潘间接不承认，估计波尔布特要活到现在也会如此。不仅这些当事人，就在人们的评论中，一些说柬共推行的是畸形社会主义制度。言外之意社会主义制度仍是正确的。如真这样，就算柬埔寨当时是畸形，在别国起码也应出现一个正常的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国家在不改变方向的前提下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越富裕，但事实上连一个都没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硬坚持中越走越穷越不行，最后都被迫从根本上改向，向资本主义靠拢。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当初又都是按马克思指的道走的。根据这种事实，我们可以做出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一、如果马克思主义要具有指导实践的能力，则证明所有后人都愚笨到了学不会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二、如果后人要不是都愚笨到了这个程度，则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指导实践能力的。从各方面分析，问题的实质应属于后者。正因如此，社会主义道路才走不通，又因波尔布特在推行马克思指引的道路方面比其他国家更坚决更彻底，给柬埔寨造成的灾难也更深重，失败得才更快更惨。其实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对于执政者由于政治路线错误给社会造成灾难的并不只是波尔布特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就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也经常出现，比如美国总统布什，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照样是因政治路线错误给本国造成了重大损失，更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灾难。之所以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没掌握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不知道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各地区在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定位点。如果要掌握了规律，知道了这些，对于一个执政者来说，在明知道会给社会造成灾难的情况下，谁都不会去推行错误的主张。因此我希望一些有能力者与我联系，使我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能够得以公布，以避免或减少人为给社会造成的灾难。

回忆赤色炼狱《S21 红色高棉杀人机器》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乔治•奥威尔《1984》中政府的口号

《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 The Khmer Rouge Death Machine），这是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2003 年拍摄的一部回忆当年的红色高棉杀人集中营 TuolSleng 监狱（简称 S21）的纪录片。导演本人 15 岁时从一个劳改营逃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被动参与者，使得这部片子更多了些悲凉和沉重。

影片主要组成部分由当时的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当时有受害者（一个画家），监狱守卫，行刑者，医生。影片以一个老电影的片断开始，影片中的歌曲听起来竟是那样的耳熟。然后就是平静的让人窒息的访谈。影片中采用了极其简朴的拍摄手法，场景简单时可以仅仅是一间空房子。当镜头转到 S21 旧址时，导演也没有让我们看到那里纪念塔上的几千颗窟窿，仅仅让我们看到了一堆破衣服碎片还有从里面捡出的一粒扣子。影片的后半部分中有一段现在看起来即荒谬又恐怖的“重演”，一个模仿者在空空的牢房中训斥着“囚犯”，给“囚犯”拿小便器，不厌其烦地对着每一个窗口大骂，“不许乱动”，“操你妈的”……空牢房的墙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囚犯的编号。

纪录片的力量往往体现在对真实和细节的关注。片中的画家说到了当时被捕的情景。几乎没什么原因他就被捕了，面对残暴的红色兵团，被捕者的恐惧随时会出现，不会给人任何心理准备。当他们在像牵牛一样被拴住了脖子时，他听到了一阵电话铃响，他认为“他们在这儿使用这种工具，我们离法律很近了”。但是进化到二十世纪的人类虽然已经有了让自己洋洋得意的技术，但是兽性仍不时暴发！甚至超越了野兽，完全变成了杀人机器！画家当时被关在牢里，每天吃两勺汤，基本不上什么厕所。当他抓住一个虫子吃时，看守用力的踢他的脸，一直把虫子踢出来。画家说，“我不明白，这种野蛮的原因是什么”。

当时 S21 的守卫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并没有反思那段历史，甚至一切与当时的政治有关的背景都被忽略了。导演没有费大笔墨勾画当时的扭曲历史和人性泯灭的政治背景，没有叙述任何宏观的史实，而把镜头完全给了那个组成时代的个体。这样的微观历史更真实，也更残酷。此时的老兵在镜头前没有一丝对历史的反思，“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不会抓错人”，“惩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回答，不是为了好玩才实施的”。在场的画家说，“你就没有自己的思维能力？”当然，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

影片还讲述了当时的医疗。在一个集中营里竟然还有医疗这可能显得有些奢侈，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经过劣质培训的“医生”用低劣的手法让犯人不要死的太快，“要是死的太快，资料就没了”，“给他治疗，是为了下一轮审判”。还有更可怕的抽血，把一个人抽干，直到他眼珠上翻，然后这个地方埋了。

导演用几个人切身的口述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时代，这种纪录是残酷的，带给观者的深思空间也是无限的。今年我看过中国胡杰拍的一部纪录片《林昭》，那部片子也是从个人的角度阐述历史，还原历史的原形。让我们顺着导演的视线继续走下去探索，思考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导演为什么采用微观叙事方式的原因。

这段历史从越战说起。当时美国打越南时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国内抗议浪潮一波又一波，郁闷的要命，于是要求柬埔寨帮忙打越南，但遭到西哈努克亲王的拒绝。美国对此很不满，从 1969 年 3 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并开始扶持柬埔寨政府成员朗诺将军。朗诺趁西哈努克 1970 年 3 月出访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并出任总统。美国对柬埔寨的内政干涉为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柬共（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他们趁机打着爱国的牌子扛起抗美救国的大旗。1970 年 4 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5 月 5 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担任副首相。民族团结政府得到民众衷心拥护，红色高棉的力量也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官员、军人奔向丛林，加入红色高棉的行列。而此时的柬埔寨总统朗诺本人庸碌无能，无法挑起一个国家的大梁。1971 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1973 年 8 月美机停止轰炸柬埔寨。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壮大到五万人，一举解放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了金边外围地区。1975

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 月 1 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 月 17 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

在北越和美国签订了在印支停火的协定后，红色高棉开始与越共分裂，在骂“越南修正主义”的同时，堂而皇之地树起了抵抗越南入侵的旗帜。柬共与越南抗衡，为美国出了一口恶气。于是美国转而通过泰国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和装备，希望借此削弱越共的势力扩张。有了这一层关系，美国对红色高棉日后践踏人权的胡作非为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元年”（Year Zero）。领袖波尔布特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从波尔布特夺取政权和实行统治的方式看，与我们国家的毛泽东相似的惊人。无论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是后来的共产主义大生产，大革命。文革初期，毛泽东曾经会见波尔布特，并对他说了文化大革命，说得波尔布特热血沸腾。还有 1965 年波尔布特在北京与康生首次见面，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康生传授的铲除内奸的理论，更激发了波尔布特的阶级斗争观念，他恨不得立马回国付诸行动。这波尔布特统治期间，中国是红色高棉最大的精神和物资支持者！

波尔布特刚进城就发出了一个与林彪的想法一致的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出城市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当时的中国政府再混蛋，也只是让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柬共则把全体城市人口统统赶走，到贫穷农村或者荒地搞合作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同年 9 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红色高棉认为这在世界上是个独一无二的“创举”。而大部分的金边人没有料到，此次的离开，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而波尔布特策划的这次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以强制的手段实行共产主义，强制把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这是他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知道马克思在地下看到他的世界范围内的超级 FANS 用他的几本书当面具进行屠杀和迫害时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波尔布特掌权之后，实行的是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并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似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这么想，前苏联，中国，古巴，朝鲜……而每一个国家都是以烂摊子收场！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每个人在当局的监狱里都要“写出一个反动党派，一个组织，一个破坏活动”。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本文开始我引用的的那段文字是 1948 年写的！……），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我们国家叫“忠字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强迫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民族服装和服饰，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革命装或者军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红色高棉成员的脖子上则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长布围巾，我们国家的少先队员在天气不冷的时候也会在脖子上围一块红裤衩似的布头。被放逐的“新人”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按军事编制分为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每天十几个小时，男女分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一周相聚一次。

吃饭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时一天三餐，到后来认为吃三餐多余，改为一天两餐，没过多久，粮食配给越来越少，干饭变成了稀饭。野菜、草根、树皮，蚱蜢、甲壳虫、蟋蟀、壁虎都成了果腹的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发展到最后，就像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大灾之年，人甚至吃死人的肉。

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居住的条件尤为简陋，用竹子搭成无法遮风雨的吊脚楼，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家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允许种蔬菜瓜果，但收成归公。偷吃瓜果被定为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柬埔寨走了一条集中国的三反五反、反右、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为一体的腥风血雨之路。而这些竟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1976 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纪录片说的 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S-21 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被子弹杀死就显得很奢侈和舒适了。最残忍的是对待幼儿妇女。对儿童，红色暴徒们倒拎着双脚，对着大树将其头部“砰”的一声用力的砸过去，至今还能看到大树上嵌着的小孩牙齿！妇女则在死前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

今天一座座万人坑里早已长出了肥沃的野草，二十多年过去了，据说现在还能闻到隐隐的恶臭！

只有最残酷最无情最没人性的政府才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动刀子动枪动军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叫杀害自己国家人民的国家统治者是人？魔鬼也不过如此嘛，况且魔鬼从来没真正杀过人，从来没有出现过神话中的魔鬼杀人。现在我才明白，某些人才是真正的魔鬼。中国文革中最高当权者发动群众互相揭发，互相批斗，好歹还没用军队，而柬埔寨竟然动用了最残暴的军队！

1976 年 1 月柬共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 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在大屠杀的同时，民柬对外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到 1978 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这几个国家中当然有中国！那时候中国的文革已经结束，那时侯的中共也不都是狗屁不懂的王八蛋，他们意识到波尔布特搞的是与文革一样的“极左”，但是，如果同红色高棉反目等于否定了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变成木乃伊了，但是他还是有很高的地位，他制造的神话般的光环依旧在北京或者中国上空闪耀着赤色的光芒，何况中共与波尔布特私下的秘密武器交易，抖出去会影响中国的形象，使得我们这个初步有了一点国际地位的大国很没面子。所以中共明知这是一块烫手的热地瓜，还不得不继续捧着它。邓小平东山再起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首倡“发展是硬道理”。先专后红的同时，邓不忘为柬埔寨的难弟拔刀相助，于 1979 年打了一场再荒唐不过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来以解赤柬之围，二来教训越南。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取消城市、强制人口迁移、取消货币、取消商品、取消家庭，用暴力达成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庙宇、没有学校或公共设施，文明被践踏，百姓遭涂炭，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八十年代末，世界局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共产主义风雨飘摇，沉疴不治。进入九十年代，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要求惩治波尔布特的呼声愈来愈高，就在行将被缉拿归案之时，波尔布特心脏病突发死去。波留下的阴影一时在人们心中难以抹去，因为死得蹊跷，老百姓不见 尸首

都不敢相信他真的死了，死于心脏病也太便宜了他。作为残暴践踏人权的首恶，波尔布特应被拉到海牙国际战犯法庭受审。树倒猢狲散，波尔布特死后半年时间，他的左右手乔森潘及农谢便向当局正式投诚，算是给红色高棉划上了一个句号。而隐姓埋名多年的警察头子杜克也洗心革面，在皈依了基督教以后，主动向柬埔寨政府自首，接受审判。

杀戮场还在，不仅是柬埔寨的，还有中国的。任何回避中国那段和柬埔寨的一样扭曲变态历史的人都不配为人。历史的记录者在记录这些人间惨象时，根本没办法向世人呈现一个宏观的历史，历史的组成部分太复杂了！

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的各种国籍的冤魂在炼狱般地嘶吼和哀嚎。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暴徒们竟以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两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残暴和隐瞒是不是都无休无止！隐瞒对后人来说比残暴的历史更可耻一万倍，一亿倍！

写下这篇文字，献给世界各个集权国家屠刀下的冤魂！

参考文献:

《红色高棉——柬埔寨的人间炼狱》吴嘉

《红色高棉大屠杀：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程映虹

《红色高棉大屠杀》默岚川

《红色高棉四十年兴亡路》鲁虎

红色高棉：天堂如何变成噩梦

南方人物周刊

9 月 19 日，当 82 岁的前"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接受初步聆讯，行将被送上联合国特别法庭，面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指控时，转眼 30 年过去了。"红色高棉"已成为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历史名词，在它恐怖统治之下的全能社会发生的大规模杀戮，曾经造成柬埔寨 700 万人口当中约五分之一的非正常死亡，包括处死、饿死、累死、病死的，仅埋人坑就有 2 万多个。……

农谢曾是"红色高棉"仅次于波尔布特的二号领导人，在他们治下之所以发生针对本国同胞的大屠杀，不是因为种族冲突，或者宗教争端，而是一群自以为掌握了世上绝对真理的人，要按他们的理想模式一夜之间造出一个完美社会，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标，他们不择手段，包括诉诸暴力、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从 1975 年到 1979 年，在三年零八个月中，货币被取消了，正常的商业、贸易被废除，邮政、电信甚至医院都被关闭，人员不能自由流动，不许有私人财产，连正常的家庭生活也不允许，婚姻要由组织上安排，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正规学校也停办了，书籍乃至一切印刷品都成了违禁品，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宗教活动被禁止，除了革命歌、革命舞，其他歌舞戏剧都被取缔，男女老幼集体参加劳动，集体到公共食堂就餐，实行按需分配，全体人口被分为"旧人"和"新人"，占领金边前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区人口作为"旧人"，监管知识分子、僧侣、工人、商人、市民等"新人"……这就是他们要建立的完美社会。其结果就是，一个盛产大米的国度，大多数人民只能勉强喝上稀饭，整个社会陷入恐惧与颤栗之中。为了防止任何不满的声音，他们开动高效的暴力机器，不仅随意处死政治上被他们贴上标签的人，而且不断地进行党内清洗，以保持政治纯洁性，最多的一次处决了近 10 万人。

他们点燃宏大的乌托邦之火，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堂，带来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思想变态，一次理性的扭曲，它在根本上无视人的天性、产权、家庭、基本的伦理价值等，而且完全蔑视人类文明，反知识，反文化。他们用暴力为乌托邦开路，将乌托邦制度强加在一个社会头上，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运转，又动用大规模的暴力。这是人类的一个大噩梦，强制的乌托邦曾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过深重灾难，柬埔寨只是其中一个微缩样板。尽管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比例来看，那块土地上发生的"自我灭绝的屠杀"，已经足够骇人听闻。

波尔布特死了，风烛残年的农谢终于被送上审判席，他否认自己对于 100 多万到 200 万柬埔寨人的死亡负有任何责任，认为这是有人把罪名强加在红色高棉政权的头上。我们可以说他至死不悟，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悲剧，他被 20 世纪红色思潮所裹胁，陷入激烈、嗜血的乌托邦神话迷雾中不能自拔，那些惨绝人寰的指令未必是他下达的，尤其是在波尔布特的绝对权威之下，他该负的责任很可能不是直接的，但无疑他有着一份推卸不了的责任，正是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同谋的支持，波尔布特才有可能为所欲为，农谢今天站在法庭上，本质上乃是为那段噩梦般的历史承担责任，真正的被告决不只是他一个人，也不只是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的其他帮凶。最大的悲哀在于农谢几十年后仍没有反省，没有忏悔，没有从噩梦中走出。

岁月的烟云卷不走历史的伤痛，这个噩梦不仅是属于柬埔寨民族的，也是属于人类的，因此这次审判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是一次法律的审判，更是一次文明的审判、历史的审判。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场迟到的审判，只具有象征性，而不能给施暴者、犯有滔滔罪行的人以真正有效的惩罚。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第一，审判是对人类价值、文明底线的一次庄严重申，是对全世界的一次正告，告诉世人，任何人为的灾祸、杀戮总有一天要受到追究，肇事者一定要送上审判席，接受全体人类的审判。最大可能地肯定和张扬人性本身的尊严、人的生命价值，任何人都不能用哪怕是极为堂皇的理由，任意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对于那些灭绝人性、践踏了文明底线的人，必须给予历史的制裁，审判本身只是恢复人类正义的一种形式。第二，审判是一次直面历史真相的机会，至少给了人类又一次警醒和反省的机会，人只有在过去的教训中才能找到方向，保持自我清醒。清理历史，就是为了预防人类重蹈覆辙，审判唤醒的是历史的记忆，指向的却是今天和未来。第三，迟到的审判，提醒我们再次深入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和道路，我又一次想起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过的那句话，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独裁暴政的罪恶罄竹难书

1.红色高棉推行的乌托邦。

1970 年 3 月，朗诺趁西哈努克出访苏联之际，发动了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由朗诺出任总统。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一直在丛林里打游击的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红色高棉趁机扛起抗美救国的大旗。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1975 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

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而这一天，却是柬埔寨人刻骨铭心难以忘却的日子。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他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过多的东西，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的百姓开始陷入水深火热且极其荒谬的处境之中。

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强迫城市居民迁往乡下改造，实践所谓的农业乌托邦计划。同年 9 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红色高棉认为这在世界上是个独一无二的“创举”。而大部分的金边人没有料到，此次的离开，竟是一条不归之路。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眨眼间，柬埔寨禁止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不准货币流通，连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也不允许，而波尔布特策划的这次两百万人的大迁移，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

波尔布特掌权之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血腥统治，并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强迫所有百姓必须放弃原来的民族服装和服饰，男女老少一律穿上黑色革命装或者军装。妇女不论多大年纪，必须剪清一色的齐耳短发。红色高棉成员的脖子上则多了一条红白相间的长布围巾。被放逐的“新人”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按军事编制分为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男女分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一周相聚一次。

吃饭在公社大食堂，每人配以碗筷，定时去集体食堂排队打饭。刚开始时一天三餐，到后来认为吃三餐多余，改为一天两餐，没过多久，粮食配给越来越少，干饭变成了稀饭。野菜、草根、树皮，蚱蜢、甲壳虫、蟋蟀、壁虎都成了果腹的美味佳肴。很快连这些“美食”也找不到了。每天都有人饿死，发展到最后，就像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大灾之年，人甚至吃死人的肉。

新人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居住的条件尤为简陋，用竹子搭成无法遮风雨的吊脚楼，家徒四壁，没有任何家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允许种蔬菜瓜果，但收成归公。偷吃瓜果被定为偷窃罪扭送村委会处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为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

2.令人发指的恐怖和屠杀。

在红色高棉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恐怖程度空前绝后。1976 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此后就以肃清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为借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 1975 年 10 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 1977 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

在这场血雨腥风中，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亦不能幸免于难，被处决的包括柬共中央副书记、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索平，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温威，柬共创始人之一高密，商务部前后两任部长贵敦和苏瓦西，交通部长笃平，交通委员会主席梅布兰，柬共东北大区书记乃萨南，驻越南大使森安，中央委员科莫立，原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新闻宣传大臣符宁和内政、乡村改革、合作社大臣胡荣。符宁、胡荣和乔森潘，是６０年代柬埔寨议会中著名的左派三议员，很有学问和才气，１９６７年同时投奔红色高棉。符宁、胡荣当然没有料到后来竟死于波尔布特的屠刀之下。

约２００万柬埔寨人除了死于直接屠杀以外，还死于逼迁途中，死于苦役场里，死于逃亡路上。在内部清洗中，在金边以南托土楞设立的一座代号为Ｓ－２１的看守所，就关押２万名柬共和民柬政府干部，最后只有６人生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S-21 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柬埔寨文献资料中心 2001 年 7 月 28 日公布了过去 5 年来调查红色高棉罪行的一份重要材料。这份材料说，“通过科学手段”调查发现，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在全国共设置了 158 个监狱、埋人坑 18975 个。在这些坑中共找出遗骸 1205662 具。

在波尔布特集团制造的空前浩劫中，柬埔寨华人首当其冲。华人多数从事中小工商业，文化程度也比较高，照波尔布特集团看来，是注定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是必须赶出城市加以“劳动改造”的对象；华人同国外有较多的联系，天然存在着“外国间谍”、“外国代理人”的嫌疑，这些都是足以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罪名。成千上万的华人被迫卷入前所未见的“难民潮”和“流民潮”。将近２０万柬埔寨华人在这场浩劫中死去，一部分人死里逃生，逃往国外。金边加华银行总经理方侨生说他一家就有９口死于那场大难。浩劫之后，柬埔寨已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庭。

在大屠杀的同时，民柬对外处于极度的自我封闭状态，国门被关闭，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到 1978 年底，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与之互派外交人员。

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红色高棉取消城市、强制人口迁移、取消货币、取消商品、取消家庭，用暴力达成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国家没有商店、没有庙宇、没有学校或公共设施，文明被践踏，百姓遭涂炭，国民经济全面崩溃。[1]

3. 人民对红色高棉的切齿大恨。

柬埔寨人民无法忘记和宽恕波尔布特集团的血腥罪行。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作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成员的乔森潘在离开１３年之后重返金边，愤怒的人群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将乔森潘下榻的别墅团团围住，这时有人高喊：“波尔布特在楼上！”这一喊似猛火浇油，人群蜂拥呼啸而上，将龟缩在房间角落的乔森潘痛打得头破血流。乔森潘不得不请来军警保护，在抵达金边刚刚６小时之后即狼狈逃离，乘机重返曼谷。这一事件可以显露出人民仇恨巨大火山的一角。[2]

4. 魔鬼波尔布特。

1998 年 4 月 16 日，走投无路的波尔布特死亡。在其垂死前最后一次表现了其固有的残忍，１９９７年在杀害红色高棉军队总司令宋成的同时，一并杀绝了宋成全家１１口男女老少。

波尔布特死后第二天，西哈努克国王说，他希望曾经屠杀了他的２００万同胞的暴君波尔布特之死最终将给他的饱受苦难的国家带来和平，将结束柬埔寨血醒历史上最恐怖的一页。

西哈努克也是这场暴政的受害者。他说：“我知道他（波尔布特）是恐怖阴森的代名词。我有１４个孩子，其中有５个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离开了人世。我受到了巨大的精神伤害。”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路过泰山的时候感慨地对弟子说，苛政猛于虎也。这句话一直用来告诫人

们苛政的猛毒。然而，言之过轻啊！孔子无法看到二十世纪发生的暴政。看到过二十世纪发生的无数暴政的人们绝然不会同意将暴政与老虎并列。

5. 各种理想应当和谐共处，以暴力革命推行理想社会是荒谬的。

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这些理想社会的追求丰富了我们的视野，也使我们完善现实社会有了很好的参照。应该允许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理想，但这些理想之间应当和谐共处，任何人在实现自己理想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他人的理想。然而，自从法国革命开启了以激烈的暴力手段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此同时不顾一切地屠杀异己的恶例以后，这个世界就很难再太平下去了。理想主义者、政治野心家、骗子、无赖纷纷粉墨登场，堂而皇之地使用暴力，打击异己，实现自己的理想抑或是纯粹的政治野心。利比里亚的多伊和泰勒属于无赖之列，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望便知。然而，法国革命以后逐渐增多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却经常使人们迷惑，并深陷其中。结果，他们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前者。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就属于后者。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只有 700 万人的小国，经过红色高棉统治了仅仅三年八个月二十天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里，竟有近 200 万人被迫害致死。

以暴力屠杀异己实现社会理想的最大谬误在于：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否理想并不肯定，眼下付出的代价却是杀掉大量不服从这一理想的人。理想是虚妄的，杀人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一再地表明，这样建立起来的理想社会不是什么理想，却是真实的人间地狱。

红色高棉——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政

（作者：不详）

从 1975 年 4 月 17 日起，至 1979 年 1 月 7 日越军攻占柬埔寨首都止，历史上称为“民主柬埔寨国时期”，即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执政时期。历时 3 年 8 个月。

仅一星期，近百万人的金边便成了一座空城

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安卡”(柬语是“组织上”的意思)军人进城了。人们从家里走上街头去欢迎，可是金边人发现，红色高棉军队中有许多不懂事的小孩，一些军官冷漠无情。市民头上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不久，广播喇叭响了，说是要立刻疏散到农村了，以避免美国飞机轰炸。当天中午，“安卡”派了一些军车来帮助撤退的人搬家，扶老人、小孩、孕妇上车，态度和蔼。到了第二、三天，他们不耐烦了，又吼又叫，连推带搡；一星期后，全城撤走了 100 万人，金边变成空城。

金边的市民，特别是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平时不干重体力劳动，尤其是华侨“老阿姆”(老妇人)，还缠过小脚，很少行远路。这次可惨了。烈日当空，天气炎热，又饿又乏，有的一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

超大跃进，制定一系列残暴措施

柬埔寨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全国稻谷平均每公顷产量只能达到 1.2 至 1.4 吨。但红色高棉凭空订下高指标，提出“超大跃进”口号。1976 年，民主柬埔寨政府订下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是：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 3 吨，1977 年是 3.5 吨至 7 吨。为了达到这个指标，下级机构除了虚报成绩外，采取了一系列残暴措施：

(1)加强劳动强度解放初期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社员劳动 12.5 小时，后来增至 15.5 小时。为了进行劳动监督，还设立了自行车游车队，到地头或家庭巡视，不准农民聊天或歇息，小病不准请假，大病起不来时才准告假。违者重罚。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说什么 15 年实现全国现代化，1977 年，农民可以 10 天吃一次甜汤，到 1980 年则是 3 天吃一次甜汤。可是，农民由每天的一顿稀粥、两顿米饭改为两顿稀粥，许多人饿死了。

(2)实行大食堂制度即改各家“单食”为集体“合食”。不准私人养家禽家畜和种树。一些农民饿得受不了，就只有到合作社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绝食一、二天，重则处死。大食堂以敲钟为号，村民们争先恐后进食，过时挨饿活该。

“共产主义”：没有货币、配给婚姻、没收私人财产

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后，柬共领导人波尔布特想“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把柬共建成印支乃至东方最先进的党，使柬埔寨成为印支乃至全世界最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红色高棉在其执政期间采取了荒谬的所谓共产主义的措施。

(1)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三无社会”。柬埔寨没有邮政局，不发行邮票。私人写信得托熟人辗转递交，一年半载也不一定收到。波尔布特不许新柬币发行。既然无钞票，只好实行以货易货的原始交易办法，没有商品了。

(2)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实行“配给制度”。此举的理论基础是；党是全国大家庭的家长。既然把一切献给党，婚姻当然应由党作主。谁自由恋爱或男女同行有亲密之嫌者，就要在“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服者就被批斗，因此，因爱殉情者不在少数。

起初结婚由“组织介绍”，后来发展到由组织按阶级成份及合作社社员等级“指定”。组织指定后得“绝对服从”，然后举行婚礼。每半年安排一次集体结婚仪式，仪式前的结婚配偶是绝密的。但是，如果是干部子女或亲属则可通过支部或党委的熟人“走后门”，分配到合适的对象。对退役的伤残军人，政府就分配健康的妻子去照顾他。我在柬埔寨曾访问过许多中年男女，对分配对象满意者

极少。

由于人口死亡多，政府于 1978 年提出增加人口指标 1500 万人，当时全国只有 400—500 万人，于是强加“配对”之风更盛。

(3)没收私人财产。家庭的炊具、粮食，到了办“大食堂”时都上缴给食堂。先没收自行车、缝纫机，后来没收手表、戒指，说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象征。其实，没收到的东西都给大小干部分用了。当官的有摩托车、警卫员，当个村长都威风凛凛了。

肃反扩大化：消灭散布“反党”言论的人和懒惰的人

红色高棉 1975 年掌权以后，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不断，且名目繁多，日益激烈。曾多次“清理阶级队伍”，知识分子首先遭殃。

“自由高棉”是美国豢养的企图颠覆当年西哈努克政权的部队，红色高棉掌权后，严加追捕，杀了不少人且殃及家属；对投降的朗诺部队也大开杀戒，决不优待俘虏。

1977 年 6 月，红色高棉领导机构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现在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

1978 年红色高棉竟公布《处理懒惰人法则》。这个法则规定犯下列错误之一者为懒惰人：无故不出工，迟到早退，磨洋工。处罚办法：第一次警告，罚吃粥两天。警告三次再犯者，罚停食三天，带脚镣劳动。再犯则处死。处死办法是用实心木棍或竹棍，乘其不备时重敲其后脑勺，然后推入土坑中或原始森林里。

其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是：杀害越南侨民；歧视华侨，不准讲华语，如在家里讲广州话或潮州话、海南话便被嫌疑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1978 年在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3.23”事变，即反对波尔布特的兵变，同时肃反运动开始了。被指控的兵变幕后头子是柬共中央副总书记、东北军区司令索平。于是，波尔布特派兵去围剿他，索平被迫“自杀”。由此而“顺藤摸瓜”，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曾是波尔布特通讯员、后被提升为师政委、师长的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与红色高棉决裂。

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南出兵柬埔寨，终于推翻了棉惨无人道的红色高棉政权。对于当年越南出兵柬埔寨，中国的报道当时称其是“侵略”，可在真相大白的今天看来，完全是正义之举。当红色高棉暴政惨无人道荼毒生灵时，作为邻居的越南人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挺身而出铲除暴政。可当时的中国，却站在红色高棉的背后充当暴政的帮凶。

未偿的血债

楚寒

这是一笔未偿的血债，这是一段未受到清算的罪恶的历史。

2006 年 7 月 21 日，前柬埔寨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政权的军事领袖塔莫克·切春（Tamok）在金边的一家军方医院病逝，终年 82 岁。作为上个世纪末彻底覆亡的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层的最后一个被捕的人物，同时也是现在硕果仅存的几个红色高棉主要人物之一，塔莫克曾被控以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罪名。但由于种种原因，由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联合设立的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一再推迟工作，目前尚未全面运作，观察家称最快也要到 2007 年。

塔莫克是前红色高棉政权终独掌军权的人物，曾任红色高棉部队总参谋长、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前民主柬埔寨政府军委副主席。在红色高棉执政的四年间，塔莫克因积极追随他的“领袖”波尔布特的种族清洗行动，而被冠以杀人不眨眼的“屠夫”恶名。

早在 1994 年 8 月 21 日，时任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首相的拉那烈就表示，必须对曾经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的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十多年过去了，红色高棉这个写下柬埔寨历史上最血腥恐怖一页的暴政政权，至今却尚未有人被送上被告席接受审判。

今天这则消息，让千万双渴求正义的眼睛变得失望、沮丧。罪行，应该被清算，而不是掩盖。罪恶的历史，应该被记忆，而不是遗忘。暴君和屠夫是不知忏悔为何物的，他们需要法庭和受难者帮助他们恢复记忆。1998 年波尔布特被捕后，当美国记者泰耶问及数百万柬埔寨人民被杀害的事时，这个“历史上最大的恶魔之一”（西哈努克语）瞪大眼睛说：“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一个野蛮人吗？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都是清白的。”1999 年塔莫克被捕后，他宣称对红色高棉时期杀人的事不负责任，他的主要任务是搞农业、修路建桥。

回忆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实在是悲惨而又令人恐惧。但是对于后人来说，回忆罪恶就是对那段罪恶的历史的清算。在 31 年前的那个日子，1975 年 4 月 17 日，红色高棉部队攻入金边，扳倒了当时的朗诺政府，开始了红色高棉所谓的“元年”，这一天也成了柬埔寨人民噩梦的开始。波尔布特以战备为借口，下令城市居民全部遣散出城。在红色高棉军人荷枪实弹的逼迫下，市民全部被驱赶到乡村去强制苦役。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数日之内，金边这座昔日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有着两百万人口的都市，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途中，多少人死于饥饿、疾病、劳累、不堪忍受的折磨之中。这次波尔布特策划的两百万人的大迁移的创举，因事先毫无物质准备，直接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死亡。

红色高棉掌权之后，更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开始了长达 4 年的血腥和荒谬的统治（1975 年－1978 年），其残酷手段曾令全世界人民的良心为之震颤。暴君和屠夫们为了建造“人类社会的天堂”，宣布消灭私有制，没有工业，不准商品买卖、禁止货币流通，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按军事编制分为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吃饭在公社大食堂，穿着是齐一色的黑色革命装或军装，住集体宿舍，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一周相聚一次。刚开始一日三餐，后改为一日两餐，再后来粮食配给越来越少，配给野菜、草根、树皮、蚱蜢、甲克虫、蟋蟀、壁虎，每天都有人饿死，发展到最后，甚至吃死人的肉。在此期间，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一百多万人因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去。千万人死于新政权“伟大理想”的实践当中，好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柬埔寨”！

斯大林说过：死掉一个人我们会悲痛，而死掉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只有一个抽象资料。在独裁者、暴君的“宏伟蓝图”的设计中，文艺复兴以来尊重人的生命、肯定人的尊严的普世价值观在他们的眼里变得一钱不值。在杀人方面，以波尔布特、塔莫克之流为头目的红色高棉政权堪称这位前苏联暴君的好学生。为了建立一个“最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红色高棉的良方是——用暴力达成社会改造。在用枪杆子取得了政权之后，红色高棉开始实施其改造新人的计划，以便通过改造让人获得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前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

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脸颊上有戴眼镜痕迹的人也难逃厄运。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连腹中的胎儿、新生婴儿都要斩草除根，据说是为了——免得养虎遗患。西哈努克国王的两个儿子就在这期间被杀害。这其中，成千上万的华人被卷入“难民图”中，有近 20 万柬埔寨华人被屠杀。金边加华银行总经理方侨生说他一家就有 9 人死于那场大难。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在中南半岛上，人民被虐杀，柬埔寨在哭泣。

在红色高棉恐怖政权的三年八个月二十天时间里，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进行“肃反”和“内部清洗”的大屠杀，期间大规模的清洗有四次。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 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时任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克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臭名昭著的 S－21 杀戮场，就是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统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 S－21 杀戮场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状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2001 年 7 月 28 日，柬埔寨文献资料中心公布了过去 5 年来调查红色高棉罪行的一份重要材料。通过调查发现，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全国共设置了 158 个监狱、埋人坑 18975 个，在这些坑中找出遗骸 1205662 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柬埔寨还是中南半岛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时至十多年后的民柬时代，文明化为灰土，民众惨成枯骨。凶残惨酷之祸，天怒神愤也。

今日这个 S－21 杀戮场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纪念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外，还陈列着当时惨遭杀害的人的骷髅，陈列着所有死难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诸如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就是在这个 S－21 监狱，为了给英明的党的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上个月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张图片，图片上被绑在椅子上正被取脑的那个男子惊恐的面部表情让我一连几天为之胆寒。

浩劫之后，当时的柬埔寨已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在这段鲜血淋漓、怨魂飘零的“新政”共三年八个月二十天里，这个当时只有不到八百万的南亚小国中却屠杀了 170 万至 200 万人，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其祸之烈，可见一斑，可谓罄竹难书，古今罕有。

1984 年获得奥斯卡三项大奖的影片《战火屠城》就是描写红色高棉时期的暴政的。影片根据真实的故事，再现了大屠杀生还者 Haing Ngor 经受饥饿和严刑拷打、饱受暴政恐怖、亲人死亡的经历。影片所描写的残酷场面，其实不及现实的十分之一，但当年放映时让一些观众一度昏厥过去。

柬埔寨人民无法忘记和宽恕红色高棉的罪行，当年的暴政、屠杀留给许多人终生不可磨灭的创伤。自从上个世纪末红色高棉覆亡后，柬埔寨人民就一直期望着将刽子手们送上法庭的那一天。今年 65 岁，曾进过酷刑中心多斯隆但大难不死的包曼，听说塔莫克的死讯时，就抱怨司法程序实在太慢。他说：“我们又失去一个可以指证赤柬暴行的重要证人，我担心其它在生的前领导人物也会很快地相继死去，毕竟他们都已一把年纪。”

目前，柬埔寨正走向民族复兴之路，抚平战争和暴政的创痛，但柬埔寨人民不会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不会忘记那些罪恶的枪声、凶残的屠刀、自己亲人痛苦的呼号声。他们期望把这批恶魔、屠夫们送上法庭，让他们为自己的累累罪行接受审判，受到法律的制裁，让罪恶的一幕永远离开自己及子孙后代的生活。但是，由于国内外种种势力的阻挠，审判一再拖延，有些人就是要逆时代潮流而为，要让审判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当年的暴君和屠夫们也许能够逃脱得了法庭的审判，却逃脱不了人心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和冥冥之中神的审判。作家李敖在《看左拉，想自己》一文中写道：“法网恢恢不是终站，天网恢恢才是终站”。《圣经·诗篇》第七篇告诉我们：神不仅是爱，也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虽有最大的悲悯心，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罪恶的惩罚。是的，神是不会放过恶魔们欠下的血债的。这是今天我唯一的安慰。

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辩护

瑞典汉斯·伊萨克森

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看法是根据历史事实得出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搞清客观历史的真相，我们就会一直被愚弄下去。

例子实在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被大肆渲染的柬埔寨。如果我们相信主流舆论千篇一律的大合唱，那么目前被软禁的波尔布特就是当代的最大的杀人犯，而我们曾帮助和鼓励过他。按照鲁默尔教授发明的更高明的术语来说，我们所帮助的不是"种族灭绝"，而是"人口灭绝"。这位教授是该领域中的专家，也是波·阿尔马克（瑞典自由派作家和前牧师）的最新顾问。人口灭绝当然要更坏。人口灭绝包括种族灭绝、政治谋杀和大规模屠杀，但不包括战争死亡。这真是个聪明的定义，特别是假如你代表那个在二十世纪里进行了比其他各国所进行的战争总和还多的战争的国家。如果碰巧是一个炸弹而不是大棒落到你的头上，你就不是一个被谋杀的人，而是战争伤亡。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种族灭绝"的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1955 年柬埔寨独立后，类似过去历史曾出现过的情形，被包围在美国的两个盟国之间——北面的泰国和东面的南越。南越的领土被美国的傀儡集团所控制，尽管 1954 年日内瓦和平协议规定越南是一个单一国家。泰国和南越政府都声称拥有柬埔寨的部分领土，但由于长期的法国殖民统治而被搁置。而越南从 1946 年到 1975 年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西哈努克政府对外采取中立路线，对内则实行残酷统治，依靠一个为数很少的地主贵族阶级的支持。1962 年，由柬埔寨共产党和沙络特绍（波尔布特的真名）领导的社会反抗运动开始了。国王则以包括政治谋杀的白色恐怖和日益增强的镇压来对付。西哈努克给予越南共产党以支持，其后柬埔寨抵抗运动也给予越共支持，但都遭到了美国 1973 年－1975 年的大规模轰炸作为惩罚。1970 年美国入侵柬埔寨，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但仍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争在柬埔寨进行了 13 年，中间几乎没有停顿。1970 年西哈努克被美国发动的政变所推翻，这时由波尔布特领导的抵抗运动和他先前的敌人西哈努克结成了联盟。当 1975 年和平降临，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进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边时，柬埔寨的基础设施，包括灌溉系统都已被炸得粉碎。这个国家看上去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带着疟疾病毒的蚊子在弹坑里兴旺地繁衍。自 1973 年巴黎协议后，红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抵抗运动的关系急剧恶化。除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支持红色高棉，而且中国在南部的邻国越南，和有敌意的苏联结盟，需要密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也许错，柬埔寨的新领导人无论从眼前还是长期考虑，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复农业基础设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过保证这一年的粮食收获来应付一场可怕的大规模饥荒，而且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以使国家安全不受威胁。

对大多数人来说，疏散意味着回老家。1920 年以前柬埔寨几乎没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种大米来谋生。其次，在早期法国和日本的统治下，还依赖橡胶生产。1970 年，金边只有 50 万居民，由于战争期间大量难民的涌入，人口急剧膨胀到 200 万，这么多人都靠美国的援助维持生活。这种援助现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数而言，是在城市没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们在短期内被以强制手段送回农村种地。随后，发动了广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战争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的建设。科学、医疗、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着美国的附庸政权逃跑了，他们带走了能移动的几乎一切东西。缺少医药，没有医院床位。由于战后疟疾瘟疫的传播，人口健康状况更加恶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既有亲越南势力，又有原政权的残余，成为动荡不安的根源。共产党的干部大多数既年轻又缺少经验，军队也一样。因而在 1975 年－1979 年间，柬埔寨因各种原因不必要地死了许多人。按照美国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资料，估计至少 2 万人被处决。你可以说，那些没有犯任何罪而被处决的人，属于被谋杀。

而这类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的是 1979 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几周里，被作为战争宣传发向全世界的信息，这种信息来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被当真的。在入侵后的仅仅几个月里，入侵军队及其所扶植的政权就在金边国际舆论界面前用死者的头颅堆筑起给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这些死者被故意说成都是波尔布特的牺牲品。很清楚，这所谓的历史记录的需要是服务于战争宣传的，当时的观察者也大多是把它当作战争宣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新闻媒体、鲁默尔教授和著名

作家众口一词地得出结论说，在 1975 年－1979 年间，不多不少有 2,035,000 人被杀害。这顶多是说明了他们具有超人的特异功能而已。柬埔寨战前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是在 1962 年,人口数为 590 万。在民主柬埔寨政府 1979 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 800 万。从 1962 到 1979 年的 15 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内战，大规模的美国轰炸，生存环境十分严峻。假如大规模屠杀的指控是真实的话，那么一个公正的人口估计是能够证实的，但这样的公正的人口估计并不存在。但确有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数，从而对资料的来源就不加以认真追究了。

一些头脑还稍微清醒的评论家至少承认：也许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归罪于波尔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权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万人民的生活艰难，其艰难程度足以使他们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这是一个全新的、扩大了的种族灭绝的定义。其隐涵的假定是：内战、美国入侵和轰炸，解放战争和越南入侵都一概无关紧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毫不相关。这真是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定义也太愚蠢，因为它会反弹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万儿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则制度的设计师和从中获利者就是种族灭绝的凶手。

我们民主的西方国家热情万分地欢呼俄罗斯的新统治阶级上台，帮助它建立起利伯维尔场制度，但短短几年时间里，俄罗斯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了 7-10 岁，这意味着每年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样可说是“生活艰难”。以上最后两个例子是“看不见”的种族灭绝的例子。所谓“看不见”，是因为这类屠杀在我们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已经习已为常了。特别是对那些认为世界银行版本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自然状态的人来说，这种屠杀更是天经地义。这是所有希望得到赞助拨款的“严肃”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所定义出来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见的，是波尔布特和民主柬埔寨为改变那种“自然状态”而做出的绝望的和失败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审判的是波尔布特，而不是叶利钦或世界银行。这场审判的主要证人将是越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因此会进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们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急于达到此目的。在河内，来自美国、英国、日本还有新的强盗贵族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统治权。万宝路和希尔顿正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展开广告战。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国控制着金融流动，日本放贷给消费者，新加坡控制着不动产市场，台湾和南朝鲜则占领了免税加工工业。

越南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的项目，承诺建立起了一个可以安全地剥削劳动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差距在扩大，资本的重要性压倒一切。这意味着：越南人民争取自由的三十年漫长斗争，都白搭了。因此，民主柬埔寨领导人是否在任何意义上犯下了种族灭绝罪仍是有待证明的。即使能够证明确实如此，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西方要发动一场如此激烈仇恨的运动来反对民主柬埔寨政权，这个政权的残部看来现在正在柬埔寨的丛林里瓦解。对资本主义的冒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反叛，这才是民主柬埔寨所犯下的大罪，因此必须得到惩罚，以“杀一儆百”。这种仇恨和马丁·路德对德国农民起义的诅咒是一致的：

“还有什么比造反的人更邪恶吗？你会因此而发臭，而窒息，而被打倒。你若因而死去，那就太好了，你只有那样才得永生。”

柬埔寨纪念红色高棉大屠杀34周年

北京时间2009年4月17日柬埔寨报道 上个世纪最恶劣的大屠杀之一就是红色高棉的屠杀，今天，柬埔寨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琼邑克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纪念大屠杀34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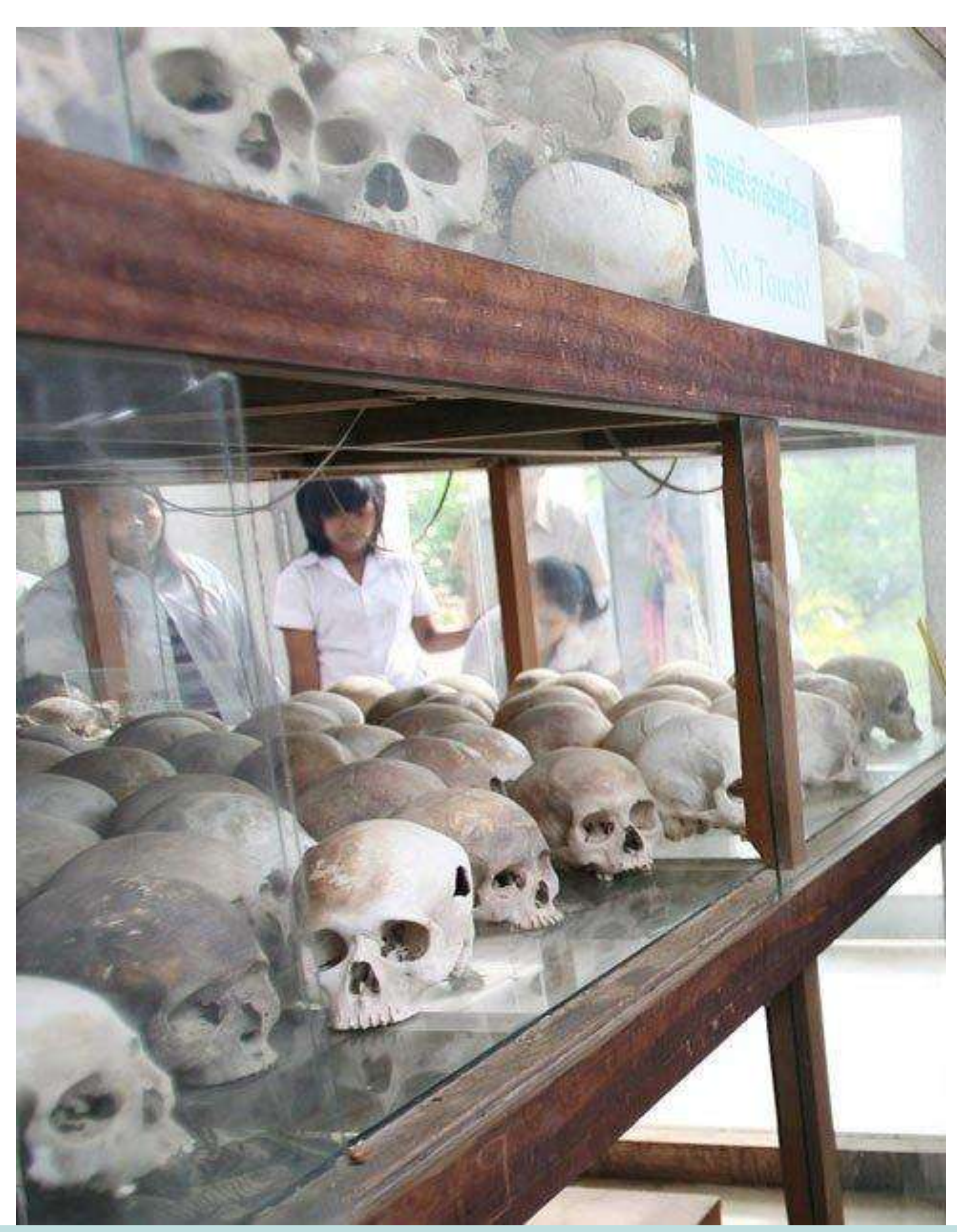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回帖人：1zd776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1 15:16:44

以上帝的名义烧死那些异教徒

第 4 楼

波尔布特=安卡=组织。

回帖人：wz11mr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3 9:51:55

第 6 楼

自从有人类史以来，象现在这样能吃饱饭，不经常打仗的太平日子也才短短几十年。好不容易冷战结束了，现在又跳出来金正日，内贾德这些疯子，拿着核武当炮仗玩。

回帖人：流水大肚佛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3 11:00:32

第 7 楼

红色高棉的老师呢？

回帖人：黑桃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3 11:59:20

第 8 楼

把挑动战争的疯子们统统打到地狱

回帖人：猎人谷 影响力指数：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3 12:33:28

第 9 楼

他们这些"行为"曾得到"毛"的高度赞扬.

回帖人: nyy000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3 15:45:07

第 10 楼

他们这些"行为"曾得到"毛"的高度赞扬.

= = = = = = = = = = = = =

自作孽，不可救！中国人荼毒全世界。消灭中国人符合天道

回帖人: 莲花居士1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3 17:10:31

回帖人: 职业流氓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4 14:57:42

第 13 楼

小布的老师

第 15 楼

共产主义就是好呀就是好..........

共 8552 次点击，33 个回复 1 2 3

他们这些"行为"曾得到"毛"的高度赞扬.

回帖人: 莲花居士1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6 9:19:49

第 19 楼

谁的敌人，谁的朋友

回帖人: 永远的黑眼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09-4-26 10:44:35

第 20 楼

文章提交者: 流水大肚佛 加帖在 图画人生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红色高棉的老师呢?

回帖人: 大明王朝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0-4 17:53:25 跟贴回复:

第 24 楼

邪恶的政权得到一个更为邪恶政权的支持.

回帖人: 1D 怕多 D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0-4 18:27:45 跟贴回复:

第 25 楼

想想吧，谁支持红色高棉干的?

第 15 楼 cityant 2009/4/24 22:53:14 的原帖:

共产主义就是好呀就是好..........

很多以前这个主义的国家转为自由国家后都立法禁止这个主义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主义对人类的残害尤甚于纳粹！！

回帖人: 两广副总督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0-7 11:46:10 跟贴回复:

第 28 楼

波尔布特真不愧是猫的好学生

回帖人: sht1970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0-13 21:25:39 跟贴回复:

第 32 楼

布尔波特的老师不是毛，是周!

回帖人: 我爱 CIVIC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0-14 11:05:06 跟贴回复:

第 33 楼

邪恶的柬共!

回帖人: 山水如画 影响力指数: 0+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0-10-16 12:49:24 回复 32 楼:

第 34 楼

都不是玩意

本版块主题总数: 64782 / 帖子总数: 692084

黑色回忆————红色高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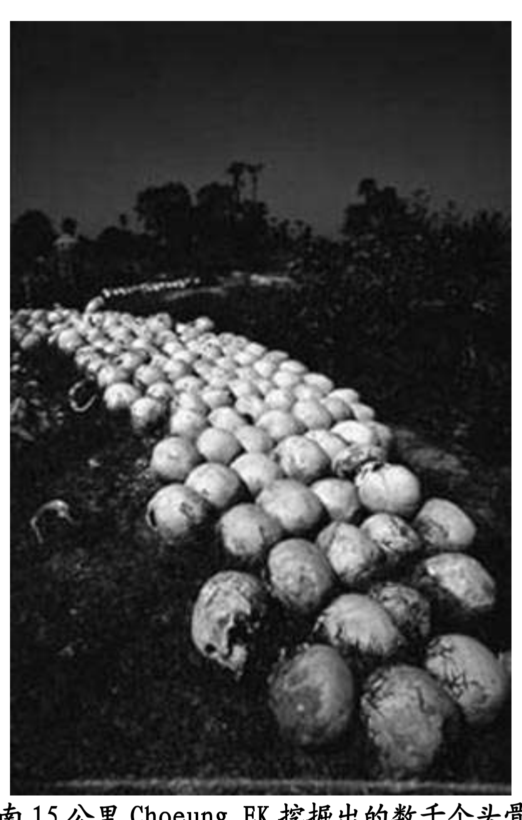
这是“我们党”当初极其亲密的“兄弟党”近40年的发展史，一支靠中国支持和供养的武装组织的短暂历史历程，他的兴衰对我们是一个教训和启示，朋友们可结合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来研究分析他。

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走得如此之远

“革命”先从肃反入手，凡曾服务过朗诺政权、对“新生红色高棉”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城市者，一概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它专业人士大开杀戒。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受害者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就擒，惨遭杀戮。整个国家没有商店、庙宇、学校或公共设施，人类文明在柬埔寨降低到历史的最低点。在这个人口数量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保守估计有100万人惨遭杀戮。

1989年8月，在吴哥陆续发现大量的头骨





1981年1月，在金边以南15公里Choeung EK挖掘出的数千个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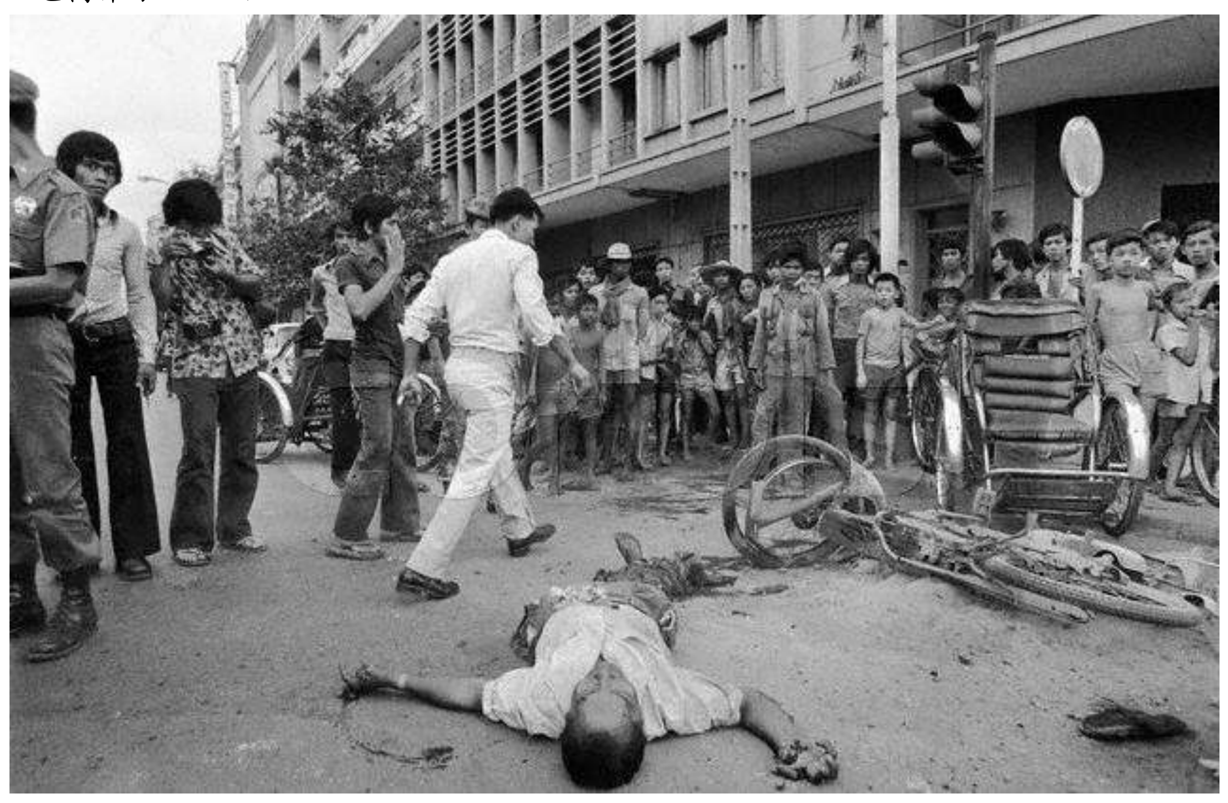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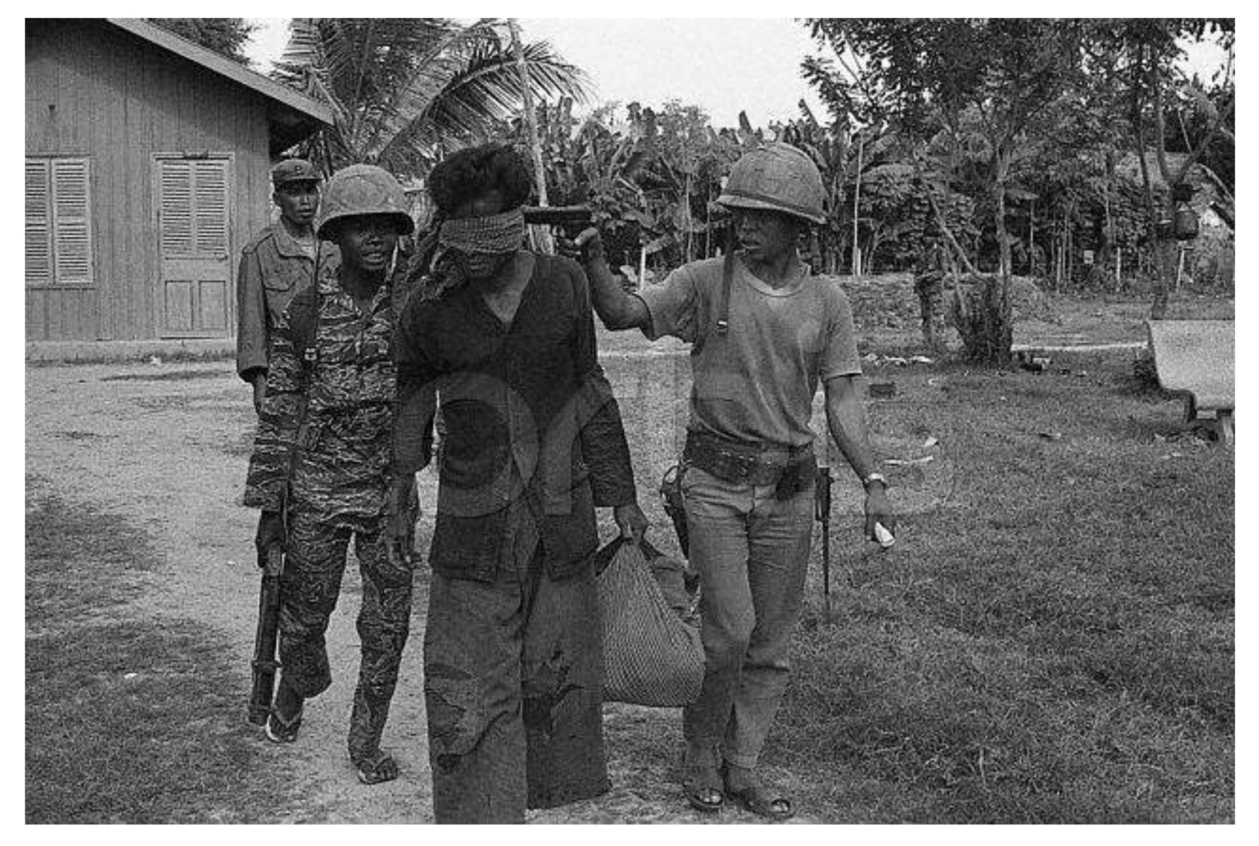
1975-4-17，西哈奴克及夫人身着紅色高棉裝束在界碑處和紅色高棉領導人合影



堆積如山的犧牲者衣物和死者照片

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





柬埔寨 1975 年

已经死去的婴儿似乎仍在吸奶，但他不过把鲜血永远留在了母亲的心胸。红色恐怖凝结于她的眉眼之中，丧子之痛让她恍若痴呆。

1975 年 1 月 1 日，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向摇摇欲坠的朗诺政权发动进攻，首都金边被高棉军队包围。大量的难民逃离这个城市。当进入首都的所有供给线被切断时，支持朗诺的美国采取



了紧急空运，但已迟了，此时朗诺已经做好了出逃计划。

4 月 1 日，朗诺和他的随从被流放，最终到达美国。12 天以后，美国认为高棉人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撤离了在金边的美国大使馆人员。4 月 17 日，高棉人的军队开始进驻金边。面对红色高棉的胜利，人们兴高采烈，并且迫切希望国家在五年血腥内战之后重返和平。

但事情并不这样简单。波尔布特在掌权之后也开始排斥异己。这个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柬埔寨人发动了政治清扫运动，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被无辜杀害。左倾主义的悲剧在这个国家达到顶峰，直到波尔布特于 90 年代孤独地去世。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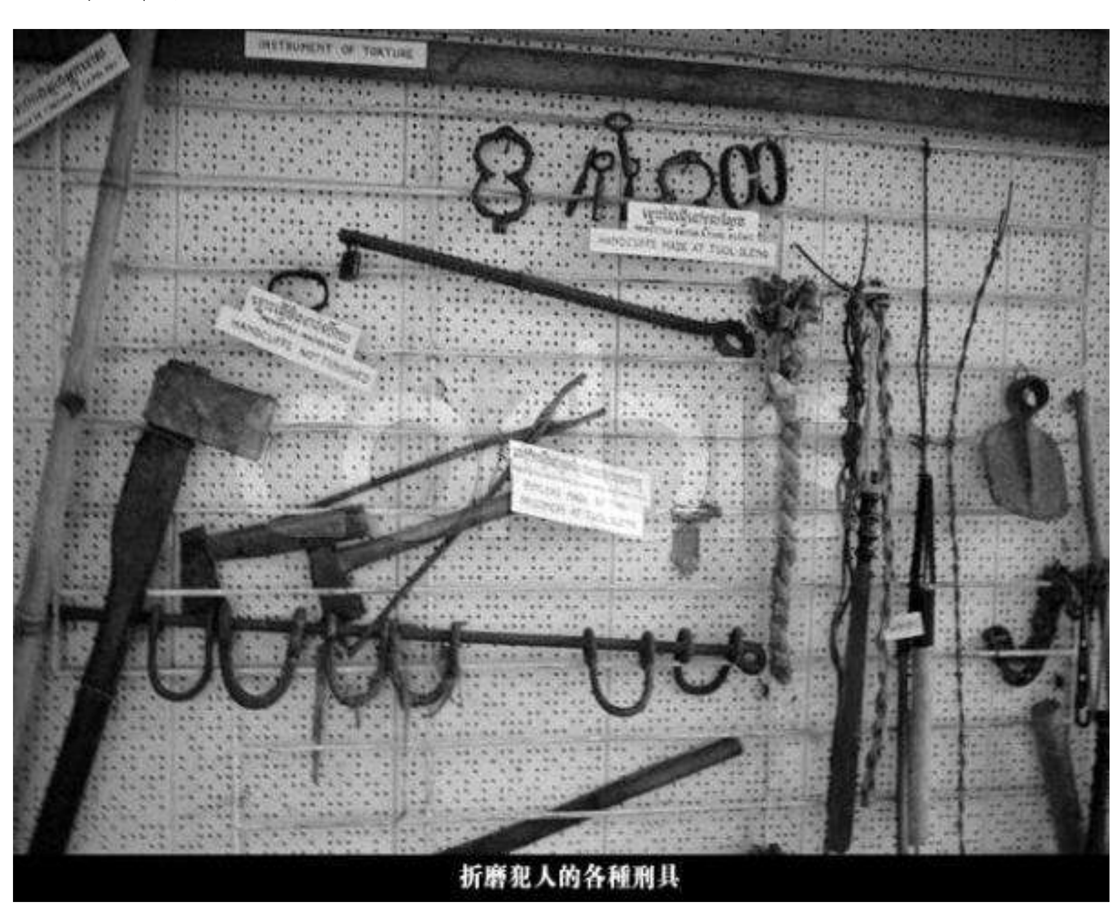


骨瘦如柴的受害者



瘦骨如柴的受害者

残害犯人的各种刑具



折磨犯人的各種刑具



特制的钻机。从人后脑钻开 0.8×2 公分的孔洞，再从头顶钻眼，即可取出完整的人脑，已发现的几千枚钻孔人头骨铭刻下一段柬共统治时期的真实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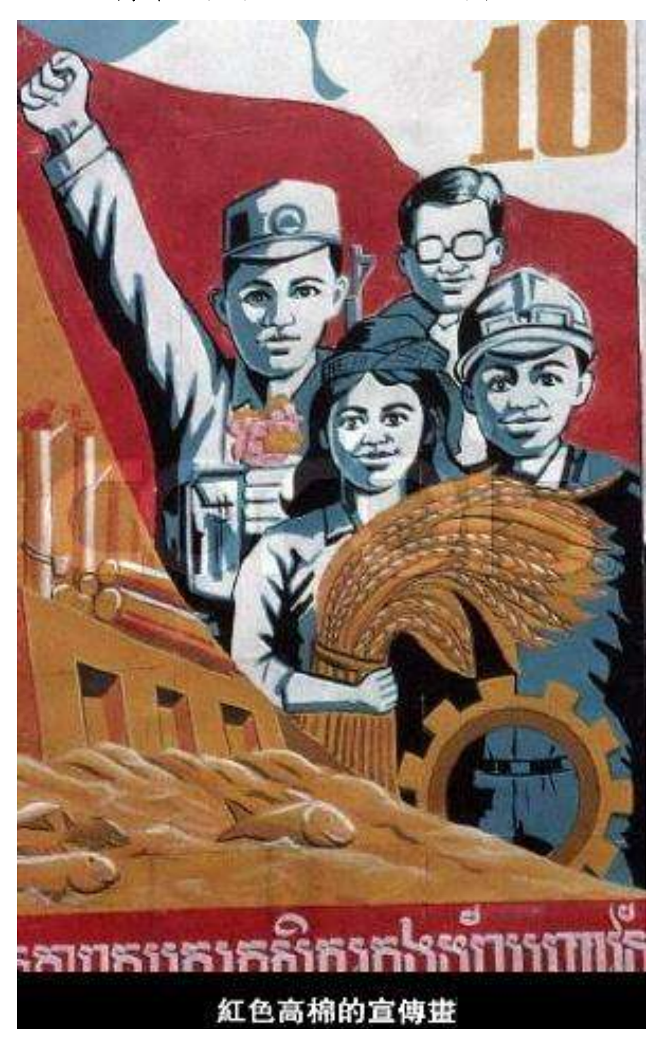
从图中可以看出，很多颅骨都是不完整的，这些都是被取脑的受害者



红色高棉宣布废除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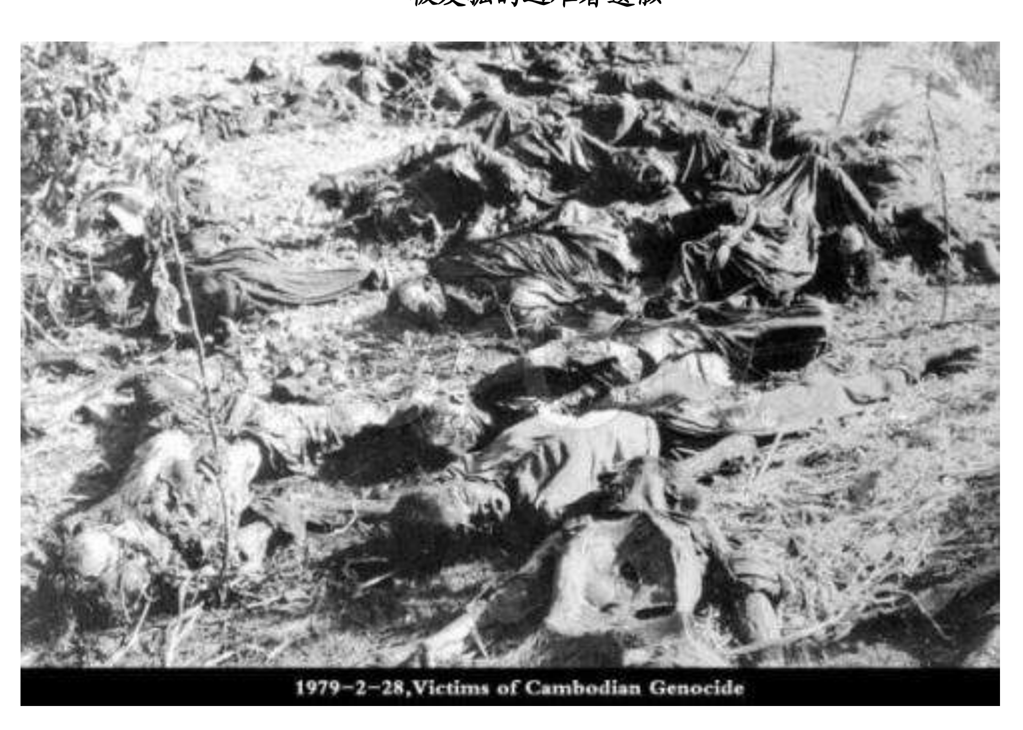
紅色高棉(Khmer Rouge)廢除了貨幣

红色高棉时期的宣传画，是否似曾相识



紅色高棉的宣傳畫

被发掘的遇难者遗骸



1979-2-28,Victims of Cambodian Genocide

维基百科·柬埔寨共产党



柬埔寨共产党党旗

红色高棉即赤柬（高棉语: Khmaey Krahom，法语: Khmers Rouge），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该党是一共产主义组织，曾于1975年至1979年间成为柬埔寨的执政党。

在柬埔寨共产党的“三年零八个月”管治期间，处于战乱的柬埔寨估计可能有200万人死亡。按被杀害的人及全国人口比例来计算，这是20世纪中最血腥暴力的杀戮之一。自赤柬结束管治至今，并没有任何的红色政权领导人受审。目前在柬埔寨发现的埋人坑超过20000个。



红高棉(赤柬)政权的部分领导人，左方为波尔布特。（摄于金边的红高棉屠杀博物馆）

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31年成立，其分支柬埔寨共产党最早于1951年出现，后来的红高棉领袖波尔布特则坚称该党于1960年正式成立。在早期仍是从属于越南共产党，在六十年代中期曾于越南边境联同越共一起与美军交战。

该党在1970年代中期仍被称为“柬埔寨共产党”(CPK)，至1980至1990年代改称为“柬埔寨民主党”，但媒体则常以法语名称“赤柬”或“红高棉”来称之。该名称的起源是来自西哈努克亲王在1950年代形容该党的政治取向。

在红高棉管治时期（1975-1979），该党中央的领导人如下:

波尔布特（Pol Pot，原名沙洛沙）－“头号人物”，运动领袖，1963年2月起出任总书记直至1998年逝世

农谢（Nuon Chea）－“二号人物”，总理（在生）

英沙里（Ieng Sary） – “三号人物”，副总理（在生）

塔莫（Ta Mok） – “四号人物”，赤柬最后领导，西南部地区书记（已故）

乔森潘（Khieu Samphan） – “五号人物”，红高棉主席（在生）

宋先（Son Sen） – 国防部长（已故）

云雅特（Yun Yat, 已故）

Ke Pauk – “13 号人物”（已故）

Ieng Thirith – (在生)

红高棉的领导在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期没有多大改变，而该党领导人多来自中产阶级及在法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大多数红高棉战士多从贫穷农民中征召，而经济来源则为军用兵器、炸药，以及中国政府的支持，现时的游击队约有 8,000 多人。

意识形态

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结集了斯大林思想、欧洲左翼的反殖民思想。属于共产党分支中的极端派别。

红高棉的崛起



年轻的柬共战士，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穷苦的农村家庭.（摄于金边的红高棉大屠杀博物馆）

柬埔寨共产党于 1950 年代成立，当时是越南共产党的分支。至 1970 年代改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被称为法语的“红色高棉”。

在公元 802 年至 1970 年间，柬埔寨的政治是世袭君主制，至 1970 年 3 月 18 日，朗诺将军（Lon Nol）趁管治者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出国访问时把他推翻，夺取权力。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高层当时的分析，中情局认为如果朗诺成功夺权，他会衷心地欢迎美军。美国迅即与朗诺政府建立关系，并在金钱上给予支持，当时美军正与越共和红高棉交战。

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遂支持赤柬去对抗朗诺政权。

1975 年 4 月 17 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诺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国”（红高棉），其领导人为波尔布特。

红高棉的管治

红高棉试图一步把柬埔寨改造为无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在执政期间实行非常恐怖统治，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至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初期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别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和为政府工作等人。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红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内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在赤柬的四年管治下，大部份柬埔寨人被当成牛马一样的农业生产奴隶，每天在饥俄或半饥俄下长时间工作。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亦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杀。据不同的统计，死于红高棉管治的柬埔寨人为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当时人口的约五分之一。当中五万至十万人是被处决。



被柬共惨杀的百万牺牲者中的几个

红高棉的衰亡

随着边境冲突及有大批柬埔寨难民涌入越南，1978 年 12 月，越军进攻柬埔寨，并于 1979 年 1 月 7 日攻占金边。纵使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的统治感到恐惧，但越军仍在不少投诚红高棉人士的引领下，成功瓦解红高棉政权，而投诚者也成为后红高棉时代的政府核心。其后赤柬势力撤往西部，并控制泰柬边境附近地区近十年。他们受到泰国军队的非正式保护，而资金大多来自走私钻石及木材。

在苏联的扶持下，越军的入侵后，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中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此不满，透过向联合国的投票，仍承认红高棉政权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这也成为日后引发中越战争的一大潜在诱因。

难民

部分柬埔寨人在红高棉管治之前已逃到邻近国家的难民营，而未能逃亡的则一直在农地工作直至越军的到来，他们后来也被送到难民营。不少人越境进入泰国寻求庇护，及后也准许前往美国、法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定居。

复元及审判

柬埔寨于 1990 年在人口及经济上已大致恢复到赤柬政权管治前的状态，但不少人对赤柬的恐怖管治仍存在着心伤。虽然当地学校的课程内包括赤柬的暴行，但由于当地人口的平均年龄偏低，尤其至 2005 年，有近 1/3 的总人口的年龄不足 20 岁，普遍对赤柬的认知不足，新一代的青年对赤柬的深入认识多从老一辈的口述中得知。

在越军击败赤柬后，S-21 集中营负责人康克由曾试图销毁有关赤柬暴行的文件，但仍留下近 10 万页未能销毁，另有 10 万页推测藏在宋先生前的居住地。不少赤柬政权前领导人均住在拜林市或匿藏于金边。

1997 年，当地政府成立了“审判赤柬委员会”。该小组由 300 多人组成，在法律及司法架构上以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及审判仍活着的赤柬领导人。但洪森政权对此事并不积极推动。当局总是以当下要优先发展经济、资金短缺为理由解释审判小组进展缓慢。日本和印度为此事提供的拨款，但截至 2006 年审判进展不大。